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褒曼

李怀东 郭锡权 乔立新编著

Baoman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在人类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深深怀念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世界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英格丽·褒曼。

好莱坞的大门终于被褒曼敲开了。她当时是瑞典电影界的新秀。自由女神把她召唤到好莱坞与世界第一流的影星角逐。天生丽质、技艺超群的褒曼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赢得了荣誉和褒奖。

对于她，观众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要她一登台，千千万万观众和影迷们无一不被她深深吸引。人们对褒曼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的魅力在于这位艺术家能在银幕和舞台上，把她的精湛艺术全部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她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表演，在她的身上，人们会有一种眩惑之感。无论她在哪里，她永远不会被湮没，她总是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是一个高傲的戏迷，在褒曼“虏获”的戏迷里就有这位女王殿下，她突然悄悄地出现在伦敦的剧场里，没有警察，没有警卫，她和皇室的“褒曼迷”在欣赏这位艺术大师的精湛表演。

水银灯下是她的主战场，她跑遍了全世界，她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艺术，她把自己永远置身于艺术幻觉世界之中。面对人们的颂扬、称赞、痴迷，她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轻轻地说一声：“我就是英格丽·褒曼，谢谢……”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 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褒 曼

第一章 美梦成真中渗透着父爱

A 她终于得到一个白色的信封，它是希望、胜利、光明、理想、幸福……头顶上是一块宁静的天地。她爱她的城市——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赋予她无穷想象的双翼，赋予她美丽的梦想，赋予她智慧和力量……

她匆匆地朝海滨大道露天码头走去，心情慌乱不宁。她 19 岁了，此时，她的体态已呈现少女的丰满。一年前，霍尔塔婶婶曾对她说，她应该穿上三层羊毛长统袜，好让小腿显得壮实些。然而，这丝毫没有能够增强她的自信心。她生性优柔寡断，缺乏女孩子必要的自信心，格外腼腆，待人接物都是羞答答的。此刻她更是六神无主，忧心忡忡。毫无疑问，这天上午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倘若她失掉了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就不会来了。那她就必须把朝思暮想的美梦统统忘个干净：体面的首映式，如云的观众；雷动的掌声，甚至行屈膝礼 10 次谢幕，从此一举成名，全世界都知道她。

褒曼已经向叔叔表示，要是这回报考失败，她可以去当售货员，或者去做女秘书。奥托叔叔过于偏见，他说，女演员同妓女没有必然的差别。“你休想要为她们辩护，什么她们只是在舞台上搂搂抱抱和接吻，难道在台下就那么规矩吗？”

褒曼不好同叔叔争个输赢。她知道叔叔是遵照她去世的父亲生前嘱托，尽心尽力把她抚养成人的，让她受到良好的教育，要她老老实实地做人。她那情不自禁地想当演员，想献身艺术的强烈欲望使得她烦恼不安，日夜不宁。作为一个不太守旧的、虔诚的路德派教徒来说，叔父认为把她从一种有辱家门的邪念中拯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她的监护人，叔叔不能辜负她父亲生前的遗愿。然而叔叔也知道她是个生性好强又有主见的女孩，要是连一次碰运气的机会都不给她，就硬叫她丢掉朝思夜想的念头，那会刺伤她的心，当然那也极不公平。

她在斯德哥尔摩市剧院雄伟的浅灰色大门前停了下来，嘘了口气。她身后的烟波浩淼的海面无垠无际。滨海一带，是 7 层高的公寓大楼、商店和高层办公大楼。大教堂的青铜屋顶耸立着，年深月久，铜顶已被海风褪去了原有的光泽，蒙上了一层暗淡的绿色锈垢。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湖泊如镜，船只如梭，湖面上泛着金色和蔚蓝色波光的城市啊，她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少女！在离剧院不到百米的海滨大道的一幢楼房里，她父亲生前开设着一家照相馆。她就是在照相馆楼上的一套公寓里欢乐地来到这繁华的人世间的。

褒曼举目仰视剧院宽阔的石头台阶。剧院的门柱上有千盏美丽夺目的门灯。颜色乳白，外形溜圆，好似一个硕大的葱头。门口两旁耸立着金光灿灿的庄严的男女雕像，他们象征着缪斯各路尊神，褒曼所仰慕的专司戏剧的女神大列拉就威严而亲切地立在这儿。

几个星期前，她已经把那个棕色信封送到皇家剧院了。信封里装着她参试自选表演的 3 个小品。考评团将任选其中两个叫她表演。要是被淘汰了，看门人便会把这个棕色大信封完好无缺地退还给她。要是这次试演侥幸被通过，她会收到一个小白信封，里面装有通知书，告诉她下次复试的日期以及考评团指定的复试内容。

褒曼来到了剧院考场。她要试演的正是她的戏剧老师加布里埃·奥尔玛帮她设计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小品。

她出场了，她疾奔而上，鱼跃一跳就立到了台口，娇滴滴地纵声大笑起来。这种大笑不止的亮相本是她的绝招。她一上台，台下马上变得鸦雀无声。她略停顿了片刻，念出了第一句台词。她偷偷瞄了台下的考评团一眼，叫她大失所望。他们对她毫不在意。第一排的考评委员们还在同第二排的委员交头接耳地聊天。她心慌意乱之中把台词忘个一干二净。侧幕里有个小伙子给她提了一下词，她总算把下一句台词念了出来。这时只听得考评团主席说：“别往下演啦，够了，谢谢你，小姐。……下一位，请下一位出场。”

褒曼走下舞台，落泪了，泄气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径直穿过剧院前厅，上了大街。她想，这一下得回家去看叔叔的颜色了，还得告诉他说试演失败了，上台不久就让人赶下了台。她不想活了，活下去已毫无价值。她直奔码头跑去，想纵身投进万顷急浪之中，一死了之。

她在公园渡船售票亭前呆了好一阵子，四周静悄悄的。远处，几只海鸥在空中盘旋，尖声鸣叫着，另几只海鸥缓缓地低低掠过水面。她探身直晃晃地盯住了水面。水色漆黑，浑浊不堪。她想，要是沉落在这污浊之中，待到人家把她捞上来，浑身都会染上一层油污。这还会像奥菲丽亚？！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是一个荡漾在清澈如镜、散发着百合花香的清溪上的少女，而她却要把这污秽不堪的脏水咽下肚里。她承受不了。

轻生的念头终于消失了。她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沿着斜坡往上走去，走过大小不一的商店，穿过中央大道，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两条纤细的腿软绵绵的。她真想藏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声哭个痛快。

过了些日子竟有人告诉褒曼，她可能得到了白色信封。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奔进剧院，像是被一阵旋风卷进去的。她飞快地来到了办公室。值班人员笑着说：“褒曼小姐，你得到的是一个白色信封，给你。祝你好运。”

她把信封打开了，上面写着：“准予复试，试演……”

她飘飘然了，心里明亮了，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沉醉在盛夏的骄阳之中。

直到若干年后，褒曼才知道当时在考场上评委们为什么对她的表演那样漫不经心。原来，从她由侧幕鱼跃而出，冲着观众放声大笑的那一瞬间起，评委们就一致认可了她，对她的舞台自信心、艺术风度和精彩的亮相连连称赞。

考评团通过了她的复试。1933年秋，她终于被录取为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学校的学生。

奥托叔叔对她的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再也不对自己的侄女所献身的艺术说三道四了。叔叔对她后来拍的几部瑞典电影也十分欣赏。令人惋惜的是，他未能活到亲眼看到侄女美梦成真，艺术上的成功之日。

B 在她刚满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她13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父爱是她永恒的力量，褒曼太爱他了。父亲教她成才。父亲贾斯特斯·褒曼是她12岁前惟一的精神支

柱。父亲生性开朗，活跃健谈，多才多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褒曼为自己的父亲无比自豪。父亲酷爱摄影。褒曼小时候常用各种道具装扮自己。父亲帮她戴上各色各样滑稽可笑的帽子，她叼着烟斗，架着眼镜，穿着父亲的大皮鞋，让父亲给她拍照。她喜欢站在镜子面前看自己扮演的各种角色：大狗熊、老太太、年轻的公主……8岁那年，父亲为她请来了声乐老师。她唱呀，唱呀，唱个不停，还学弹钢琴。

父亲爱好绘画，喜欢音乐和歌唱，她确信女儿一定也爱好这些，而且早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明星。他认为读书读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读就是虚度光阴，不如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在褒曼11岁时，他竟打算让女儿趁早考进歌剧院。褒曼那时年龄太小，还不具备父亲那种艺术气质，她说她应该先把书念好，念完正规中学后，投考皇家戏剧学校。

褒曼的母亲出身德国富豪。一年夏天，她母亲从汉堡来到瑞典避暑，每天到林中散步，戏剧性地和在林子里写生的父亲相逢。他俩一见钟情，以后俩人天天见面，不久就相互爱恋了。由于门第之差，外祖父一直不同意他们成婚。母亲是整整等了7年才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褒曼的父亲。那时，父亲已在城里的一个繁华地段——海滨大道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父亲天天忙着照相业务，有时还给人家画像。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格外红火。外祖父终于发了慈悲成全了这门早该成全的亲事。他们婚后的夫妻生活极为美满。母亲生了3个孩子，头一胎生下来一个星期就断气了。7年之后，褒曼出生了。

C 家教陶冶了褒曼的某些优秀品德，这是她永生难以忘怀的。这一切得力于父亲的循循诱导……

母亲去世后，艾琳姑妈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悉心抚养褒曼成人。父亲有14个兄弟姐妹，艾琳姑妈是其中惟一未出嫁的女儿。祖父母把这个女儿留在身边照料他们晚年生活。他们去世后，她便轮流住在她哥哥和姐姐家。褒曼的母亲去世后，姑妈搬到他们家来住。那时褒曼才3岁，叫她妈妈，一步也舍不得离开她。艾琳姑妈身材矮胖，患有冠心病，不大出门。她慈爱可亲，怜恤别人。

父亲每年都要带褒曼回德国，看望住在德国的外祖父母和两个姨妈。父亲通常把褒曼交给他们照顾，他自己稍事停留之后，便动身到英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去了。

褒曼在外祖母家住得很不快活。在她的记忆中，外祖父是个身高体大、个性强悍的男人。他们管教孩子格外严厉。褒曼在孩提时代受到那一代德国人对子女严加管教的约束，以至日后她的生活总是有条不紊。有一次，外祖母半夜三更把褒曼推醒，因为她信手把自己未叠好的裙衫乱搭在椅子靠背上，外祖母硬是叫她从床上爬起来，把裙衫叠放好。然后，外祖母又指着褒曼的那只鞋。褒曼说：“外婆，我是把鞋放在椅子上的，擦得干干净净的。”

“不错，孩子，可是放得不齐。两只鞋应并排放好，鞋头要朝一个方向。”那年褒曼才10岁。

这些琐事并不起眼，可是却使她入骨三分，影响了她一生。在不整

洁的房子里她呆不习惯，会感到心里不安

褒曼年轻美貌的莫蒂姨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法国人。褒曼小时候很喜欢她。姨妈一直想有个女儿，她待褒曼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极为宠爱。

褒曼选择演员职业，是与父亲的教育、帮助、支持分不开的。在她11岁时，父亲第一次带她上剧院，在这之前，她曾跟着父亲去看过几次歌剧，她什么也没看懂。

第一次看话剧却入迷了，她的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第一场帷幕刚落，她就转过脸去对爸爸嚷嚷起来，整个剧院都听得见她的声音。她兴奋激动地对父亲说：“爸爸，爸爸，我要干的就是这一行！”

D 父亲溘然长逝，这对她是一个最沉重最可怕的打击，尽管她当时还弄不明白究竟得的什么病。要知道，那时她才12岁……她不明白父亲得的是癌症，也不明白癌是什么东西。

父亲不断消瘦下去，癌症已近晚期。他由一个热恋着他的姑娘葛丽塔陪着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去了。听说那里有个医术高明的医生。葛丽塔刚刚21岁，而爸爸已经55岁了。她最初是褒曼的家庭教师，后来爸爸慢慢地爱上了她。

褒曼喜欢葛丽塔，她长得娟秀大方，待人彬彬有礼。在父亲患病前一年的夏天，褒曼随父亲和葛丽塔常到艾琳姑妈的那幢位于湖畔的夏季别墅去休憩，在湖里游泳。他们一起过得格外快活。

最高明的医生也难治好父亲的病。父亲临终前身边只有褒曼和葛丽塔陪伴。褒曼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临终前终于睁开了眼睛，侧身久久地凝视着葛丽塔，然后转身瞅了褒曼好一会儿。女儿对父亲凄然一笑，这种笑容里充满着痛苦，一种深探怜爱自己父亲的痛苦。不一会儿，父亲就和她们永诀了。

父亲去世3年以后，葛丽塔帮助褒曼在制片厂谋到了一份当临时演员的生计。以后褒曼长期没有见到葛丽塔。久别重逢时，葛丽塔已经结婚，生了好几个儿女。

父亲的死给褒曼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半年之后，艾琳姑妈又离开了人世。父亲和姑妈的相继过世，令褒曼痛苦万分。

E 叔叔和婶婶尽了最大的爱心抚育她成人。这是一个辛勤劳作的瑞典中产阶级家庭。从那以后，她就住在他们家的那幢公寓楼里，同她的5个堂兄妹一起开始了她新的生活。父亲临终前后的那几年里，褒曼还受到了他的生前好友贡纳尔·斯潘贝格先生很多关顾……

斯潘贝格经营一家小小的鲜花店，不少演员是他花店里的老主顾。差不多每到星期天，他都要邀请他的朋友们到家里来吃晚饭。褒曼也是他的座上常客。饭后，他常常要褒曼作即兴表演，让她朗诵诗或出个小节目。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大显身手。她变着腔调把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演遍了，她手舞足蹈、如狂如痴。斯潘贝格的朋友全都五六十岁了，每个星期天褒曼都成了他们娱乐节目主持人。有时她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有时也惹得他们泪水盈盈。他们很欣赏褒曼的表演。她有一整套自编自导

出来的“保留剧目”。

褒曼的表演勇气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她本是个羞涩腼腆的姑娘。在学校里，在课堂上从来不敢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要是有人提起她的姓名，她都会羞得脸红。但是登台表演却是她心驰神往的，在舞台上她就成了另一个人。

F 走近电影圈的第一步。褒曼碰到继母葛丽塔。她正在学习音乐和演唱。她长得妩媚动人，常到电影制片厂去充当临时演员糊口，如拍一点在火车站上疾步行走、在晚餐席上嫣然就座，或者在旅馆大厅里踱步的镜头。褒曼听得心往神驰，便央求她说：

“哪天请带我一起去好吗？让我也见见世面，开开眼界，明白电影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

葛丽塔却安排得格外周到，远远超出了褒曼的奢望，给她找了个充当一天临时演员的差事。褒曼到摄影棚时，已有十来个年轻姑娘在待命了，她们大多比褒曼年龄大得多。有人给她们化了妆，10点钟，导演叫她们进入摄影地。一切准备就绪后就要开拍了。导演吩咐她们要装出一副饥寒交迫、冻得瑟瑟索索的样子。摄影机开动了，朝着她们来回拍了一两圈就戛然而止。导演说道：“好极啦，姑娘们，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请回吧。”

但是褒曼舍不得就这样离开。她继续保持着化好妆的模样，又接连从一个场景跑到另一个场景，拍了几个镜头，像走火入魔一样。她享受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天，还得到了10克朗工钱。

第二章 艺术的魅力

A 戏剧学校是她的天堂。她快活得像一只小鸟。他们背着领票员，用发夹偷偷地把皇家剧院演出厅的门启开了……

戏剧学校的课业对褒曼说来是很轻松的。她不费劲就弄懂了老师们在堂上讲解的怎样掌握和控制音调的抑扬顿挫，或者怎样走台步等等。他们的课程有芭蕾舞、击剑、戏剧史和形体训练等，他们也常演出一些片段。

这个学校的校舍十分简陋，只不过是利用剧院楼上的两三间大房间。房间里有张大桌子，每个学生都在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姓名，有些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年月里相继成了名，诸如葛丽泰·嘉宝、席各妮·海苏、玛伊·珊德琳、维薇卡·林德福熙等。褒曼觉得自己总算有了归宿。她站在皇家剧院的后台入口处的小门旁边，感到格外自豪，如今她也是剧院的一员啦！这就是她的家！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不花钱看这里的演出。当然不是坐在池座前排的好位子上，而是坐在最顶上的楼座里。他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到剧院里去看戏，去观摩那些大名鼎鼎的男男女女名演员的演出。不过，彩排是不许他们去看的。顶层花楼大门钥匙是由领票员拿着。可是他们机灵得很，只消用发夹两下三下就把门拨弄开。当然，下面导演心里也明白顶层上有人溜进来了——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偶尔有一两回，他们被一句台词逗得格格地笑出声来，笑声太响了，下面的人就会明知故问地嚷嚷起来：“喂，上面有人吗？”于是，他们顿时寂静，噤若寒蝉。

居高临下地端坐在背光的暗处，头顶上镀金枝形吊灯闪烁着金色光芒，眼底下是通明透亮的舞台，精彩的戏剧正在紧张地上演——褒曼觉得此情此景真是奇妙无比，美不胜收。

B 18岁生日之后才第一次有男朋友，开始品尝爱情的滋味。她申明过：“我就是讨厌男人”……

在30年代初期，瑞典大多数少年男女在14岁至15岁，或者16岁，都成双成对出去游玩共舞，手挽手散步闲逛。而且不出一昼夜男女双方就都神魂颠倒，好得如胶似漆。褒曼到了15岁上也情窦初开，有过几回这样如痴如醉的初恋。但是后来她有了一个令人苦恼的发现：她在男孩子当中很不受宠。他们回避她。因为她身材太高，又刻板正经，爱脸红，丝毫不懂得怎样谈情说爱。她觉得自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窝囊废。出路只有一条：她只好干脆不再自作多情，佯装出一副厌恶男孩子的样子。她声明说：“我就是讨厌男人。”她悄悄地溜到一边去，孤芳自赏地练习演戏，把身心都扑到事业上去。

后来有一天，褒曼的堂兄和他的女友带她一起出去吃晚饭，他们要介绍她认识一个叫彼得·林斯特罗姆的年轻牙科医生。此人已有25岁，长相英俊，潇洒大方，还有辆自己的汽车。

他们来到了葛兰德大饭店后一个多小时，才见彼得从门口匆匆进来。

“对不起，我迟到了一会儿。”

“没关系。这位是英格丽……这位是彼得。”

他挨着褒曼的身边坐下来，不料他开口对褒曼讲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很喜欢你的头发。”

那天褒曼把头发从前额朝后梳，在脑后缩成一个小把儿，颇有几分小学教师的樣子。

下一桩事情他说的是：“你的嗓子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的声音。”

听到彼得的夸赞，知道彼得对她有好感，褒曼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们一起跳舞，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把褒曼送回了家。几天以后，又打电话来说彼得约他们4个人再聚一次。褒曼对这个身材修长、面目端庄清秀的小伙子也产生了好感。

后来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他们逐渐情投意合。

奥托叔叔和霍尔塔婶婶是赞同这桩婚事的。他们很喜欢彼得，年纪轻轻已经跻身于社会，有了一门很好的职业。彼得还是一个出色的中量级拳击选手，滑雪能手，跳舞尤佳；他很爱笑，很有幽默感。

在婚后最初几年里，他俩和睦幸福，生活得十分美满。

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彼得个性太强。对于褒曼来说，有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身边相助，有一个头脑精明的丈夫为她出谋划策诚然是件好事，何况他又是个对待婚姻态度严肃、正派规矩的男人。这种品德既是他的优点，却又在他们夫妻关系中埋下了日后失和的祸根。彼得固执己见、囿于守旧，他所赋予褒曼的好处在他们一开始交往就已十分清楚。然而他们夫妻之间日渐貌合神离，最后乃至反目分手，究其原因不仅是褒曼也同样具有瑞典人的执拗性格，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观念在更新，她要改变那种一味由丈夫拍板定音的生活。她要来个大变样——自主自尊。

C 试镜头那天，一大早她来到父亲坟前祈祷，请他助一臂之力，赐给她自信……

夏天到了，一个学期结束了，学校放假3个月。那时候所有的同学几乎都一窝蜂地参加了一个收费低廉的观光团，到俄国去旅游，去观摩俄罗斯剧院了。褒曼本来也是要去的，不过她同彼得·林斯特罗姆正在热恋之中，舍不得离开他。

褒曼留了下来。可是她整天无所事事，而彼得却要工作。她想找点事情干干。她去找了贡纳尔叔叔，因为他那个花店同电影界有各种各样的接触。她想，说不定可以到瑞典电影制片厂去当临时演员，就像她15岁那年干过的差事一样。

褒曼同一位经常光顾贡纳尔叔叔花店的女演员有过一面之交。她名叫卡琳·斯旺斯特罗姆，是个很出色的喜剧演员，后来当上了瑞典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指导。听贡纳尔叔叔介绍了褒曼的情况后，卡琳·斯旺斯特罗姆同意接见她。

“我亲爱的姑娘，那么你会点什么呢？”

褒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我会朗诵诗，你愿意看看我的表演吗？”

“好的，我很想看看。”

于是褒曼朗诵起来，这正是她的拿手好戏。卡琳凝神看着她在房间里踱步，熟练地朗诵着诗歌。卡琳对褒曼的表演很满意，决定送她去试镜头。

褒曼一大早就从家里动身，留出了很充裕的时间到制片厂试镜头。从那天早晨起，她养成了习惯，日后到瑞典制片厂上班一直是这样的走法。到制片厂去的电车路线要经过她父母的墓地。她在中途下了车，走到父母墓地的白桦树下，坐在长凳上默默祈祷，乞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安，保佑她好梦成真。她向父亲祈祷说：“今天我有一场真正难得要命的戏要演，爸爸，求你保佑我镇定自若，赐给我自信吧。”

来到古斯塔夫·莫兰德面前试镜头时，褒曼与其说是心里忐忑不安，倒不如说是亢奋异常。

把她吓呆的不是试镜头本身，而是第二天在银幕上看到她自己的一举一动。那真叫她大吃一惊。她觉得虽然平时在镜子里，在照片上看到过自己，但在电影银幕上平生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模样，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形象是迥然不同的，它同自己脑海里储存的形象大有出入。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了自己的牙齿。“难道这就是自己的那副牙齿？”她看到了自己的鼻子……“哦，上帝，难道那是自己的鼻子？”其实这些东西她早在镜子里看过不知多少次了，觉得它们还不难看。忽然之间，它们全都在银幕上一览无遗，与自己想象的大相径庭。这副模样很陌生，她觉得自己变得那么肥胖，她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鼻子。还有她怎么竟像陀螺那样扭来扭去，故作娇态，傻笑不止；那么唠唠叨叨。她真不像自己。哦，天哪，她马上就心里有数，他们准不会要她来拍电影的。

D 在众多的秀色极佳的女演员中，导演莫兰德却看上了褒曼，说她是个奇迹，更具有“明星的气质”，以后会大有出息的……

古斯塔夫·莫兰德谢顶秃头，大腹便便，是个仁慈和蔼、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他看了褒曼的样片后放下心来了。他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艺术家。在众多的竞争者中他看上了褒曼。他说，没有哪个人能够像褒曼那样创造出必须要有的又不同凡响的奇迹来。这个奇迹就是能够把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的表演，出神入化地变为银幕上一个变化无穷的光辉夺目形象的独到功力。这种点石成金的功夫要是套用电影界里早已成为陈词俗套、但仍不失其准确的行话来说，就是具有“明星的气质”。英格丽·褒曼恰恰具备了这种明星气质。

“看起来我的样子很难看，是吗？”褒曼悲观地问道。“我想要是再试上几次，往后我会演得更好一点的。”

这一句口头禅日后竟成了褒曼在瑞典影坛上的商标了。几乎每场演下来，她都要唠叨一遍：“我想，往后我会演得更好一点的。”久而久之，摄影组的全体员工一看到褒曼出现就免不了这样来招呼她：“‘往后更好’小姐来啦！”

古斯塔夫听了却更为放心了。“挺不错的。要记住这是你第一次上银幕。灯光打得不完全对头。”

“可是我演得不大好吗？”她满腹狐疑，又盯住追问了一句。

“你演得非常出色，”古斯塔夫说。“你有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会成功的。”

卡琳·斯旺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眼下当务之急是，我们往哪儿安插她呢？”

“现在要拍的是埃德温的那部《僧侣桥的伯爵》。”古斯塔夫建议说。

“不错，我们还没有最后排定那部片子的阵容……那个女招待倒是个挺可爱的小角色。”

“再说我自己的那部片子很快就要上马了，”古斯塔夫又说了一句。他却没有再说上一句：他已经胸有成竹，一定要褒曼小姐来演他下一部片子的女主角。

卡琳朝着褒曼嫣然一笑，说道：“那么我得着手为你准备一份合同。”

“好的，”她回答说。“可是别忘了，下学期一开学我得回去上课。”话是这么说，她心里依然是无忧无虑的。那是1934年夏天的事，当时她19岁。

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褒曼来到瑞典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埃德温·阿道尔夫森导演的《僧侣桥的伯爵》，她没有赶上连排，只来得及在大家午休之前匆匆听导演讲解试排了一次。过了一个多小时，她回到摄影棚里，猛然发现在通往场景区的小路两侧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两小盆鲜花。她俯身下去念了挂在花枝上的一张便条：“凡是你所到之处，必将鲜花盛开。”

褒曼说，在以后的岁月里，哪怕她红得发紫，被捧上了天，却未必能得到过像古斯塔夫·莫兰德所给的这种令人振奋的小便条，或者比这一笺短筒更富有诗意的赞美了。那是古斯塔夫料定她日后必成大器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嘉勉。

E 她演出的第一部电影是《僧侣桥的伯爵》。这是一部喜剧片，她没有演好，却差一点演砸了锅，她的锋芒太露了呢？还是涉世不深？！……

《僧侣桥的伯爵》这部电影描述了一群豪放不羁的年轻流浪汉一天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想方设法钻空子，避开斯德哥尔摩1933年严惩酗酒的法律条文，到处寻欢作乐，开怀畅饮。褒曼扮演了一家下等旅馆里一名被领头纵情酗酒的男主角所追逐的女招待艾尔莎。埃德温·阿道尔夫森既是导演又扮演了片中的这个男主角。褒曼出场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身材丰腴、脸庞滚圆的姑娘胡乱套上一件黑红双色条纹相间的裙衫，急冲冲奔向窗口，刚好来得及朝下面街上走过的埃德温流声流气地打了个招呼。岂知她初登影坛，没有一举成名，反而差点儿闹砸了锅。

按理说，褒曼应该走进鱼店，不声不响地在柜台前排队。扮演卖鱼的是瑞典最伟大的女喜剧演员之一，杰出的女演员托莉·泽尔曼。她在为褒曼前面的一个顾客包鱼。褒曼看着她那种包鱼的姿势很别扭，就绕过柜台走上前去说道：“喂，您看看，您包得不得法。我来包给您看。我看到过人家在菜市场是怎么包的。您先把鱼这么包，把纸这么翻过来，

托莉·泽尔曼（1887—1964），瑞典著名话剧女演员，1907年起先后是瓦萨剧院和奥斯卡剧院名演员。

再这么叠进去，然后一卷就行了，明白了吗？”褒曼对她笑了笑，就回到原来排队的地方去。场上顿时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静寂。后来托莉·泽尔曼粗着嗓门吼道：“这个小鬼是什么人？”褒曼顿时明白过来方才有失检点。她意识到自己处在未入流的地位，根本配不上去对托莉那样的大名角指手画脚。她脸颊一下子泛起了红晕，不知如何是好。埃德温赶紧神色不安地陪着笑脸说道：“喂，对不起，她是个新手。”

“哼，”托莉带着弦外之音说道：“她发挥得挺不错，是吗？”

拍片结束时，埃德温·阿道尔夫森还是成了褒曼的良师益友，尽管她觉得自己曾经多管闲事使这位导演为难过。

F 离开学校——她终于向独立自主的门槛迈进了第一步。她没有后悔，更没有退缩……

第一部影片拍完后，瑞典电影制片厂的所有制片人和管理人员都知道他们发现了一个有希望的年轻女演员。

古斯塔夫·卡琳·斯旺斯特罗姆、埃德温，还有名导演伊伐尔·约翰逊一起竭力敦促劝导褒曼，要她重新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既然瑞典电影制片厂有那么多大好良机垂手可得，何必非要再在戏剧学校里呆下去不可？这乃是通往功成名就的一条捷径，在戏剧学校里是得不到这种机缘的。褒曼也倾向于听从他们的劝告。活生生的现实早已清楚表明，那所专业学校看重的是资历，而不是才能。

8月份，褒曼同皇家戏剧学校校长面谈了一次。那次谈得很僵，不欢而散。奥洛夫·莫兰德不同意她离校去拍电影，坚持让她在校按部就班完成正规训练。他对褒曼大发脾气，这反而更坚定了她退学的决心。

离开皇家戏剧学校以后，她并没有忽视戏剧知识课程，她开始去上戏剧知识补习课、舞蹈课、动作训练课、嗓音运用课等等。教她上课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演员，名叫安娜·诺莉，60多岁。褒曼从不间断练功，她爱学习，她觉得生活中随时随地有东西可学。

褒曼的第二部电影是《渔海怒涛》。这是一部打情骂俏的喜剧片，片中充满放纵肉欲的罪恶和随之而来的报应惩罚情节。影片的结尾使观众皆大欢喜。

1935年1月19日，举行了褒曼电影的第一次首映式，放映《僧侣桥的伯爵》。首映式的反映让褒曼失望。倘若她当时能知道她在第一部电影里出场时穿的那套红黑纹相间的裙衫到今天还完整无恙地珍藏在瑞典电影制片厂的展室里，同葛丽泰·嘉宝1924年在她的第一部影片里首次出场穿的那身银灰色晚礼服并排挂在一起，受到同等珍视的话，那么她或许不至于那样沮丧泄气了。

褒曼的第一部由古斯塔夫·莫兰德导演的影片，即同屈斯泰·爱克曼合拍的《父子科学家》发行公映后，开始受到影评家们的青睐。《瑞典日报》撰文称：“瑞典电影制片业多少年来不但是首次达到了国际水平，而且达到了很高的国际水平。”

褒曼接下来拍的一部片子是《五旬节之夜》，由古斯塔夫·艾特格伦导演。她在这部影片里扮演女秘书，这位女士同她的老板发生了私情，

随后经受了种种感情上的折磨和一连串的曲折。瑞典报界对这部影片颇多非议，贬褒兼有，把它列为“一部只供成年人看的影片。”在这以后又拍摄了《向阳山庄》，重新由古斯塔夫导演，一切听他指挥。褒曼发现跟古斯塔夫拍片是最大的乐趣。古斯塔夫教会了她怎样把握适度的含蓄艺技，让感情绝对真实自然。“决不要没戏找戏，画蛇添足，故作乖巧，”他说道，“始终要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才可以脱口而出。”

从影不到一年半之后，褒曼终于得到瑞典报界的喝彩与赞美：“英格丽·褒曼有了伟大的突破。”“英格丽·褒曼非但美色绝伦，令人眩目，而且技艺出众，表演富有灵感。”“作为一个女演员和一个女性来说，英格丽·褒曼已经成熟。人们在她的美貌和才华面前，只能倾倒。”同时，她也开始引起国外新闻媒体的注目。美国《游艺界》杂志载文评论说：“英格丽·褒曼色艺双全，其极佳的演技足以使她在好莱坞赢得一席之地。”

在瑞典电影制片厂和在瑞典剧院演出的那几年里，她既信心十足，同时也心存疑虑，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她总是力求去演那些难度大的角色。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女人面孔》。

女主人公经受了一场火灾，半边脸蛋烧得完全变形。褒曼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便央求瑞典电影制片厂让她来演这个角色。“不行，”他们一口回绝了。“我们决不能从命。你的观众接受不了这个角色——好端端一个漂亮姑娘却让受伤的脸蛋破了相。弄得像个丑八怪。不行，肯定不行。再说我们手头还有一个好剧本《一夜风流》。我们打算买下来让你主演这部片子。”

褒曼却认为《一夜风流》这个剧本没有新意。于是她同他们讨价还价：“除非你们让我扮演那个毁容的姑娘，我才肯拍你们的那部片子。”结果他们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褒曼先拍他们说的那部片子，然后再拍《女人面孔》。彼得帮了大忙，他使出牙医的绝招，做成了一个口腔垫片之类的东西，褒曼含在嘴里使得脸颊鼓鼓囊囊的。然后他们又用胶水把眼角往下吊。经化妆师的独特处理后，她的脸变得很吓人。

为了保持畸形脸的化妆效果，在影片拍摄中她要忍受超常的痛苦。口腔垫片磨破了牙床，使她疼痛难耐，有一次竟在摄影棚失声哭了起来。这是她有生以来最难演的角色了。

《女人面孔》在电影院公映了，这部影片引起的反响是她未曾预及的。她的巨幅照片比比皆是。在影院大门口上面竖着她的名字，被灯光映得雪亮。她梦寐以求的一鸣惊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她梦绕魂牵的夙愿已经实现。她向上帝作了虔诚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真幸福。对您的恩情我真是感激不尽，难以回报。祈求您赐宠于我，让我就这样一直演下去吧，继续不停地演下去，把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所有奇妙惊人的角色全演个够吧。让我变成您的以演员形象出现的驯良工具吧。我要通过我的职业，通过我的演出去感化人们，使他们变得更加美好。您庇佑我演好这些角色吧，这样我才会不虚此生。”

第三章 第一次婚姻

A 1937年6月10日，褒曼和彼得·林斯特罗姆结婚。这是一个21岁的女人和一个30岁男人的结合。她在人生之路上刚刚迈步，一切取决于意志力和上帝……

褒曼觉得一生之中真正自由自在、独立不羁地过日子只不过年多光景。她当时才21岁，在瑞典电影制片厂拿一份相当丰厚的薪资。她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间，装饰颇为现代化，窗棂上都安有大红色的遮阳布篷。她很讲究家里的摆设。她对彼得情意缠绵。她21岁生日时，彼得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条银狐围脖。在30年代，这是最时髦的装饰品了。她一生中还没有得到过比这个更令她喜欢的礼品。她飞一般地朝电话机奔去，想打电话感谢他。打蜡的地板上杂乱地铺着一块块小地毯。结果是乐极生悲：她在一块地毯上绊了一跤，竟把脚踝扭伤，疼得不能走路，为此她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她恋恋不舍地围着那条毛茸茸的狐皮围脖，而身上穿的却是一件薄纱睡裙。她爱彼得，一分钟也不想离开他。

彼得和褒曼都忙于自己的专业，好像总要等“忙过这一阵之后”才能享受夫妻生活的温馨。彼得在牙科事业上很有成就，当时正在进修以便取得博士学位——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进修完了3年的学业。而褒曼是个崭露头角的影坛新秀。他们还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女记者芭蓓蕾·阿尔汶（笔名“炮筒子”）、新闻记者兼画家莫利·福斯德曼、著名的动画大师艾纳尔·奈尔曼等许多电影和戏剧界的朋友。他们俩人工作都很勤勉，夫妻之间情深意笃。不久，褒曼怀孕了。

B 去柏林乌发拍片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世界太大了，她要去闯荡一番……

褒曼在本国已有名气，但她觉得呆在瑞典电影制片厂并不是当演员的最终归宿。她无论如何不能围在瑞典这块小天地里。大千世界对她有无穷诱惑。她向往好莱坞，她知道天才非凡的导演们都在那里云集，而且好莱坞舍得耗费巨资来拍摄场面豪华的大部头片子。不过她知道自己资历还浅，且英语欠佳，一时还无力攀登那座殿堂的宝座。

30年代，法国也拍出了许多好影片，拥有一批阵容强大的演员。可是褒曼的法语也不行。不过，德语倒是她的第二语言。她同彼得结婚之后不久，柏林的“乌发”电影公司提出邀请她去拍片。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褒曼对彼得身上的好品德有新的发现：彼得对她真心实意地关怀体贴。褒曼到柏林去给乌发电影公司试镜头，单独下榻在旅馆里，百般无聊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她下楼到客厅想去消遣一下。就在门厅里，有个人把脸半遮半掩地埋在报纸背后。那是彼得！她顿时喜出望外。他说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你孤零零一个人必定闷得慌，再说我也放心不下，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所以我想还是来一趟的好，看看万一有什么要做的。不过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说我在这里，因为我摸透了这些电影工作者的脾气，他们不喜欢女演员有个丈夫跟在屁股后面转悠！你需要干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随时听候吩咐。你应该像个年轻女演员那样落落大方、信心十足。大家

也期望你是有这种风度的明星。”

于是彼得就在街对面的一家三流旅馆住了下来，而褒曼却坦然住在电影公司出钱租下的这家高级旅馆里。即便在当时他心里已经明白了，丈夫可能成为一个女演员生活道路上的某种障碍。

乌发电影公司的合同规定拍3部影片。第一部片名叫《四个伙伴》。故事说的是4个姑娘合伙开办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她们在同男人们打交道时遇到的诸般烦恼。拍这部片子对褒曼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她担心自己不能用德语演出，怕自己由于缺乏德语语感，在表现喜怒哀乐各种情感时做不到淋漓尽致。

1938年褒曼刚到德国去拍片就看出来了：凡要想在德国影坛上走红、出头露面，都必须先是个纳粹党员。她一进摄影棚就嗅出了这股异味。而且她还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弥漫着一股令人憎恶反感和胆战心惊的气氛。当时欧洲每一个神志清醒的有识之士都对纳粹党深恶痛绝，对他们那套哲学、军国主义和胁迫恫吓嗤之以鼻。尽管褒曼并不过分忧心忡忡，她也意识到应该提前离开这个充满法西斯火药味的地方。

她对离开德国一点也不感到惋惜。导演卡尔·弗勒立希对她照顾周到，他知道那时候褒曼怀孕已到后期，于是他就加快速度，把最后几个场景草草拍完了。

彼得开着自己那辆小汽车到柏林来接褒曼回家。他俩还顺道乘船周游了欧洲，享受了即将覆没在战火之中的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和平之夏。

足月临盆之时固然为生孩子操劳烦心，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她的体质和精力都好得出奇，还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候，就在床上躺不住了，起来东奔西走，忙着排练自己的角色。

形势已日趋紧张，希特勒剑拔弩张正在打算发动战争。欧洲各国都在忙着战备，调兵遣将。同“乌发”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得不中止。赫尔默·恩瓦尔着手为褒曼另辟蹊径，从英国和美国谋求聘请机会。

C 到美国去！好莱坞给她巨大的诱惑，尽管好莱坞对她仍是不解之谜……

褒曼不得不四处寻找演出机会。在此以前，美国好莱坞许多家电影公司早就下过聘书。“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雷电华和别的几家电影公司都曾先后送来过聘书，不过都只是提议签订合同的一纸意向书。好莱坞派出的代理人足迹遍及欧洲，四处网罗人才，竞相把出类拔萃的人才吸引到大洋彼岸去。但是他们只签合同，而不提供角色和导演。也就是说演员们一旦签了合同，他们便整整7年受到合同的制约，留居在好莱坞不得脱身，任凭电影公司老板们摆布，随便在哪部影片中填空补缺，或者扮演一个适合他们演的那种老一套角色。他们也许会在好莱坞无所事事，虚度7年光阴，只扮演女招待或者男佣人一类的角色。所以褒曼对这种合同都一概回绝。

这时，褒曼正在为生孩子而忙得不可开交。在她看来，女人结了婚要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不应该生孩子，或者生孩子会妨碍她的影坛生涯。因此，她到美国之后，诧异不已的是，

卡尔·弗勒立希，德国著名导演，一直受雇于“乌发”电影公司，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即遭排斥。

人人对她已经生过孩子居然大惊小怪。在好莱坞，明星为了保持形象，都认为千万生育不得。

褒曼第一次横渡大洋来到美国的时候，总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是彼得催促她去的。他非常豁达，很有气量，坚决主张她去美国。如果没有他发话，褒曼自己是下不了决心的，她就是那么优柔寡断，一点没有主见。彼得执意要她到好莱坞去，去拍摄《插曲》。她不在家的几个月里，彼得请他母亲来照料女儿皮娅。

褒曼首次去好莱坞拍片终于成行了。

《插曲》是她拍的第六部瑞典影片。这部影片是根据古斯塔夫·莫兰德尔的构思编写成的。莫兰德尔本人参与了编剧兼导演。这部影片摄成于1936年。也正是这部影片使褒曼不失时机地一鸣惊人，成为闻名遐迩的电影明星。她扮演了一个聪颖贤慧，然而又是孤独寂寞的女钢琴教师。女主人公虽然洁身自好，却又堕入情网，爱上了一个已经有了美满家庭的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那个小提琴家由屈斯泰·爱克曼扮演。

在这部影片中，男女主角不知不觉地钟情相爱。他们尽管情意绵绵，难舍难分，然而这桩风流韵事却是好梦难成的。经过一段时日感情上的煎熬，大家扪心自问，不胜惶惑，最后小提琴家重新回到了自己妻子儿女身边。至此，这桩情海憾事便云散烟消了。影片结尾，一缕轻曼的小提琴和弦声如怨如诉，在浪漫色彩十足的袅袅谐音中曲终人散。这一对恋人追今抚昔，感叹人生之坎坷，命途之多舛，面容显得稍有几分憔悴，然而神情并不颓唐。他们带着迷惘而又乐观的眼光正视着明天的太阳。

这部影片的题材并无新奇之意，然而它却拨动了千千万万观众心灵之弦，使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许多年之后，古斯塔夫·莫兰德尔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一点不错，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承认，发现褒曼是他的功劳。一点不错，正是他竭力主张她留在电影界里。一点也不错，正是他策划编写和导演了《插曲》这部影片。古斯塔夫对褒曼是这样评价的：

“她的一个动作都带有一股不可言状的雍容大方的风度和自我控制能力。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朗读台词的那股优雅洒脱的劲头和她光彩照人的美貌就使我赞叹不止，暗自叫绝。她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当听到赞扬恭维时，尽管也颇为窃喜，且腼腆地领受下来，但是这些赞扬恭维却从来不会削弱她在表演艺术中自成一体的3个特征：真实、自然和富有想象力。我为她创作了《插曲》这部片子，但是我并不能担保这部影片定能取得成功。这部影片的成功全靠了英格丽本人的精湛演技。”

“实际上不是靠哪个人发现了她，不是靠哪个人捧她走红。而是她自己显露了才华和魅力。”

第四章 美国之行

A 令人欣喜的时刻到来了。带有英文字幕的瑞典电影《插曲》终于在纽约和好莱坞上映了。《洛杉矶日报》说，这部影片不仅是迄今为止瑞典送到美国放映的最佳影片，且可以同好莱坞的任何影片竞争，甚至还略高一筹……

报纸评论说：“褒曼小姐固然姿容艳美，然而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天生丽质不足为奇。她不仅长得秀丽，而且具有一种令人着魔的女性内涵，两者结合得十分完美。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不久的将来她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甚至是一个大明星。好莱坞制片商应当机立断，不拘一格重金聘请她到美国来。一定要设法让她尽快离开瑞典影坛，因为瑞典电影正在日臻完美，争雄世界。”

大卫·赛尔兹尼克究竟是否念到过这段影评，或者恰恰是这段影评才引起了他的重视，如今已难于弄明白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恰好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向凯·布朗女士发了一个指示。布朗女士是一位天才的行情观察家，当时主管赛尔兹尼克驻纽约办事处的日常事务。赛尔兹尼克要她加紧活动，尽快物色一批可供赛尔兹尼克联美电影公司重新摄制并投放到美国市场的外国影片。

凯·布朗女士在公园大道 230 号大楼里办公。这幢大楼的职工中有一个开电梯的瑞典籍小伙子。他的父母是瑞典移民。头天晚上他们刚看过瑞典新片《插曲》，全家人对这部影片赞不绝口，对褒曼的演艺更是倾倒。这个小伙子知道布朗小姐是搞电影专业的，对这类事情必然会有兴趣。听了小伙子的推荐，布朗小姐真的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她立即写了一封信报告她的上司大卫·赛尔兹尼克。她回忆说：“我把《插曲》这部片子作为电影脚本的素材告诉了他，”她说，“片子本身并没有使我过分入迷，倒是片子里的那个姑娘使我心醉神迷了。我觉得她仿佛是集天下女性美于一身，真是超群绝伦。所以我将这部影片寄给了大卫。”

凯·布朗女士奉命去伦敦购进《插曲》这部影片。她刚返回纽约就接到赛尔兹尼克的电报：“立即返回瑞典，聘请英格丽·褒曼。”

布朗回忆第一次见到英格丽·褒曼的情景时说：“……笃的一声叩门声，我开门一看，眼前豁然一亮：门外站着一对打扮入时的年轻男女——彼得和英格丽。英格丽身穿一件深色海狸皮大衣，头上戴着裘皮帽子。她的脸庞白皙红润，光彩照人，恍若仙女一般。她手捧一束黄蓝两色的花束——这两种颜色代表瑞典的国色。她是那么甜美可爱，怯生生、羞答答地启唇说：‘欢迎您到瑞典来。’随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还要去亲戚家，不能陪我共进晚餐了。可是过了两个晚上等我们熟悉之后，他们才承认说，那天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地方要去，只不过要同我见面。”

“第二天我到她家登门造访，在那里会见了她的代理人赫尔默·恩瓦尔和一位律师。我们开门见山，洽谈起签订合同的事。英格丽一声不响，笑容可掬坐在椅子上为新生的婴儿打毛衣。我对合同条款一项项斟酌落实，那位律师只是坐在一旁，等着把我们谈妥的决定笔录在案。第三天我们又对合同条款反复商议。虽然双方意见颇有分歧之处，但是我

们越谈越融洽。我们终于签订了一个合同：先拍摄一部影片，如一切顺利，再合作拍摄一部。”

“赛尔兹尼克原来想签订一个为期 7 年的合同。但是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彼得·林斯特罗姆这样精明的谈判对手，对他简直是毫无办法。他斤斤计较，非要把什么事情都算计得一清二楚才肯成交。”

褒曼从布朗女士那里得知，制片人大卫·赛尔兹尼克曾经制作过《曾达的囚徒》、《明星诞生》、《蝴蝶梦》、《乱世佳人》等巨片。他们希望由好莱坞最杰出的导演之一威廉·惠勒来导演褒曼的影片，李恩廉·霍华德扮演男主角，与她合拍。当布朗女士与褒曼单独相处的时候，她语重心长地说：“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你在这里日子过得很幸福。要是我换了你的话，我一定会瞻前顾后。”褒曼觉得她这真是肺腑之言，便说道：“既然在美国好莱坞有像你这样的好人，那么我相信我会喜欢的。所以我要去，不妨去试试自己的胆量，冒点风险。”

1939 年 5 月 6 日褒曼搭乘“玛丽皇后号”邮船抵达纽约，布朗女士亲自到码头迎接她。布朗女士将她安顿在卡特汉姆旅馆，带她去观光了市容，并且建议她在纽约住上几周先温习一下英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学一下美国英语。

褒曼生性上进好学。在纽约小住的这两个星期里，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忙于看电影、看戏。有一天，她乘公共汽车到世界博览会去，从清晨 9 点钟起有条不紊地看完了所有展览馆的每一件展品，直到晚上 11 点钟才结束这次参观活动。

在此期间，凯·布朗女士收到了大卫·赛尔兹尼克寄来的一份备忘录，谈到打算对褒曼演出采取的步骤：

“我今天同惠特尼先生作了一次交谈，磋商要求英格丽小姐改换姓名事宜，并且要求他就此问题同你进一步协商。在同他谈话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些主意。

“我认为你必须会同外事部门一起研究，权衡一下使用她的真实姓名在国外的利弊。在我看来，影片在国外发行时仍可使用她的本名，而在美国各地发行时则不妨改用一个新的名字为好。我以为这种做法毫无掣肘之处。无论如何是有利无弊的。但是这一点务须弄清，不可大意……”

“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记者发表在船上对她采访的报道，并且要她尽快来到洛杉矶。这样，我们可以不失时机地在她来到好莱坞制片厂，就讨论她的更名换姓的事宜……”

B 她直言回答了美国导演的挑剔。她拒绝改名，她的姓名是：英格丽·褒曼，一个美丽的瑞典人的名字……

褒曼和布朗女士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来到洛杉矶。在车站月台上却见不到大卫·赛尔兹尼克的人影。来迎接她的只有几名从事对外联络的职员。他们把褒曼塞进一辆轿车里开了就走，直驶好莱坞，来到赛尔兹尼克家。

布朗女士同褒曼一起走过草坪来到艾琳·赛尔兹尼克跟前。她正坐在那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直播一场赛马的实况。褒曼开口用自认为最标准的英语说道：“您好。”想不到艾琳张口来了个大声的“嘘—

——”。褒曼坐了下来，脸上觉得火辣辣的，万千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这倒好，我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听一场赛马广播，而且刚一张嘴就给人家噓了回来。

布朗女士和褒曼悄然无语，闷坐奉陪到艾琳听完广播。等她弄明白自己下注的那匹马是否赢了之后，她才转过脸来招呼说：“你们好，”并且问了一句：“你们想吃点什么吗？”她待人倒还和蔼。后来，布朗女士抽身告辞了，褒曼却忍不住带着委屈的心情问道：“赛尔兹尼克先生在哪里？”

“他在摄影棚里。现在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客房。”

褒曼提着一只手提箱走上楼梯。艾琳问道：“你的那些大衣箱是不是随后就到？”褒曼回答说：“我没有带大衣箱来，我只有穿在身上的这件衣服。”

“可是你要在这里呆上3个月哩！”

“是的。”

“那么你觉得衣服够吗？”

“可是我带那么多衣服来干吗？我将整天呆在摄影棚里，我来就是拍片子的。平时穿拍片的戏装，一星期干6天活。到了星期天，我有一件游泳衣和一条长裤，那就行了。”

“哎哟，我明天晚上要为你举行一个欢迎晚会，把你介绍给我们在好莱坞的所有朋友。你带有晚礼服吗？”

“哦，带着的。最近我拍的那部影片里，我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晚礼服。拍完片子以后，电影制片厂就作为旧衣服处理给我了。我随身带在手提箱里。”

“那好，你有化妆盒吗？”

“我没有化妆盒，因为我不用化妆品。”

“你是说你脸上不搽点脂粉？”

“不搽。”

“哦，”艾琳说道，“欢迎你到好莱坞来。”

“谢谢您。赛尔兹尼克先生快回来了吗？”

“赛尔兹尼克先生常常在摄影棚里忙到很晚才回来。眼下他正忙着拍一部名叫《乱世佳人》的片子，他要再过一会儿才回来呢。”接着，艾琳又说道：“今天晚上我有约会，到比奇康勃饭店同格丽丝·摩尔、米里阿姆·霍布金斯和李却德·马泽尔美思一起吃晚饭。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吧。”

这一晚，褒曼同这些大名鼎鼎、真正的电影明星共进了晚餐，她感到很激动。

饭后，他们一起到米里阿姆·霍布金斯的住宅去。她家里早已高朋满座，等着在她的私人电影放映厅里看电影。褒曼一边看电影一边还不停地问艾琳：“赛尔兹尼克先生在哪儿呐？他难道不吃晚饭吗？”

回答总是：“哦，他马上就会来的，不要担心。”后来，这部影片使她看得津津有味，就把赛尔兹尼克先生抛在脑后了。直到过了很久，她觉得有一只手拍拍她的肩头，耳边听到一个男人声音说：“赛尔兹尼克先生已经到了。他正在厨房里吃饭，他想见见您。”

褒曼抽身起来，心想总算要同她的老板见面了。她走出放映厅来到

厨房，这时大概已经是午夜一点了。厨房里有个人，正趴在餐桌上。她留神一看，他几乎盖住整整半张桌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往嘴里胡乱塞着食物。她刚进门坎，赛尔兹尼克抬头瞥了她一下，猛地失声叫了出来：“天哪！把你的鞋子脱掉！”

褒曼立即省悟过来，因为自己身材高大已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应声答道：“我穿的是平底鞋。”

赛尔兹尼克情不自禁发出一声长叹。褒曼想到：“又来啦，又碰到那个麻烦啦！我大概快要给人家看成是个畸形的女人了。”她开口问道：“你不在乎我坐下来吗？”赛尔兹尼克说道：“当然可以，一路上怎么样？”

停了半晌，他又说道：“想必你已经知道你不适合用你的姓名了。”

“是吗？为什么？”

“好吧，先说你的名字，我们没法发音，你会被人叫做‘爱恩-格里特’（与德语‘一个方格子’谐音）。再说说你的姓，褒曼也很犯忌，德国味道太浓啦，而眼下同德国的纠纷日益加剧。我们不想让任何人误认为，我们聘请了一个德国女演员。当然，你还有丈夫的姓，林斯特罗姆。那个姓同‘林伯格’很相近，就是那位伟大的飞行员查尔斯·林伯格，他眼下是全美国非常吃香的人物。他的绰号叫‘林迪’。你不妨用这个艺名如何？”

褒曼一听就感到别扭，不为所动地答道：“我可不要用任何人的绰号。实言相告，我根本不打算改名换姓。我的姓名是英格丽·褒曼。我一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在美国我也非叫这个名字不可。至于发音，大家只消学一下就行了。要是我真的胡乱改名换姓了，而在美国又不走红，那么我怎么有脸带着一个新的名字回到瑞典去呢？”

赛尔兹尼克先生沉思起来，一边想一边又吃了点东西，他后来说道：“好吧，我们留到明天早上再谈。再说你得整容一下，因为你的眼眉太浓，牙齿不够整齐，还有别的一些美中不足之处……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到化妆部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一下……”

这次轮到褒曼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赛尔兹尼克先生，我觉得您干了一桩大错事，您不该隔着布袋买猫，不看清货色就买进。我想您当初是在看了《插曲》那部片子对我中意了，就派凯·布朗到瑞典去把我招聘来。现在你一看到我本人的真面目，处处都不称心如意，都要修饰更改。所以我宁可拍那部片子，我们不必花费时间多谈了。我们彼此都把前事忘掉算了，我乘下班火车回去。”

褒曼自己也弄不明白，当时她为什么会那样执拗倔强。说到头来，她毕竟还只是个 23 岁的人，而且她向来是对人千依百顺、惟命是从的。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居然犟着劲把他说的每件事情都斩钉截铁地顶了回去。

他刚开口说到进行宣传制造声势，褒曼就立即说：“不必，我不要那么做，那不是我素来习惯的做法。”

查尔斯·林伯格瑞典籍后裔美国飞行员，于 1927 年 5 月 20 日驾驶单座飞机以 33 个小时从纽约直飞巴黎，成为不着陆欧美大陆飞行员中的第一人。为此被授予勋并晋升为上校。1954 年出版自传《圣路易丝勋章的精神》。

他们就这样面面相觑，瞪着眼僵持不下。
这时他在思忖着，早已停止进食了。

第五章 跻身好莱坞的酸甜苦辣

A 《纽约时报》电影评论专栏作家博斯列·克劳瑟写道：“不妨想象一下：在春回大地，阳光和煦的日子里，一个北欧海盗的绝色美人沐浴后身上散发着扑面的芬芳，光彩照人，躺在浪拍涛烈的如磐石上，手捧德累斯顿的瓷碗，品味着奶油胡桃，那么你就可以对英格丽·褒曼小姐有个神形兼备的大致印象了”……

纽约的报界凭着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风华正茂的褒曼是一个不同凡响、有发展前途的女演员。他们热烈欢迎她到这个城市里来。

记者们常团团围住褒曼采访，连家庭琐事也成了见报的新闻：“她的保姆要休息，她将整日留在旅馆里亲自照料自己的孩子皮娅。谈吐之间口角生风，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褒曼小姐的英语还不够地道，有点小问题等待完善。当然她正在孜孜不倦地下功夫提高。在午餐桌上交谈时，她曾颇费斟酌，踌躇不定究竟应该说‘eldest’还是‘oldest’（英语‘最老的’之意）才对。当她得知两者通用时，便露出毫无办法的神色莞尔一笑，询问说：‘你们何必要有两个相同的词眼呢？’”

导演们用不着褒曼上加利福尼亚去了。在那里暂时找不出什么事情给她做。大卫·赛尔兹尼克忙于应付战争带来的问题，无法顾及她，所以他们认为褒曼不妨先在纽约住上一段时间。

恰好这时候有个制片人温顿·弗利德雷打电话给布朗说，他正在排一部名叫《利里奥姆》的话剧，请褒曼扮演其中的女主角朱丽叶。男主角由博盖斯·梅蕾迪斯扮演。当时褒曼还没有足够的舞台经验，只是在拍片时忙里偷闲在斯德哥尔摩喜剧院登台演出过两个星期。当时报纸上的剧评还不错。还有在1937年瑞典演员租下了奥斯卡剧院，公演了匈牙利剧作家布斯·费盖特的一个喜剧，演了两个月，场场爆满。但她却没有用英语演过话剧，于是请了一位英语教员来帮助她。

首演式定在5月24日晚上。要是叫座的话，他们将演出6至8个星期，所以5月底以前她是无法回到好莱坞了。

乔克·惠特尼和凯对褒曼的嗓音是否洪亮颇为担心。有一天，他们提前来到剧场，坐在最顶上的花楼里叫道：“喂，念台词。”她便朗诵起来。“行呀，好得很，”他们说道。“我们可以听得很清楚，谢谢，很好。”

这时候温顿·弗德雷来了，他有点困惑不解，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便发问道：“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褒曼说道：“因为我在正式舞台上只演过一两个月。”

“你这话怎么说？你不是演过《苏格兰女皇》，演过《红粉军娇》……你还演过……”

“不，我没有演过，那是席各妮·海苏……”

褒曼这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会认错人？原来在她上次来美国拍片的半年以后，席各妮也来到了美国，她一直留了下来，报界对她大捧特

德累斯顿，德国西部城市，以瓷都著称。

席各妮·海苏，瑞典著名女演员。1932年至1934年在瑞典皇家戏剧学校学习，1935年到1940年在好莱坞拍片。战后在美国及欧洲巡回演出舞台剧和电视剧。

捧，出足了风头。而她以前在瑞典倒的确演过几个话剧。这一下子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默。后来温顿捶胸顿足失声高呼起来：“哦，天哪，我认错人啦！”他转身冲着布朗大发雷霆。布朗女士说道：“哎哟，天晓得你要找的是哪个人！你本来就指名要英格丽·褒曼嘛。况且席各妮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拍外景。你自己要找英格丽……”

“哦，天哪，”温顿叫苦不迭。“天哪，现在要换人也为时太晚了。”

褒曼真觉得哭笑不得。她就置身在这样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纽约的盛大首演式即将临近，而她却鱼目混珠，给人家认错了。当然她的英语实在不过硬。

《利里奥姆》是匈牙利剧作家费兰兹·莫尔纳 1908 年写的一个荒诞剧。这是第五次公演了。这个话剧的剧情后来被改编成为音乐喜剧片《马上比武》。利里奥姆是个集市上的面包师，他爱吹牛，耍滑头，博得所有的姑娘们的青睐。天真淳朴的女招待朱丽叶以心相许，俩人相爱。终于成了一桩风流韵事。

临到上演前一小时许，褒曼猛听得博盖斯·梅蕾迪斯化妆间里乐声大作。她急冲冲闯进去一看，博盖斯正襟危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几个吉卜赛提琴手围在他四周，如癫似狂地奏着曲子，来激发他的灵感，帮他进入角色。

褒曼出台了，面对着她的第一批美国剧院观众。她感到有几分茫然，她对用外语演出实在没有把握。池座里和楼座里都坐满了观众，黑压压的一大片，在等着她上场。她走到台口，舞台意识油然而生，不但台词说得颇为流畅，表演也很出色。她总算闯过了第一关。

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可以比较放心地信赖自己，在拍片和剧院演出等重大场合里，可以做到随心所欲，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她的心灵深处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她不光要做出色的演员，而且要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她将要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攀登这个顶峰，哪怕中途心瘁力竭，以身殉艺也在所不惜。

如果说艰辛的劳动是能够保证她达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那么她甘心情愿 1 年 365 天，24 个小时投身在工作上。她在日常生活中那么拘谨谨慎，只消一登上舞台，或者站在摄影机前扮演角色时，她就会变成另一个人，泰然自若，充满自信。

全剧方终，大幕降下，亲自到场观看演出的弗兰兹·莫尔纳就宣布，对褒曼的演技非常满意，他感到无比欣悦。这是他们得到的第一个佳音。报上的剧评也是良好的。华尔特·威彻尔在他的评论专栏里开门见山说：“博盖斯·梅蕾迪斯的利里奥姆光彩夺目。”接着又写道：“英格丽贞淑娴静，演技把握得很有分寸，恰到好处。她有一股魅力飘越过台口的脚灯，向大厅扩散，拨动观众的心弦。”《每日新闻》的剧评家把褒曼誉为“最热情洋溢和最令人满意的朱丽叶，并且是这类角色中最不俗气的演员”。

另一位剧评家说道：“梅蕾迪斯先生和褒曼小姐珠联璧合，惟妙惟肖的演技令人折服。这两位演员在第二幕里的精彩表演，乃是本世纪以来，剧院里欣赏话剧的最令人愉快的时刻。”

同台演出的博盖斯·梅蕾迪斯是一位谦谦君子，为人热情，性格开朗。

艾琳·赛尔兹尼克过去在好莱坞曾经告诫过褒曼：“要是有个男人对你大献殷勤、曲意迎合，那是因为他图谋不轨，另有所求，色迷迷在你身上打主意。切勿轻信他请你去吃晚饭，仅仅是为了交个朋友。你绝对不要以为你会得到什么。要知道，甚至白吃一顿饭都是不可能的。”

可是博盖斯并没有追求褒曼。他是一味爱护褒曼，当然对她也有点好感。褒曼倒愿意他能如此。博盖斯对她唱过一支小调：“要是你灌了这么多美酒，我还不能赢得你那颗心，那么再见吧，小姑娘，再见吧！”然而他却没有就此罢手。

博盖斯对每个人都很亲热，同每个人都交了朋友。他从一开始就使褒曼了解美国和爱上了美国人的性格。他是向褒曼展示美国人对人极其友好的人性的第一个人。从博盖斯·梅蕾迪斯身上，褒曼生平第一次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正常竞争的内涵和意义。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和惊人的宽容和坦荡是褒曼一生不能忘却的。

B 大卫·赛尔兹尼克显然找到了办法：“要想使这位女人高兴，他就得找点事给她做。”所以他又把褒曼“出租”给米高梅公司了。

他不仅给褒曼找来了工作，也给她招来了麻烦

……

再过一星期，彼得就要离开瑞典，从意大利搭乘6月10日的“华盛顿号”邮船来美国了。为了迎接他的到来。褒曼在一个34层的大楼里租了一间漂亮的住房，并用她积攒的所有钱将它装修一新。从房里可以俯视中央公园的景色。她想要看到丈夫在眺望这个美妙城市时的面部表情。然而事情却没有如她所预料的那样。褒曼把丈夫从飞机场接回来，带他进了那个布置好的房间，彼得却不喜欢住在高楼上，也不喜欢观看景色。他抱怨说：“纽约到处都那么脏，脏透啦。”他每天光穿着袜子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嘟囔着：“你瞧地毯有多脏，我的袜子也弄得脏极了。”褒曼不断地劝他：“你往窗外看看，这是全世界最使人兴奋的城市了。”可是彼得说什么也不喜欢。他恨不得马上动身先回瑞典去，把东西收拾好，再到美国来同他们会合。结果褒曼的这番功夫徒劳无益，自讨了个没趣。

彼得走后，她觉得十分冷落。她四处联络，希望早日弄到一部舞台剧，更渴望拍片。

褒曼的瑞典保姆执意要提早返回瑞典，于是她只好带着孩子到好莱坞去。一到那里，她发现大卫和制片厂早就改变了他们计划拍《圣女贞德》的主意。不过褒曼想，既然她已经到了好莱坞，大卫好歹总得找点事情给她做的。

大卫把她借调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去拍由格里哥里·托拉夫导演的《大家庭》，这是根据小说《遗产》改编的影片。由华纳·白斯脱扮演男主角亚当。在影片中，褒曼作为一个新来的家庭女教师到亚当家去照管他的4个孩子。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故。1907年股票市场大崩溃使他倾家荡产，一夜之间由大富商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女教师被送回了法国。转眼10年过去了，亚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重整旗鼓，又撑起了一份家业。他派人接女教师回去。4个儿子也相继从战场上

返回家园。经过这番人生的拼搏浮沉，亚当终于悟到，他早已深深爱上了女教师。影片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告终。

这部片子并非上乘之作。不过只要人物和主题合情合理，而且又具有鲜明的个性，褒曼总是力争把它演好演生动。

影评家对她演的这个角色予以好评：

“无论如何，”《旧金山新闻》的玛丽·艾伦·李维写道：“她叫你感到可信。”

“随便哪个人，”凯·布朗小姐赞叹说，“既然能把像《大家庭》这样一部平庸之作演到这种水平，她必定是前途远大的。”

“不错，我总算字字句句都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褒曼说。在第一次看样片时，她对此感到满意。

清晨3点钟拍完了《大家庭》，7个小时之后她又投入了拍摄工作，同罗伯特·蒙哥马利和乔治·山德士一起合拍《天堂怒火》。

开拍的第一天，罗伯特·蒙哥马利来到褒曼的化妆室。前些时候他曾经领衔主演了米高梅导演的电影《黑夜降临》，他扮演一个精神变态者，获得成功。米高梅这次又请他再演一个大体雷同的角色，大概想取得再一次成功。不料罗伯特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说演这类角色本来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这次他偏偏不打算认真表演。褒曼听得莫名其妙，他身为演员，却不打算认真表演，这难道行吗？

“我很抱歉，在同你合作的时候不得不过来这么一手，可是这部片子是人家硬逼我演的，所以我打算只念念台词，而不想认真表演。”

“可是，那部片子怎么个拍法呢？”

“我也不知道，我豁出去啦，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偏偏不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去理睬那一套。我嘴里叽哩咕噜念念台词，但是我不认真表演的。”

罗伯特做了一番解释。原来他签了长期合同，就是那时候大多数演员签订的为期7年的合同，包给了米高梅公司。他按月领取薪水，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他演许多部片子，而且不论是什么样的片子都得上场。如今，罗伯特成了深受观众欢迎、红得发紫的喜剧演员，片约应接不暇，一部片子刚拍完就被催着去拍另一部，像是站在传送带上那样，弄得他精疲力竭，劳累不堪。他曾经恳求他们给予照顾，可是他们对他：“办不到！”结果他又给派到这里来演《天堂怒火》了。要是他拒绝不演的话，他们会停发他的薪水。

正式开拍了。导演讲解了一通，启发罗伯特应该怎么演出。罗伯特仰面朝天翻着白眼，似乎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导演说：“喂，鲍勃，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在讲些什么？”罗伯特含混地说：“不就是拍这个场面吗？行呀，咱们动手吧。”于是他就使出了那一套光念台词的表演术，既没有情感艺术，也没有语调变化，老是那一副一成不变、阴阳怪气的腔调。

第一个导演呆了半个月便呆不下去了。换了第二个导演，罗伯特·蒙哥马利照样拿出这个法宝，他面孔呆板，像是戴了一副假面具似的。第二位导演也只好溜之乎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便派来了导演W.S.

鲍勃，罗伯特的昵称。

范达克先生……

C W.S.范达克（其人绰号叫“木头人”）是好莱坞影坛老将。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急于求成，一心只想早点把片子拍出来，其实他对导演之道并不精通。在褒曼看来，他所缺少的只是一根皮鞭和一支手枪。褒曼和他展开了一场“白刃战”……

褒曼知道范达克先生素来被人看成是冷面人。他像个大兵，穿着马裤，脚踏长统皮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成天吆喝训斥别人，叫人畏而远之，褒曼一点也不喜欢他。对于罗伯特来说，倒没有多大关系，他照样叽哩咕噜念他的台词。而褒曼可作难了，因为她还是想尽力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再说罗伯特演的又是个从一家法国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被人认为是潜在的狂躁症患者，所以他容易应付一些。乔治·山德士受够了罪之后，无聊得整天闷头大睡。他只是打着呵欠走出化妆间，把他那一小段演完，又回去睡觉了。他对这部片子根本不放在心上。

在这种情况下，褒曼不可能心情舒畅地工作。那位导演总是在高声大叫：“赶快拍出片子来。”“我们赶快把片子拍完，好把外景地腾出来。”“我们还得加油干哪。”催得人心烦意乱。褒曼一气之下跑去找大卫·赛尔兹尼克诉苦：“你老是对我说：一旦要是遇到困难，你会来帮忙的。现在请你同他说说，要么再换个导演，要么把我换下来另请别人。我没办法同这个家伙在一起工作。他哪里是导演，他本来应该去指挥士兵。对演员们难道也可以这样指手画脚耍威风？他根本不知道怎样用感情来待人接物……”

“哦，”大卫为难地说道，“哎呀，我确实难于从命，去对另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进行干预。况且范达克又是名导演，且经验丰富。凑合拍一部片子算了。再过一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下一部片子会好一点的。我对你拍完这部片子以后干什么，已经作了安排，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

褒曼心里很清楚，大卫把她租给别人当摇钱树。褒曼一生中从来没有拍过半途而废的电影。这一次她也是愿意善始善终的，她只是要把自己对这位导演的看法说个明白。第二天，当导演跑到她的化妆间催她上场时，她火冒三丈：“你干吗不到军队里去混日子呢？那样你就可以横冲直闯，到处乱嚷嚷。你根本不懂得人的感情。你难道可以对一个女人呼来喝去耍威风吗？你把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只晓得一味催着‘把片子拍完’，也不管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你根本不容许我们有可能从从容容地表演。在拍片中你也不给我们任何指点。为什么你不去弄双旱冰鞋穿上呢？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快地从一个地方冲到另一个地方吗？”

范达克万万没有想到有人敢这样对待他，他顿时吃惊得目瞪口呆，他说：“哼，你这个黄毛丫头，你要是以为可以这样放肆地对你的导演讲话，你可打错了算盘。我不妨告诉你，你会吃苦头的，你将被解雇……”

“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呢，我跑去找赛尔兹尼克先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他不肯把我从这部片子里撤下来，所以你行行好，干脆立刻把我解雇算了。”

他一言不发扭头就走。过了不大工夫，他又回到褒曼的化妆间，问道：“难道我真是那么不近人情，对人蛮横和叫人望而生畏吗？”

“一点不错，你正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同这样叫人讨厌的人在一起工作过。”

“咳，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过我尽量改正就是了。你可知道，你的这个角色演得很好。”

“我尽力而为，不过我很不快活。”

这场交锋就到此为止。那部片子几经周折总算勉强发行公映了。罗伯特由于片中别开生面的表演，得到了新闻界的交口称誉。他本是个轻松的喜剧演员，好莱坞的天之骄子，人人都对他趋之若鹜。如今他一反自己本来的戏路，扮演一个精神变态的癔病患者，演得平淡呆板之极，大家反倒觉得妙不可言。

影评家们对剧情本身或导演一无好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德华·巴恩斯在他的专栏里坦率地写道：“《天堂怒火》是一部以精神病患者为主题的影片，它在所难免地具有狰狞的外表，而恰恰缺少了情节剧所必不可少的引人入胜的喜怒哀乐。然而英格丽·褒曼竟能单枪匹马在这出戏里创造出了一种使人心惊胆寒的恐怖感。假如我们影业界再拖宕下去，对她的伟大天才视而不见的话，那将是它的一大污点。”

好莱坞专栏作家劳拉·帕逊斯写道：“英格丽·褒曼是个色艺双全的女演员。我真迷惑不解：为什么明明一个具有同葛丽泰·嘉宝的气质、才华和智慧不相上下的瑞典女演员近在咫尺，米高梅公司却要煞费苦心，去曲意迎合嘉宝孤芳自赏的怪癖。”劳拉·帕逊斯显然没有察觉到，英格丽对这位绝代无双的国色天香葛丽泰·嘉宝仰慕已久，根本没有妄念或野心取而代之，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同她一较高低。

D 嘉宝确实是个美色可餐的女人，也是全美国的影后。褒曼觉得嘉宝的演技出神入化。嘉宝对褒曼存有戒心……

长期以来，嘉宝不愿意同褒曼见面。褒曼第一次到好莱坞拍片的时候，彼得就关照说，为了表示一点心意，褒曼应该给她送束鲜花。褒曼一到那里就这样做了。褒曼在那里住了3个月，离开好莱坞的前几天她收到了嘉宝的回报电报，说希望褒曼有空时，彼此见见面，并记下了褒曼的电话号码。

稍后些时候，褒曼曾向与葛丽泰莫逆之交的乔治·库柯尔谈及这件事，并对同葛丽泰·嘉宝失之交臂表示惋惜。乔治嫣然一笑说道：“要晓得，葛丽泰要是知道你离开好莱坞的准确日期的话，她肯定是不拍这份电报的。”

褒曼来到米高梅公司的拍片场拍摄她的第二部好莱坞影片《大家庭》时，见到了葛丽泰。褒曼的化妆间是在故事片大楼里。当时明星大楼早已人满为患，只好把她挤到那里去了。按照好莱坞的规矩，凡是明星，名字就出现在影片片名之前，而一般的班底演员名字排列在片名之后。葛丽泰不消说是在明星大楼里有化妆间的。

在停车场里停着两辆黑色高级轿车，一辆专送葛丽泰到场景区去——因为场景区通常在1英里之外，另一辆是给褒曼坐的。褒曼立即说道：“我不需要汽车，我喜欢步行。”

最后是鲁思制止了褒曼，说道：“别那样，要是你走着去的话，司

机的饭碗就会砸掉了，而他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养活呢，还是乘车去吧。”

嘉宝和褒曼都是瑞典人，十分讲究准时，所以第一天她们俩人赶巧准时在 9 点走出她们的化妆间去乘汽车。两辆汽车并排停在相距几米的地方。可是嘉宝佯装不见，根本不和褒曼打招呼。褒曼也只好硬着头皮，没有笑容地相迎上前去和她打招呼。为了不使她难堪，从那以后，褒曼出化妆间后先要趴在窗台上看嘉宝走了以后，才匆匆跑下去钻进自己的汽车。

第二天她们又差一点碰面。正值瑞典动画片家艾纳尔·奈尔曼在好莱坞工作。褒曼跟他相识多年，而他同葛丽泰也是忘年之交。他说他们夫妻俩要请褒曼和嘉宝一道吃顿午饭。过了一会儿他又面带歉意地传话，说是嘉宝讲她还不准备同褒曼见面。这真给了褒曼一个不小的刺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褒曼到艾纳尔家里去做客。他说：“现在你别忙着走，嘉宝过几分钟就要到这里来看我，且留一下吧。你务必要见见她才好，你们的气质是那么相像。你们俩一定会谈得投机的。”可是，褒曼却说：“艾纳尔，我不能留下，我知道她不想见我，那种见面会怎样，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于是褒曼走了。

几年之后，褒曼同丈夫拉斯·施密特在巴巴多斯出席一个盛大的午餐会。突然之间涌进来了一大群宾客，前呼后拥地陪着葛丽泰·嘉宝进来了。褒曼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心想，难道他们还要再来一次冷脸相对吗？

褒曼抽身走到大花园里去了，那里只有几个客人在小声交谈。拉斯和别的瑞典人像众星拱月似的围着嘉宝高谈阔论。褒曼看到嘉宝的视线朝着她的方向转来。过了半晌，嘉宝走到花园里来，在褒曼身边坐下。一时之间，褒曼的神经紧张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倒是嘉宝先打开了话匣子：“我听说你爱上了巴巴多斯，要在这里买块地皮，是吗？”褒曼接口说道：“是呀，我非常喜欢离这不远的那个海滩，我们计划着盖一幢小房子……”

“哦，我可不会那样做，因为这里的人什么东西都偷。”

“我们没有打算盖一幢豪华的公寓，只是一个小天地，里面摆上点粗糙的家具而已，既不摆古董，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我们每年只来住上一两个月，别的时间都租出去。”

“不过他们会偷你的衣服。”

“衣服？可是我带到巴巴多斯来的统共只是一件游泳衣、一双袜子和一条长裤。他们果真要拿的话，那就随便他们拿好了。”

嘉宝不再多说什么，站起身来走开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褒曼想，也许嘉宝的这一席话正好说明了她的人生态度：她生怕有人来把她的财富统统偷走。

褒曼想：他们第一次在好莱坞拍片邂逅的时候，最叫人伤心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时褒曼在好莱坞才崭露头角，发迹走红，嘉宝竟然未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已是昨日黄花、日薄西山了。

当时嘉宝正拍一部叫《双面女人》的片子，那部片子失败了。葛丽泰·嘉宝意气消沉心绪沮丧，决意从此不再拍片。当时她芳龄不过 35 岁，风韵犹存，而且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明星。她竟从那一天起不再涉足影

坛，从银海中消失了。嘉宝没有儿女，她一人形影相吊地独自生活着。

E 海明威的建议使褒曼的生活地平线又升起了一颗成功之星。她主演《丧钟为谁而鸣》（电影改名《战地钟声》）一片的女主角——一个被损害被强暴的女人……

大卫·赛尔兹尼克终于明白过来，他早已自食其言，因为他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许诺过，只有最精彩的电影脚本才配得上褒曼去演，所以在选择剧本时更加谨慎，宁缺毋滥了。斟酌再三，他终于告诉褒曼，要派她同她所喜爱的男演员史宾塞·屈赛一起领衔主演根据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古典恐怖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化身博士》。

赛尔兹尼克还给她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拍完《化身博士》之后，他将在6月份在圣·巴巴拉区“赛尔兹尼克”新剧院主演尤金·奥尼尔的舞台剧《安娜·克里斯蒂》。与此同时，她个人生活中的地平线上又冉冉升起了第三颗光辉夺目的星星。《生活》杂志报道说：美国大作家海明威的那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已改编成电影《战地钟声》。他决意要亲自挑选演员来主演这部电影。他选中了褒曼来扮演那个惨遭法西斯匪徒强奸的少女。这个可怜的姑娘逃入荒山野林之中，在游击队里找到了栖身避难之所。女主人公叫玛丽亚。海明威以前曾经看过褒曼演的《插曲》，觉得由她来演这个角色是十分合适的。

褒曼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她非常喜欢《化身博士》这部片子，她也乐意演尤金·奥尼尔导演的《安娜·克里斯蒂》一片。然而，玛丽亚这个角色却从天而降！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她心急如焚地等待这部片子的开拍。

大卫·赛尔兹尼克要褒曼演奇格尔博士的温静贞娴的未婚妻那个角色，大卫根本没有想到褒曼自有打算，也不知道她早已同那个才华横溢的导演维克多·弗莱敏在背地里谈论这件事了。

F 试演一个酒吧女郎——荡妇。她想改变银幕形象，从一个峰峦攀上另一个峰峦……

不消说，像似往一样又派给褒曼演端庄贤淑的未婚妻。她已经一连演了3个类型相同的窈窕女郎了。在《插曲》里，她演的是温文尔雅的女钢琴教师。在《大家庭》里演的是贤惠得体的女管家。在《天堂怒火》里演的是一个落难的女人。现在，他们在《化身博士》里分给她演的还是个窈窕淑女，她对演这一类角色感到索然无味了。她去找弗莱敏先生说道：“难道我们不能对调一下角色，让拉娜·透纳演未婚妻，让我来演那个又风骚又极富魅力的小艾慧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那可不行，你的这副长相怎么能演那种角色呢？那样会叫人看了觉得不逼真的。”

“何以见得呢？你看看我，再看看我演过的3部影片，要知道我演的完全是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是个女演员！”

他扮了个鬼脸说道：“我不相信你能演好。我意思是说演一个酒吧女郎，一个荡妇……那是拉娜·透纳的拿手好戏。”

“你让我试个镜头好吗？”

“不过大卫·赛尔兹尼克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试镜头的。你已经拍了3部重头片。试镜头意味着测试一个新演员的素质，你不在此列，不言而喻，你已经是个大明星了。赛尔兹尼克先生绝不会这样做的。”

“我们先不告诉他就试镜头好了，行吗？”

茱莉安非常惊异，问道：“这么说来，你当真是想演这个角色？”

“我当然真心想演。我早就打算演这种类型的角色了。怎么样，咱们试个镜头吧。”

维克多悄悄地叫来了一个摄影师和一组摄制人员给茱莉安试了镜头。事后有许多人询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首先，她对酒吧女郎着了魔，一直把她记在心头，揣摩她的感情反应和言谈举止。其次，她的确想换演一下不同的角色，她总不能老演好莱坞的吃奶油加蜜桃的女人。

这次试镜头给维克多·茱莉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打电话给大卫·赛尔兹尼克说：“大卫，我想变动一下阵容，让英格丽去演艾慧。”

大卫嚷起来了：“那是强人所难，她演不了那种角色。”要知道，大卫对好莱坞不成文的规矩是坚信不疑的：演电梯司机的就只能演电梯司机，演醉汉的就一直演醉汉，演护士就一直演护士，在好莱坞你演了一个角色就终身演下去。

维克多说：“没错，她一定能胜任。我已经试了一次镜头，你要看看吗？我派人送过来。”他果然把样片送了过去。

大卫拉长了脸，无可奈何地说：“嗯……好吧。”

当时局势已日趋明朗：欧洲这场战争正在你死我活地相搏，势必是一场持久战。对于一个身在异国、想成大器的女演员来说，那里是前途渺茫的。所以，彼得和茱莉安都断定，他俩都只有在美国才能找到出路。饱尝长途旅行之苦后，彼得终于在1940年圣诞节前夜来到好莱坞与茱莉安和孩子团聚。

1941年新年伊始，他们全家到太阳谷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大卫打电话告诉说：海明威夫妇已经到了旧金山，稍事停留后即将到中国去。如果茱莉安能及时赶到的话，大卫已经安排了她同海明威见面。茱莉安和彼得立即动身，星夜兼程，总算到达了旧金山，在一家饭店里同海明威和他的妻子玛撒·盖尔霍恩晤了面。茱莉安在雪山上滑了一星期雪，脸晒得黑黝黝的，模样很难看，鼻子上还脱了一层皮。海明威朝她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行呀，我想我大可不必担心了。”

他问起茱莉安的耳朵怎样。他意思是问茱莉安的耳朵长得是什么模样，因为玛丽亚的头发剪得很短，耳朵要露在外面，所以不能太难看。可是她以为是在问她“你的听力如何？”她回答说：“谢谢你，哦，我的听力很好。”

茱莉安对海明威说：“真奇怪您要挑我来拍这部片子。因为我是北欧人，我万万没有想到您竟会挑我去演一个西班牙女郎！”

海明威说：“我看到过有你这样长相的西班牙人，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不必担心，你会得到这个角色的。”

然而茱莉安还是放心不下，因为她知道最后拍板敲定的不是原著作者，而是派拉蒙电影公司，而风闻他们已另有选择了。后来，海明威启

程到中国去，这件事也就毫无下文了。

休假结束以后，彼得返回纽约，在罗彻斯特区找了住所，决心攻读为期两年的进修课程，以便取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另一侧，褒曼在贝弗利山租赁了一套不大的公寓房间，雇了一个名叫玛贝尔的黑女人管理家务。两岁半的小皮娅学起英语来比大人要快。褒曼有一辆汽车，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它是一台破旧不堪，颜色像老鼠，任何人不屑一顾的末等车。褒曼早拒绝乘坐由专职司机开的黑色高级轿车，因为她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年迈的米高梅公司摄影场的停车场管理员仍然记得：有一天晚上，褒曼发现别人的一辆汽车的保险杠和她的汽车保险杠卡在一起了。她手忙脚乱地折腾了老半天，等这位管理员过来帮忙时，她已经成功地把它们分开了。褒曼眉飞色舞地对他微笑着。“这是我一辈子所见到的第一个不在乎用自己双手去干脏活的电影明星。”——这是他的评语。

G《化身博士》是她在美国拍的第一部彻底改变她的戏路的片子，她的艺术思路无疑是从这部片子开始渐渐拓宽了……

史宾塞·屈赛心情很不痛快，他不喜欢演这个集双重性格于一身的角色：既要演翩翩君子的奇格尔博士，又要扮凶煞恶魔般的海德先生。他要演出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最好能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电影明星的那种多愁善感的风流小生的角色。

而这恰恰是褒曼想做的……她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她想把世界上每个角色都演遍。

史宾塞对许多场面都不喜欢。尤其是他抱起褒曼飞奔上楼，直奔卧室去干云雨之事的这个场面。维克多·茱莱敏作了示范表演：他应该是身材粗壮、力大如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抱起来奔上楼梯，就好像她没有什么分量似的。史宾塞失声叫苦不迭：“哎哟哟，吃不消，我的疝气发作了，怎么办？”于是，他们连忙赶制了一个网兜把褒曼腾空托起来，用卷扬机把她拉拽上去，史宾塞只消紧随着她，看起来好像是他托抱着褒曼。

但是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次他们把褒曼拉拽得太快，史宾塞跟不上步子。茱莱敏吩咐说：“用自然的速度把她拉拽上去，再来一遍。”那是难度最大的地方，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没有达到拍摄效果，一整天的时间都消耗在这个动作上了。试到第二十次，绳子绷断了，褒曼跌到史宾塞的怀里，他经受不住，两个人就脑袋向下骨碌碌地滚了下来，一屁股摔到了楼梯底下，他们两个人居然一点都没有受伤。他们滚到楼梯底下纵声狂笑起来，笑得直打滚。这时候，维克多急匆匆跑来，满脸惊恐和关切，一看他的两个明星都安然无恙，这才算松了口气，可以继续放手地拍下去。

褒曼觉得维克多·茱莱敏很了不起。尽管她在瑞典曾经结识了不少出色导演，但维克多·茱莱敏却具有她未曾领教过的绝招。只消他一走近褒曼的身边，褒曼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心领神会，要她做什么。在褒曼的影坛生涯中很少有哪个导演有这手绝妙的功夫。她可以感觉得出来导演是不是满意，是不是犹豫不决，或者十分欣喜。维克多能启发褒曼

的表演思路，把她自认为表演不出来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部片子里有个场面，他要这个姑娘面对着面目狰狞的海德先生，吓得心神错乱，魂飞魄散，歇斯底里大发作，最后瘫作一团。她怎么都进入不了这个角色。最后维克多恶狠狠地扑上来，抓住她的肩胛，死命地摇得她晕头转向，又左右开弓打了她几个耳光，下手很重，痛得她眼泪夺眶而出，连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反正眼泪顺着脸庞刷刷地直淌下来。褒曼被他这种粗暴的行为吓蒙了，直僵僵地站在那里哀哀哭泣。就在这时，维克多转身回到摄影机旁，大声喝道：“开拍！”褒曼只好一边流着泪一边走上场去，甚至摄影师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但是维克多·弗莱敏却取得了他所需要的精彩效果。等到这部片子拍完，褒曼已经深深爱上了他。他倒一点也没有钟情于褒曼——褒曼只不过是导演的一部影片中的一个女角色而已。

这段时间褒曼在日记中写道：“任何成功都不是轻易得来的。点点滴滴的成功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在《天堂怒火》这部片子里吃尽了苦头，才换来了《化身博士》的成功。为了这部片子，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代价。……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如的表演，把自己的演技完全发挥了出来。我第一次冲破了束缚我的樊笼，朝着广阔天地迈了一大步……我觉得束缚住我手脚的锁链已经被我挣脱了，我可以飞得更高了。”

第六章 敲响生命洪钟

A 1941年8月1日，《圣巴巴拉新闻报》的记者们对那天晚上“明星荟萃”的首场演出作了精彩报道，一派颂扬……

“星期三晚上，大卫·赛尔兹尼克夏季戏剧节在洛贝罗剧院开幕，上演尤金·奥尼尔的经典剧作《安娜·克里斯蒂》，由褒曼扮演女主角。看到演出时观众如醉如痴的情景，电影制片人喜上眉梢，对她称赞不已。俊俏的金发女郎拉娜·特纳坐在观众席上，依偎着歌手托尼·马丁。装模作样的乔治·拉弗特形影孤单。以米高梅公司的山姆·高德温为首的一大帮制片人以及著名导演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和罗本·马摩里安也在场。出席观看的还有笑容可掬的罗伯特·班奇莱，皮肤微黑的大个子凯·弗朗西斯，风采迷人的奥莉维亚·德哈维兰，相貌英俊的艾伦·马歇尔，以及活泼潇洒的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和李却德·巴泽尔美思。”

那天晚上，褒曼一出场就把观众逗乐了。

在她扮演的安娜·克里斯蒂还未出场时，她父亲就向观众絮絮介绍她女儿如何如何可爱。瞧，她的宝贝女儿来看他了。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个什么人呢？一望而知是个妓女。

褒曼一进门就喊酒吧伙计：“来一杯威士忌，要双料的！”

观众哄堂大笑。大概他们以为她会说：“给我来一杯牛奶。”

他们给观众来了个出其不意。

从此以后，美国报刊对褒曼的崇拜和倾慕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持久的爱慕后来达到高潮，变成偶像崇拜，以后就像气球一样在斯特龙博列火山岛上空爆炸，成为有浓厚象征主义色彩的戏剧性事件。纽约的《下午报》在1941年8月31日作了这样的描述：“褒曼小姐是记者眼里的绝代佳人。她不用化妆足以展露玉容花貌，她有时还突然面红耳赤。她不雇报界代理人。她看电影还亲自排队买票。总之，她的举止与常人决然不同。她有才华，还有其他旁人不及的魅力，真是影坛奇闻。因此，风闻褒曼小姐突然放荡不羁，卖弄风情，至少演戏时是这样，人们颇感诧异。最近米高梅公司特邀她扮演《化身博士》中的酒吧女郎。本周将在枫树林剧院演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为该剧院增光添彩。有人请褒曼小姐谈谈她突然改变角色的原因，她泰然自若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主意。我丈夫对我说，宁可在末流电影中演好人，也别在好电影中演坏人。而我则希望把影片拍得完美无缺。”

来自美国各地的报道都证实了这一点：她这个在影坛上崭露头角的瑞典女人是质朴无华的。旧金山一家报纸说：“自从北极光照到赤道以来，没有一个演员像英格丽·褒曼那样轰动过好莱坞。这位脸蛋儿像红苹果一样、24岁的斯德哥尔摩少妇，既像新捏的瑞典雪球一样洁白无瑕，又像走近餐桌、将头一次品尝斯堪的纳维亚式小吃的农村姑娘一样天真朴实。她身居好莱坞明星的殊荣地位，对观众倾倒好莱坞的那股狂势却一无所知……”

大卫·赛尔兹尼克称褒曼为“手持橄榄枝的嘉宝”。桑顿·德拉哈

指瑞典电影明星嘉宝到好莱坞演戏以来。

蒂说：“和英格丽一起吃午饭就像坐下来和会说话的、美丽的兰花谈心一小时一样。”

评论家们对《化身博士》也大加称赞。霍华德·巴恩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评论说：“大名鼎鼎的史宾塞·屈赛演主角，最有才华的演员英格丽·褒曼演配角中的主角，拍制过许多电影，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的维克多·弗莱敏当导演，该片拍得出色异常。”

B 在 1940 和 1941 年的兴奋和旺盛时期之后等待她的竟是想不到的艰辛……

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的褒曼，在《利里奥姆》剧中演得很成功。她兴致勃勃地参加《安娜·克里斯蒂》的连续演出，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季。她在 3 部好莱坞影片中演主角。其中的《化身博士》，她一直认为是她演员生涯中的分水岭。在这部影片中，她得到允许，跳出好莱坞和大卫·赛尔兹尼克为她划定的“高雅圈子”。她还积极准备扮演海明威小说中的玛丽亚，希望能如愿以偿。

1941 年秋，记者报道说，褒曼将到罗彻斯特与其丈夫和女儿团聚，稍事休息。其实对她来说，休息似乎是不可能的。罗彻斯特很美，是彼得喜欢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租了一幢舒适的住房，只是离好莱坞太远。婚后这些年来，从 1938 年到 1941 年，褒曼和丈夫同居的时间总共有 12 个月……而现在她又得匆匆往返于好莱坞和罗彻斯特之间，总是行踪不定。

自从贾莱·古柏在《战地情天》影片中第一次扮演年轻的士兵以来，他和作家海明威就成了朋友。海明威认为只有古柏才配扮演《战地钟声》中爱上玛丽亚的美国大学教授罗伯特·乔丹，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借古柏到派拉蒙公司拍片，该公司与米高梅公司打了许多交道，最终谈妥。在选择谁扮演玛丽亚的问题上，由于情况不同，派拉蒙公司的考虑也就不一样。该公司同漂亮的女演员、著名芭蕾舞演员维拉·佐林娜订了合同。海明威推荐褒曼扮演玛丽亚，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但他们既满足了海明威的愿望，又不必再花 15 万美元另请明星演玛丽亚，而把等待拍片的维拉换下来。

褒曼为没能得到扮演玛丽亚的机会深感遗憾。她很焦躁，也非常沮丧。她满以为可以跟着赛尔兹尼克拍片，可是从 1940 年 1 月他给褒曼打电报说要拍一部描写贞德的影片以来，他连续数次延缓和改变计划，始终没有拍成。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样闲着没事干，她受不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深切感到人必须工作，必须有所作为。

这是褒曼一生中最坎坷的岁月。1941 年 8 月底，她还自鸣得意，电影公司竞相要她拍片。到了 1942 年春，她却垂头丧气，整日郁郁寡欢。她以为自己将成为罗彻斯特最漂亮的家庭主妇，而她的影坛、剧坛的黄金时代已就此结束。凯·布朗去好莱坞回来说，那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但已把她排除在 5 大明星之外。褒曼并不在乎人们把她划入哪类演员之中，她只想拍戏。此时她阅读了许多瑞典文、英文和德文的剧本、脚本、长篇短篇小说、手稿等。

褒曼想，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各种角色，她演了还不到四分之一呢，现在就要扮演奶奶姥姥了。好莱坞每年都摄制几百部电影——为盟军打

气的电影，激励人们向上的电影，使人开心和催人落泪的电影。难道没有一个她可以扮演的角色吗？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英格丽是宝贵财产，可不能让她演一部下九流的片子而毁了她的前程。”“英格丽吹灭了熊熊燃烧的瑞典之火。她不是‘财产’。她需要扶持。”……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互相矛盾。这段时间，褒曼内心十分忧郁。

C《卡萨布兰卡》一鸣惊人，夺奥斯卡金奖，成为经典之作。好莱坞的意志不可违背，好莱坞的票房价值观似乎是永恒的。她决不能随心所欲。……

1942年4月21日，褒曼接到了等待近一年的消息：她被邀请去拍一部新片。在写给女友鲁思的信中她说：“我接到消息时，既觉得热乎乎的，又感到凉飕飕的。过一会我就浑身发冷，头痛得似针刺，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我真没想到我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晚饭时我想用酒来庆祝一番，喝个酩酊大醉，可是我喝不下去。我想哭，想笑，但是我又哭笑不得。我心绪不安……要我拍的影片叫《卡萨布兰卡》，那是描写什么的，我实在一无所知。”

1942年5月，褒曼驾驶着褐色小汽车在笼罩着黄昏的大道上奔驰。她又回到了好莱坞。

在拍《卡萨布兰卡》时，她感到就像回到家园一样。大卫·赛尔兹尼克喜欢这部影片，因为褒曼终于又要穿上漂亮的长袍和裙衫，显露出她自己特有的气质和风采。

《卡萨布兰卡》的导演迈克尔·柯蒂芝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才华的匈牙利籍导演。他对褒曼老调重弹：“英格丽，你大错特错了。那不是美国的做法。好莱坞要求演员扮演的角色造型固定化。只有这样才能迎合观众，才能卖座。观众花钱看贾莱·古柏，是为了看他本人，而不是为了看‘圣母院的驼子’。你想换换花样，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岂不是要毁掉自己的前程？从现在起，你应该想到自己是英格丽·褒曼，你应该不嫌单调和重复，始终扮演同一种角色。这样你的迷人之处就会得到发展，观众就会信服并为之倾倒。”

褒曼说：“不，我不那样做。我要演不同类型的角色。我要尽量拓宽我的戏路。”

褒曼喜欢迈克尔·柯蒂芝。他是一位好导演。《卡萨布兰卡》进入拍摄阶段后，一切紊乱不堪，责任并不在导演。从第一天起，制片人哈尔·沃利斯和编剧爱泼斯坦兄弟就争论不休。每天午饭时，迈克尔·柯蒂芝都要和哈尔·沃利斯舌剑唇枪一番。剧本中有许多地方必须修改。他们每天拍摄的仅仅是即兴表演：每天他们把台词交给演员，演员们就努力去领会其中的内涵。谁也不知道剧情将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影片如何结尾。这对演员独立思考和刻画人物性格很不利。每天早上他们都嚷嚷：“要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在这里干什么？”迈克尔·柯蒂芝的回答是：“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今天先拍这场戏，明天再告诉你们。”

褒曼困惑不解，她不知道怎样表演，是爱保罗·赫里德呢？还是爱汉弗莱·鲍嘉？

“还不清楚哩——你就好好演吧……不偏不倚好了。”

在拍摄中，她无所适从。她不敢用眼神对汉弗莱·鲍嘉表示爱慕，

因为那样一来，她就非得用与此相反的感情和眼神去看保罗·赫里德了。

在影片的结尾，女主角是跟丈夫同乘飞机出国呢？还是留下来跟汉弗莱·鲍嘉在一起？他们拿不定主意，因而决定拍摄两种结局。于是，他们先拍第一种结局：女主人公向汉弗莱·鲍嘉挥手告别，跟保罗·赫里德同乘飞机出国。接下来的镜头是：克劳德·雷恩斯和鲍嘉一面向雾霭弥漫的远方走去，一面说：“路易斯，我想这就是如花似锦的友谊的开始。”（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此时大家都叫起来：“停！就这样了！不必拍另一种结局了。好极了，结束语很妙。”

在演员未说出这句话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影片的结束语。他们也肯定没有料到，这部影片将成为经典之作，它终于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拍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剧本的问题，大家都有点紧张。褒曼几乎不认识汉弗莱·鲍嘉就和他一起演出。褒曼吻了他，可是并不认识他。他当然彬彬有礼，但褒曼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

褒曼说，她拍完这部影片时，要是有人告诉她，由于拍这部影片，她已成为20世纪电影传奇中的人物，她一定会说：“不——”，她把“不”字拖得很长很长。

D “一个27岁的瑞典女人终于把钟敲响了。”海明威的诺言和褒曼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使她如愿以偿：她被邀请出演《战地钟声》的女主角玛丽亚……

褒曼在拍《卡萨布兰卡》的时候，就开始听到外景区传来的消息，说《战地钟声》拍摄情况不妙。

麻烦在于维拉是个芭蕾舞演员。拍《战地钟声》的外景时，女主人公得像野生动物一样在山上来回奔跑。维拉怕碰伤自己的腿，腿对她来说十分重要。派拉蒙公司在审看山上拍摄的第一批样片时，这种毛病就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作出决定：维拉不宜拍这部影片。他们把她从《战地钟声》的摄制组调出来，让她去拍另一部影片。

褒曼原准备拍完《卡萨布兰卡》后就回罗彻斯特市，回家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从赛尔兹尼克办事处突然传来消息：派拉蒙公司要褒曼去试镜头。他们绝不是想试她的演技，对此他们了如指掌。他们是要问她是否愿意把头发剪短，看看她的头发剪短后的头部造型。褒曼说，如果让她扮演玛丽亚，砍掉她的头她也在所不惜。《卡萨布兰卡》一片刚停机，第二天褒曼就去试镜头。他们并没有剪短她的头发，只是把她的头发往后一拢，用发夹往后面别住。

山姆·伍德订于星期日来审看试拍的镜头，然后立即给褒曼打电话，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她。褒曼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她整天守候在电话机旁，不思饮食。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机，仿佛那是一条要噬人的蛇。电话铃突然响了。她急忙拿起听筒，原来是丈夫彼得从罗彻斯特市打来的电话。“有消息没有？结果如何？”她说，有了好消息就给他去电话。她放下话筒，两眼直溜溜地继续盯着电话机，一直盯到半夜。山姆·伍德没有来电话。褒曼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试镜头的画面不满意，他难以启齿，所以没给她来电话。

第二天，她在华纳公司的摄影场拍《卡萨布兰卡》的电影剧照时，

有人走过来说：“英格丽，请接电话。”褒曼走过去，把耳朵贴近听筒。啊，是大卫！他的高嗓门儿发出深沉的声音：“英格丽，请你扮演玛丽亚！”

美国西部一家“电影迷”杂志还对褒曼的脸部表演作了一番描述：“英格丽在电影中美丽迷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她时，总端详她的脸庞。确实太美了。美在哪儿呢？前额、眼睛、鼻子并非纯古典式的。嘴唇呢？是弯曲的，简直美极了。可是，这些并非她全部的个性特征。她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火样的热情。对啦，这就是她为什么美的原因。热情奔放，她全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对此，褒曼并不完全同意。

褒曼接完大卫·赛尔兹尼克的电话，转身就走。她的心里又像升起了一团火。华纳公司的董事们欣然同意她立即启程到山上去拍片。

她驱车前往450公里之遥的内华达山，途经曾出现过“淘金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灵·坎普和波克尔·弗拉特。

她的汽车飞速穿过小城索诺拉，横穿索诺拉山路，来到外景拍摄场地。那里有几间专门搭起来的木房子。她一下汽车就怀着几分茫然的神情环顾四周，妙不可言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个拍摄外景的场地简直是上帝安排的。

不一会儿，褒曼看见一个魁梧英俊的男人从山上朝她走来。他看了褒曼一眼，褒曼也瞅了他一眼，褒曼的脸颊顿时红了起来。他就是贾莱·古柏。他先向褒曼打招呼：“喂，是玛丽亚来了吗？”褒曼的脸又红起来了。他又说：“我们最好一起找山姆·伍德去。”找到了山姆·伍德后，他们把褒曼送到安排她和鲁思·罗伯茨住的小木屋去。山姆用手往门外指了指，她看见那里站着—个高大的橡皮人，原来是他们用橡皮人充当战场上被击毙的“士兵”，“士兵”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欢迎玛丽亚！”过了一会儿，褒曼手拿剧本走出屋外，贾莱凑到跟前。他还没有拿到剧本。他倚着旅行车，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褒曼，说：“喂，要不要先练一下我们的对白？”她觉得，用这种眼神看她的人，在好莱坞并不算多。

她说：“好吧！鲁思·罗伯茨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一起练吧？”

说着他就练起对白来。褒曼还以为贾莱在和她闲聊呢，因为他的声音和刚才说话时一模一样，并没有摆出演员的谱。褒曼反复对他说：“对不起，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他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说：“我在练习对白，那是对话。”褒曼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哦，是对白。”

贾莱不论跟谁一起排戏，都使人感觉得轻松自如，也没有什么演戏的感觉。他不是—在排戏，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表情，或者说他是用眼睛在说话。他只是淡淡—笑，说话也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怎么能—这样呢？褒曼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拍完片子后，她还在—反复唠叨：“这难道是在排戏？他根本不是在—演戏。”后来她看了—样片，银幕上的—贾莱个性突出，感染力—极强。眼神和—脸部表情—细腻、含蓄。只有—在—银幕上—才能看到—这一切。褒曼—觉得—他—真是—出类拔萃。她还没有—和—表演—如此—含蓄、—细腻、—自然—和—感染力—如此之—强的—演员—合作—过。

褒曼十分喜欢玛丽亚。从她打算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起，就十分—卖力地—为—演好—这个—角色—而—暗自—努力。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中—对—这个—姑娘—的—深

刻描写，她都心领神会了。一连好几天她独自在屋子里琢磨怎样演好这个人物。她认为：女人一旦坠入情网就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爱好。她心里只想着她的情侣，想着自己在被爱者心中的位置，想着怎样才能使他愉悦、欢乐。她活着，她的存在，只是为了他的需要。

她坐在拍片场地，双目含笑地凝望着贾莱·古柏，看到他，褒曼的心里格外激动和高兴。她不相信自己是在和贾莱·古柏拍电影。

褒曼记起有位记者告诉她，贾莱曾说：“褒曼小姐是最好合作的女演员之一。她从不孤芳自赏，更不会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化妆，一会儿瞅瞅自己的发式，而让我一旁久等。她根本不理睬诸如发式之类的小节，她总是那样从容自如，落落大方。”

听了这些话褒曼心里十分高兴。贾莱·古柏天生气质优雅，真实无华，在银幕上演得栩栩如生，毫无做戏之感。鲁思提醒说：“真的，英格丽，你可别再那样看他了。瞧你坐在那里看得多么出神！我知道，在影片里他是你的情郎，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不能假戏真做呀！”

银幕上的玛丽亚是个传奇的角色，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电影上映后，玛丽亚的短发在美国变成了时尚。少女们争相仿效玛丽亚发式。

1942年，他们在内华达山区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夏天。战争仍在进行。他们没有忘记战争，因为他们这批俄国、波兰、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演员中，许多人尝尽了战争的痛苦和折磨。褒曼也在为自己的祖国瑞典担忧，担心祖国也会遭到纳粹的践踏蹂躏。

生活在这僻远的群山中，他们就像在战争避难所一样。他们大家各住一间小屋，演员们轮流做饭。在这里，闪烁的群星和巍峨的峰峦构成了一幅自然和富有浪漫色彩的图画。入冬之后，千里冰封，这块静土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这里冷热分明。清晨寒气格外浸人；中午骄阳似火；夜晚却滴水成冰。褒曼喜欢拍戏时的全套服装：一条褪色男裤和一件旧上衣。她用裤子围腰，腰间束上一根绳子，时而卷起双袖，时而把袖子放下来，这就是她的换装绝招。他们在山上呆了很长时间，从夏到秋，共两个多月方把外景拍完。拍摄期间，大家和睦相处，合作得很愉快。

虽然《卡萨布兰卡》和《战地钟声》是当作姊妹篇来拍摄的，但两部影片的发行和有关影评的发表却相隔9个月之久。《卡萨布兰卡》首次上映一举成功，每篇影评都充满赞美的声音。《卡萨布兰卡》一片发行后一直很受欢迎，票房价值极高。

当报纸上刊出《战地钟声》第一批评论文章时，大卫·赛尔兹尼克给褒曼拍了电报：

“最亲爱的被保护人：评论家们的评语超不出我多年来反复说过的话。相信你能想象得出来，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其实，他们仍未能跟上我的预言。星期天晚上，我对25个人说：在今年以前你始终将被誉为空前绝后的杰出的女星。如果这一荣誉不会冲昏你这位漂亮的瑞典人的脑袋的话，今后不会有任何东西能使你失败……爱瑞典女人的男人。”

尽管赛尔兹尼克在电报中这么说，可是影评中看法不一。《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该片将文学巨著改编得极好，超过了原著。”而凯特·卡梅伦在《每日新闻》中说：“影片中有许多美丽的、动人的、极其有趣的镜头……可惜全片过于冗长，不是‘引人入胜’，而是‘如同嚼蜡’。”

《时代》杂志作了概括性的评论：“尽管有人摆弄绳子或用布把钟蒙起来，这位 27 岁的瑞典女人还是勇敢地把钟敲响了。自从她的同胞、大名鼎鼎的葛丽泰·嘉宝把半个世界的人的魂勾住以来，人们还没有听见过如此铿锵有力的钟声。”

海明威对这部影片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从中国回来以后，有一次褒曼见到他，满怀希望地问：“你看了电影《战地钟声》了吗？”

他说：“看了，看了 5 次。”

褒曼听了很高兴，便说：“啊，5 次！你很喜欢吧！”

“不，我不喜欢。我进去看了 5 分钟就看不下去，走了出来。他们把我小说中最精彩的那些场面都删掉了，毫无道理。过一会儿我又进去看，因为我感到必须把整部电影看完。我看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就这样，我进进出出一共 5 次才看完这部电影。”

褒曼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战地钟声》却有自己的评价：“那是我拍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我们在山地拍了 12 周，后来又回到摄影棚拍了 12 周。这是派拉蒙公司拍摄的影片中的巨片，耗资 300 万之巨。我个人欣赏这部影片，特别是贾莱·古柏的出色演技。影片的不足之处是，我高兴的心情居然在银幕上有所流露。我实在太高兴了，因此我不能忠实地表达少女玛丽亚这个悲剧角色的形象。”

第七章 她不想做贤妻良母吗

A 她见到了萧伯纳。92岁的萧伯纳，咧着嘴笑得像个矮妖精。他多么希望褒曼再去见他……

褒曼会见著名的英国文豪萧伯纳最初是通过一次电话开始的。这次电话是性格活泼而又热情奔放的匈牙利制片人加布里埃尔·帕斯卡尔打来的。

加布里埃尔·帕斯卡尔在加利福尼亚曾经和褒曼见过几次面，他想让褒曼把《耿直人》演成电影。如果她不愿意把它演成电影，就排演成话剧。但这个想法褒曼也不喜欢。他对褒曼说：“萧伯纳先生希望约你和他到阿纳特·圣劳伦斯的住宅一道喝茶”时，她也有些惊讶。

“那很好。我很愿意会见这位伟大的人物。”

“他愿意见你，”加布里埃尔说，“因为他知道你在美国演了一个圣女贞德，那不是他的作品。他把他的剧本给你送去了。”

他们驱车前往哈福德郡的住宅。萧伯纳住在那里。他92岁了，咧着嘴笑得像个矮妖怪，他早就倚在大门口里面欢迎他们了。褒曼同加布里埃尔下了汽车。这位名人在没有给他们打开大门的时候，就责问褒曼说：“你为什么不要演我写的剧本？”

“噢，你好，先生。我可以先进来吗？”

萧伯纳打开大门说：“你当然能进来。我们还要一道喝茶，你为什么不要演我的剧本呢？”

“我没演你的剧本是因为我不太喜欢。”

老人嘎然而止了。褒曼想，萧伯纳可能要把她从大门那里推出去的。她有一个直觉，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当面对他说不喜欢他写的剧本《圣女贞德》。他们也许会说不喜欢他的另一些剧本，但不是《圣女贞德》。

萧伯纳凝视着她：“你说什么？你不知道它是部好作品吗？”

“肯定它是部佳作，但它不是法国那个圣女贞德。你把她写得过于聪明了。你把她的话按你的意思写了，让她说了许多多余的话，而这些话，真正的圣女贞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说的。”

他们仍在他的房子外面，正继续朝着前门走去。褒曼想，萧伯纳会生她的气的，而他们也永远进不到他的屋里，更不用说喝茶聊天了。

然而萧伯纳大笑起来，把他们带进客厅。在喝茶的时候，老人不停地大声笑着，他说：“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这样一个好莱坞的黄毛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噢，有人告诉我你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你不想演我的圣女贞德。那么，你演过我的别的剧吗？”

“我还没演过你的剧本。”

“亲爱的，你甚至还没开始演我的剧？”

他们边喝茶边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不同类型的戏剧和老人所熟悉的女演员名字，问褒曼以前干过什么？这位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又是何许人氏？他们当然也认真地讨论了贞德。

褒曼说：“我认为贞德是一个单纯朴实的农村姑娘。您的语言艺术是令人敬佩的，但那是您的，一位大师的语言，而不是贞德的。圣女贞德所有的语言我可以背诵出来，因为她当时受审判时所做的回答已被公

布于众了，而且是个历史文献，她没受过教育，是她的天赋给她以勇气和力量。她毫不畏惧那些曾教过她，而后来又把她送去受审的男人。是的，他们受过教育，聪明，能看书和写作，而这一切她都陌生。然而她确实是在众多的男人面前勇敢地站了起来，并接受男人的挑战。你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我喜爱和男人在一起。我憎恨穿女人的裙子，坐在家里干活。’然而她真正的要求确实如此，也就是说要呆在家里，照顾她的羊群，纺纱织布。她并不想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跑在士兵的前面。”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褒曼注意到萧伯纳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却十分困难。褒曼不敢去搀扶他，因为这个老人的自尊心太强。他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别人的帮助。

他试图自己站立起来，这时加布里埃尔走过去搀扶了他一把，他生气了，简直气愤已极。他缓缓朝汽车走去，边对褒曼说：“你还愿意来喝茶吗？”

“是的，我很愿意。下星期我丈夫就来了，我想让你见见我丈夫，我们周末再来拜访你。”

他用一双闪烁的小眼睛幽默地看着褒曼说：“我对于见你的丈夫不感兴趣，我想见到的是你。”

老人的眼神是那样富于表情，那样温柔，他是多想让褒曼这个女人再来看望他。他已经 92 岁了！可是褒曼再也没有能见到他，她引为终生遗憾！

B 另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家庭池塘平静的水面泛起了波澜……鲍勃·卡帕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在土耳其长住时经常写信给褒曼。

影片《斯特龙博列岛》给她送来了罗伯特·罗西里尼……

褒曼和彼得之间的夫妻失和在 1947 年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那一年他们曾一起度过一个短暂的滑雪假日，卡帕也来了。在山坡上彼得很快就发现他比卡帕滑得好。另外，他看到褒曼和卡帕在一块喝酒欢笑，逐渐清楚他俩之间有某种超出友谊的东西。褒曼对他的责备并不否认。

他们全家在太阳谷滑雪，卡帕也在那里。褒曼想露一手，让他们看看她的高超技巧，而实际上她的滑雪水平并不高，所以她没滑多久就摔倒在地了，扭伤了踝骨。她被送回旅馆房间，躺在那里把腿垫高。一天黄昏，卡帕因要下楼去赌博，走进来看望褒曼。卡帕很喜欢赌博，以求刺激。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赢的大把钞票走上楼来，把钱放在褒曼身旁说：“看，我赢了这么多钱，我再去玩一会儿，再赢一点儿。”他上楼来过几次，带来了一点赢的钱，数目不大，纯属寻开心。

这时，彼得走上楼来对褒曼说：“我刚刚在下边赌场里看了一眼，卡帕输了很多钱，他简直要发疯了。”

“赌博就是这样，”褒曼说，“时赢时输。”

彼得走开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卡帕太笨了，他输了那么多，确实应该有人去劝劝他。”

褒曼说：“好吧，我下去看看我能起些什么作用。”

于是，她跛着一只脚下楼，那时已是半夜了，可能，近两点钟。她劝了卡帕，但他毫不理会。他说：“要么是全赢，要么就是输光。”

褒曼只好回到床上躺下。早晨，卡帕看上去疲惫不堪。他储蓄的两千美金全输光了。但是他说：“这有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我现在要加油干了。”

卡帕想同约翰·斯坦贝克一道去俄国的念头又萌生了。现在是褒曼决定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了。她写了一封信给鲁思，鲁思一直为她和卡帕的事忐忑不安，而且关心备至。褒曼在信中说：“我不知道匈牙利人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将永远感谢这种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能肯定的是，这种影响发生了，使我起了变化。我必须面对未来——我想朝好的方面去做，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样做后果不好。然而卡帕知道，我们正在结束人生中的这一篇章。当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愿时，这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你本身是无法选择自己的机会的。我和他正在经历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美好的日子。我正在把后己生活中最喜爱的一页撕毁。我们在学习，也在做一次彻底的手术，以便我们这两个病人以后能快活地生活……”

褒曼和卡帕一直是极要好的朋友。有时他突然闯进褒曼的生活里，然而他们的关系现在已非寻常。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最后引发的令人痛苦不堪的悲剧。

1948年八、九月间，意大利著名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约褒曼拍摄影片《上帝的土地》（又名《斯特龙博列岛》），他们即将在巴黎会晤。

罗伯托·罗西里尼和安娜·马尼亚尼俩人一起离开了罗马。一到阿马尔菲，他就通知了他所喜爱的“康温托”饭店的服务员领班，凡是贴英国邮票的来信或电报不要交给任何人，也不给任何人看，就是说要引人注目地偷偷交给他本人。这家饭店的餐厅狭长，布置整齐，古老典雅，桌子相隔很近，在空隙中又塞满了高靠背椅。那天午饭时，餐厅里坐满了为躲避罗马的酷热而来这里纳凉的游客。服务员领班通过吵吵嚷嚷的食客，鬼鬼祟祟地走过去，错误地认为他的秘密指示不适用于像罗伯托和安娜那样亲密关系的人。他把嘴贴近艺术大师的耳朵，他那耳语的声音如此之大，连地下室的厨房都可以听到。

“先生，……您说如果接到从英国来的电报，要私下交给您。电报到了。”

“啊，谢谢，”罗伯托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喃喃地说，连一眼也没有看就把电报揣进口袋里。安娜眼睛一闪，将这一秘密完全看在眼里，但她依然用油、胡椒、盐、番茄酱拌着堆得像小山那样高的通心面。罗马是一个到处流传闲话的城市，那些窃窃私语的、涉及罗伯托和褒曼的关系的传言，早已经在安娜那双生得秀气而灵敏的耳朵里扎了根。

“喏，”她和颜悦色地说，从大盘里又添了一些沙司酱。“行了吗——嗯，罗伯托？”

罗伯托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其中的奥妙并没有瞒过安娜。

“啊，是，是，谢谢。”

“好，给你，你可以吃了。”

安娜毫不犹豫地两手托起餐盘，把堆得高高的通心面条扣到罗伯托的脸上。

褒曼把那闹剧性的一刻称作她和罗伯托实际关系的开端。褒曼不太

了解安娜·马尼亚尼，只知道《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女主角是她，且演得极为感人。在那个时候，褒曼实际上对他们俩人的情况毫无所知。她不知道罗伯托是否已经结了婚。她只是天真地想到罗伯托是个名导演，而褒曼只是想和他一道拍电影。褒曼第一次去会晤他时，就是怀着这种诚挚的想法的。

彼得和褒曼去了巴黎。褒曼和罗伯托终于在“乔治五世”饭店晤面了。罗伯托还带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一个可能是财务人员。他们都作了自我介绍。彼得对褒曼说了句什么，但她没有听见。她在仔细瞅着罗伯托的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褒曼猜想，罗伯托大约比她大10岁。他很腼腆，看上去不像个电影圈里的人——她觉得是她所罕见的那种类型的人。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同一般好莱坞的语言异样。例如，褒曼问：“这部片子需要拍多长时间？多少个星期？”

罗伯托回答得干脆利落：“多少星期？4个或5个星期。”

“那怎么可能呢？好莱坞的每部片子都要拍3个月。那是签合同拍片的最短期限，必要时，还可以延长合同10天。”

罗伯托似乎对褒曼的话不太高兴，说：“好吧，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试试可以把拍片时间拖长。把它拖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但我可以试试。”

褒曼觉得他的回答太有意思了，于是问他：“我们使用哪国语言呢？”

“语言？任何一种都可以，你认为自己讲的最流利的语言为好，瑞典语不是最方便吗？”

罗伯托这么说使褒曼有些光火：“我怎么能用瑞典语呢？这么说，你没听懂我的话，你写剧本用什么文字？”

“用意大利文。但对话没问题。因为可以配音，所以你想用什么语言都可以。”

褒曼在思考这个问题。接着说：“那么我的服装呢？”

他耸了耸肩：“服装？这无关大局，我们可以选购最便宜的，这个穷的女人能够买得起的那种高档服装……就是那种住收容所里的女人要买的那种。”

后来褒曼才知道他已经和安娜·马尼亚尼一起搞出了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的基本构思。褒曼来找他，他就把这一切交给了褒曼。怪不得安娜要朝他脸上扣通心面条呢。褒曼从一开始就喜欢罗伯托，可能是因为她觉得罗伯托和好莱坞那些说话特快的电影型人物完全相反。他还说不上是个引人注目的英俊男人，但脑子好，聪明面庞富于表情。然而褒曼最喜欢的是他的语言。他说的话叫人听了，会感到如此与众不同。

彼得也参加一起交谈。他不是来谈合同的，合同全权由代理人处理。褒曼的丈夫是来谈生活费用的。

彼得提出的条件很苛刻，褒曼用瑞典语悄悄对他说：“你到隔壁房间来一下，我和你谈谈好吗？”他们一同去了。她对丈夫说：“我求求你，不要把这笔交易弄得过分苛刻，因为我要和他一道工作。我是那么愿意听这个人讲话。他是那么与众不同。不要把这笔交易弄砸了，谁又在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我想做的就是去意大利拍这部电影。可别

让我丢了这部片子。”

彼得急促地说：“不会丢掉的，但我想让你有个优厚的待遇。我意思是说，你在美国是第一号明星，而他们却想以贱价得到你，这未免太傻了。你去意大利拍片子什么都捞不到，这太荒唐了。”

“这些我都知道，彼得，你要知道，这都是些难于成交的条款。”

“那都是必要的。”

“请记住，我非常愿意拍这部影片。”

他们相互告别后，褒曼同彼得回到英国，同布区柯克一道完成了《摩洛哥星下》一片，然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合同一直没有寄来，11月上旬，她收到罗伯托的一封长信：

尊敬的褒曼小姐：

呈上答应交给你的我的剧本故事梗概，我不能把它称作一个完整的剧本，因为它不是故事。我习惯于先写出几个基本概念，然后在拍摄过程中再一点一点地充实，因为戏中许多场景源于现实中的直觉灵感。不知道我的文字是否具有同形象一样的力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这次拍摄中觉得自己的情绪空前高涨。我希望能向你谈谈剧中的男女主角，剧中的海岛，岛上的芸芸众生。人类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原始和古老，只是通过了亿万年的磨炼方变得聪颖，人们正因为染上了那种所谓的“文明”和“虚荣”顽疾，认为生活当中某些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才误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是如此单调和穷困。

我想，你定能发现这个剧本里不少地方还很不成熟，近于粗糙，你的个性会被某些人物所伤害，你不要认为我赞成男主角的行为。我为岛民的野蛮和残忍的嫉妒感到遗憾，我认为它是古老原始的心理状态遗留下来的。我描述它是因为它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像霸王树、松树和山羊一样。然而，我不否认，在我灵魂深处存在着潜在的羡慕，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深情地、那么粗野地去爱，以至对他们所爱的人忘却了关怀，忘却了同情。男人们只是渴望去占有他们所爱的女人的肉体 and 灵魂。文明终于侵蚀了感情的力量。今天，人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观光，会感到轻松愉悦，但人们用自己的双腿冒险登上山顶会感到更加惬意和兴奋。

请原谅我说到别处去了，我现在思绪翩翩，担心凭一封信你不会完全理解我，我急切地想知道，你读了这个剧本以后的感触。请原谅此信的译稿是在匆忙之中赶作出来的，且出自不完全精通这种语言的人的笔端。

我想让你知道，我多么深切地希望把那些概念都融化成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使我脑子里的混乱平息下来。

热切希望听到你的高见。

你的非常诚实和衷心的

R. 罗西里尼

罗伯托曾因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获纽约评论家赞扬，认为该片是1948年的最佳外国影片，被邀请去纽约受奖。由于这部意大利影片还没有签订合同，罗伯托去加利福尼亚州拜访褒曼一家是合乎情理的，而且资金问题也必须继续讨论。褒曼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罗伯托从纽约打来电报：“我已顺利抵达。”褒曼接电报后微笑了，并复电说：“我在野蛮的西部等你。”

到这时候，褒曼仍然不知道何人出资，如何分工，因此她感到最好

是罗伯托来好莱坞时再讨论一下。

山姆·高德温想同褒曼合拍一部片子。褒曼是通过大卫·赛尔兹尼克认识他的。山姆很喜欢她，而且越来越要好。他们谈了许多，而且褒曼有时也常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下同他聊天或同他喝杯酒，他总是说：“我一定要同你拍部片子。现在就干吧，咱们去找个剧本。”接着他把剧作家们请来对他们说：“大卫·赛尔兹尼克找到了这个姑娘，我可以从大卫那里把她买过来，但是我没有剧本。”可是这些剧作家们从来没有为褒曼写成一个剧本，而他也没从别处找到剧本，所以褒曼给山姆·高德温打了个电话说：“山姆，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剧本，你愿意拍这部电影吗？这是一个名叫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意大利人写的。”

山姆说：“那当然，”他看了罗伯托寄来的剧本的前几页。“不错，似乎艺术内涵很深，”他认为褒曼能够意识到，他是喜欢支持一部有声望的影片出笼的。“让我同这个人谈谈吧。”

于是他们开始了颇为热烈的交谈，罗伯托先用法语说，后来他很快改口，讲起了生硬的英语，口音也很重。由于他懂拉丁文，他很聪明，他只是简单地用拉丁文的字去掉字尾，所以就变成了重音不对的英语。但是能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这样他就能与大家交谈了。他还和非常喜欢他的高德温谈了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高德温也准备拍这部电影，这部影片将成为大名鼎鼎的山姆·高德温的片子。他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一起照了相。高德温微笑着在合同上签了字，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他们像在学校似的坐在台上，记者们注视着他们，褒曼在台上像女教师那样感到有点别扭。他们坐在一起了，高德温坐在中间，罗伯托和褒曼坐在两旁，记者们提了一些问题：

“高德温先生，这部片子的内容是什么？拍这部片子需要多少钱？准备在哪里拍摄？”高德温一一作了回答，但回答得太离谱。

褒曼终于忍不住了，她说：“山姆，你说得都不对。不是这部影片，我们要去拍片子的地方也说得不对。我们要到一个叫做斯特龙博列的岛上去拍片子。请让罗伯托谈谈吧。他知道要做些什么，让他说说吧。”

这样一来，一切都乱了方寸。

当他们走下记者招待会的讲台时，山姆说：“我看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但我还想再看看罗伯托的其他影片。他有吗？”

当然有。罗伯托提出《公元初的德国》。它是《游击队》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三部曲中的第三部。

有一次褒曼对罗伯托说：“我不明白，另外两部是那样温暖，那样人道，看了以后使我哭了，但是《公元初的德国》却没能使我掉泪。”他回答说：“我不能使你落泪，是由于意大利人的遭遇而使我痛恨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我去了那里，拍下了我所看到的一切。我痛恨我看到的那些东西。”

因此，他的这部片子非常冷酷、残忍，但却极有内涵和趣味性，同时它和另外两部影片也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公元初的德国》首映时，山姆·高德温举行了一个晚餐会，他邀请了许多好莱坞的名流。晚饭后大家看了电影。电影放完，灯光亮了。一片沉默，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说话。20个人都悄悄地呆坐着。大家在冰冷的沉寂中僵持。褒曼本能地站起来朝罗伯托走去，伸出一只臂

膀搂住他，亲吻了他的脸，让大家看看，看什么？褒曼也不知道想让他们看什么，但是觉得必须保护他。于是大家开始了讨论。

“嗯，这部片子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你什么时候拍摄的？”“用了多长时间？”罗伯托心里不高兴，因为大家不理解他的这部片子。

过了几天，山姆·高德温来找褒曼说：“很抱歉，我不能拍这部片子。我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表达什么，他既不懂预算，也不懂日程表。我不想为它这样的影片出钱。”

褒曼只好回家，告诉罗伯托他们没有达成协议。

C 她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决心在逐渐减弱。她长期以来心里一直想，如果遇到意中人，而这个人又说了中意的话，那她就准备并愿意同他一起走……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罗伯托·罗西里尼做到了这件事。他不含糊，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没有说：“我们必须想到彼得和安娜·马尼亚尼。”他只是简单地说：“同我走吗？”

为了在荒凉的斯特龙博列岛上拍片子，他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去进行一次大胆的冒险。

但是在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山姆·高德温拒绝合作，谁能为这部片子出钱呢？

褒曼问彼得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雷电华公司的霍华德·休斯呢？他会有兴趣的。”

“不，我不想这样做。”她的全身不由得颤抖起来，“你要知道，我怕那男人。”

可是彼得扳起面孔，粗鲁地说：“我相信你能对付得了他。”

褒曼在纽约曾通过卡莱·葛伦和艾琳·赛尔兹尼克会见过霍华德·休斯。卡莱和艾琳提议同他一起组成两对。他们一道出去玩，最后是在摩洛哥舞厅跳舞分手的。霍华德·休斯为人很好，他们边舞边谈。他说：“我非常寂寞，非常非常寂寞。你知道我没有朋友。”

褒曼想，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愚蠢了。他是一个财大气粗又有名望的人。褒曼从报纸上了解过，他是个胆大的飞行员，经常和名声很大的明星来往——而他还说寂寞？褒曼不由大笑起来，对他说：“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了，因为你不出去找朋友。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就在你身旁，且很高兴，你今天晚上过得不孤单吧！”

霍华德显然决定把褒曼做他的朋友，他接连不断地打来电话，卡莱·葛伦也常对褒曼说：“他想再见到你，简直想疯了。”最后褒曼对卡莱说：“我没兴趣再见到他。你为什么要管他的事？他自己不会打电话给我吗？”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乔·斯蒂尔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有人告诉褒曼，休斯想用飞机把她和卡莱、乔·斯蒂尔一直送回加利福尼亚州去。他把那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班机的每一张机票都买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天要去的话，必须同霍华德·休斯坐同一飞机走。

在飞机上，褒曼和卡莱、乔·斯蒂尔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头大睡。天快亮时，休斯把褒曼叫醒了，叫她观赏大峡谷的边缘地带。真是壮观极了，她说：“很感谢你，确实了不起。”褒曼以为，他们的关系也就可

以到此止步了。然而，霍华德要为褒曼举行一个招待会，她说她不想参加。于是乔·斯蒂尔设法影响她，也未成功。褒曼总是觉得和霍华德在一起特别别扭。大家都想使她对休斯产生兴趣，她却觉得索然无味，也不想产生这样的兴趣。

1949年初，休斯给褒曼打了个电话。他本想通过这个电话。把褒曼吸引住，结果却适得其反。

一天，褒曼刚洗完了头发，坐在地板上用吹风机吹头发。她一只手拿起了电话耳机，另一只手拿着吹风机。电话里的声音说：“我是霍华德·休斯，我为你买好了一个制片厂。”

褒曼把吹风机关掉了，问道：“你买了什么？”

“我刚为你买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我买下了雷电华公司，它是为你所有了。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现在高兴吗？”

褒曼说：“你为我买了个制片厂，那好呀，很感谢。”

褒曼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耍弄她，可是由于他是霍华德·休斯，他可能不是说着玩的。如果他真买下了制片厂，再找到一个剧本，如果还能请到褒曼所喜欢的导演和男主角，那是很好的事，于是褒曼笑着说：“还不够。”

“不够？”

“我不知道拿这个电影厂去干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好剧本和一个好导演……”

“好吧，好吧，请把你想要的剧作家和导演的名字告诉我，我把他们请来。”

褒曼想，如果她的态度很认真，确实想要雷电华公司的话，她就要请他那天晚上来喝五提尼酒了。但是她不以为然。至少她对霍华德·休斯一点也不认真。自从罗伯托·罗西里尼进入她的生活后，她实际上早已把这段插曲抛到九霄云外了，而现在彼得又提出请他来资助他们拍片。

“好吧，”褒曼说。“我去找他。”

那些日子，霍华德·休斯住在贝弗利山饭店的一所平房里，从褒曼的住宅到他那里步行只用15分钟。

他身穿白色网球衣，脚着白网球鞋，他坐下来看着褒曼，操着低沉的声音，用得克萨斯人简略的讲话方式说：“一定，好吧，我来资助这部片子。”

罗伯托也在那里，褒曼介绍了他。但是霍华德·休斯似乎觉得旁边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在他的心目中，罗伯托仿佛不存在。

“你需要多少钱？”

“等等，”褒曼说，“你不想听听这个剧本的故事吗？”

“不，我不想听，我不感兴趣，我不管它什么样的故事。你在片子里动人吗？你准备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吗？”

褒曼大笑起来：“不，我将扮演一个流离失所的、住在一个破旧的收容所里的女流浪者，我只穿最简陋、最便宜的衣服。”

“太可惜了，不过，你下一次定要演让人看着很漂亮的片子，那将是雷电华公司的一部惊人的影片，你可以找你喜欢的导演来拍，”说这

话时，他瞥了罗伯托一眼。“你自己去寻找乐趣，然后回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拍一部石破天惊的影片。”

当然，褒曼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边。她觉得休斯不喜欢《火山边缘之恋》这部影片，他是根据他的想象来看待这部影片的，因为当时那个“轰动全世界的丑闻”他早已耳闻。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信给褒曼，而褒曼却把他的信丢在一边，一直过了 25 年之后才发觉没有给他复信。那时，她正决心永远离开法国的舒瓦塞尔村的家，她翻阅了许多旧信，而那里面，她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封霍华德·休斯的来信，是从意大利转来给她的，这是在“丑闻”满天飞的时候寄来的。这是一封充满温情的信，出自一个使她为之失望的、她尽可能设法摆脱的男人之笔，褒曼感到非常伤心，因为没有对这封信给予应有的注意，有失礼貌了。

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罗曼大街 7000 号寄出的，日期是 1950 年 2 月 10 日，正是罗勃蒂诺出生后的第八天。

休斯在信中说，给褒曼写信时，起初感到很犹豫，因为“我未能荣幸地了解你，或以你为挚友。”

他信中没有评论褒曼的决定，却对她说，他是如何被褒曼的“勇气，极度的坦率和忠诚”所感动。生活中褒曼碰到这类问题确实不少，众多的追求者令她烦恼不安，但她觉得没有理由去责怪任何人。

“现实是由自己的意愿决定的，”信中写道，“它出自内心，而不是出自法律或法定文件。”

他希望并且相信，到罗勃蒂诺长大成人并能够理解的时候，世界的观念可能变得“略为真实和宽容些”。他说褒曼的儿子不会带有任何污点。他会继承母亲的传统，“这位母亲虽不是聪明绝顶，机智过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优秀、最有力量女性。”

25 年过去，褒曼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她听说休斯住在伦敦的“公园旅馆”。于是给他写了信，信中说，虽然过这么多年，仍然为他的信感动得流泪，她要永远保存这封信，并告诉他，她以前没想到休斯竟是这样的善良。褒曼一直没有收到休斯的回信，也没有期望能收到回信了，她只希望休斯能有机会得知这个消息。希望有人也许会告诉休斯，她写信了。褒曼认为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看望他，只能感叹覆水难收！

1949 年 2 月 28 日，彼得和褒曼到阿斯彭山度滑雪假，罗伯托·罗西里尼则动身回罗马了。但是经过催化作用的婚姻裂变程序已经开始。

褒曼和彼得在阿斯彭的时候，褒曼一直向他请求，让她早一些去罗马。他说：“可是你还要过许多个星期才开始拍片子呀。”褒曼说：“我知道，不过我想去罗马。我想去那里学习语言。我愿意和那些人呆在一起……我希望最好能让我早点动身。”

褒曼一再请求彼得，因为她盼望聆听罗伯托的高见，听听他有什么要谈的，是怎样想的。

罗伯托从拉瓜迪亚机场拍来电报，只寥寥几字，“我现在走了，再见。罗伯托。”褒曼认为只要有点消息，心里就感到很幸福了。

1949 年 3 月 7 日，彼得和褒曼夫妇离开了阿斯彭，3 月 9 日回到贝弗利山。在两天后的星期五晚上，褒曼坐火车去纽约，只带了 300 美元

的旅行支票，行李也不多。当时如果有谁预言，她这一走要度过 7 个混乱无序的年头才能回到美国，连她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褒曼在 1949 年 3 月 20 日的日记里，只写了两个字：“罗马”，她在这两个字的下面划了两道线。

第八章 洋溢着生命力的爱

A 他们的到来使罗马古城沸腾了。

罗伯托不顾一切地贪恋着她。她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罗伯托永驻在她的脑海之中……”

褒曼终于抵达罗马古城。人们沸腾了，每一张笑脸，每一束鲜花都代表了人们的心。褒曼有一个直感：罗马人欢迎她、喜欢她。她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受到过如此盛大的欢迎。这简直像狂欢节，人们放声地笑啊、喊啊、招手啊，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机场上人山人海，好像来的不是褒曼，而是皇后。罗伯托把一把花束塞进褒曼的怀里。他们终于挤开了一条路去上汽车。罗伯托把褒曼推进他那红色的“西斯塔利亚”赛车，朝罗马市中心驶去。车子直接开到了艾克塞西尔饭店。那里也人如潮涌。他们简直无法挤到饭店大门口去。

罗伯托立刻又开始“驱赶”摄影记者，那是他通常对付摄影记者的一种妙法。他挥舞着拳头，以便打开一条通往大门的路。他把一个摄影记者的一只衣袖扯了下来。第二天觉得过意不去，又买了一件新上衣送给那位摄影记者，以示歉意。最后他们终于进入了罗伯托的套间，那里正等着为欢迎他们举行招待会，罗伯托的朋友们都在那里。费德里科·费里尼在墙上挂了不少笔墨高超的漫画：有罗伯托和褒曼以及斯特龙博岛的素描。会场上备有香槟酒，每个人都在谈着、笑着。罗伯托把一些小礼物摆在大厅的贵宾桌上。这一切使褒曼不知所措了。

曾经翻译褒曼写给罗伯托的第一封信的莉安娜·费里，是欢迎人群中确切地理解今天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要想理解罗马人的行为举动，你首先必须了解他们曾经遭受过什么经历，”莉安娜说，“我们经受了一场我们不希望打的战争。我们是被那个白痴墨索里尼拖进战争泥坑的。我们遭受了德国人的占领，日夜听着德国人的皮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的声音，我们感到害怕，非常害怕。通向南方和北方的道路，以及罗马通向外地的条条道路在9个月中连续遭到轰炸，每天落下大量炸弹，同外面完全失去了联系。德国人切断了我们的北方和南方城市的食物供应线，我们无法得到食物而处于饥饿之中。人民在忍饥挨饿。在我们一生中第一次完全理解了主祷文第二行的意义：‘给我们每天的面包吧。’而谁也不会给我们，我不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会不知道罗马曾经挨了9个月饿的痛楚史实，我的体重减了9公斤。我想，同盟军可能会认为这样对我的身材有好处。”

莉安娜·费里微笑着：“当然我们盼望同盟军同德国人一样。在有些事情上他们是不相同的。首先，美国人穿胶底皮靴，所以我们晚上可以安稳入睡。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很快就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被解放了的欧洲人通常对美国佬的抱怨……吃的过多，工资过多，性关系搞得过多，而且把这种毛病带到罗马来了。他们占据了整条大街上的饭店，对我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们他们喜欢什么。在西班牙阶梯附近出现了整片的红灯区。许多看上去谦卑、悔悟和改过自新的法西斯匪徒都被委以重任，有权有势。罗马的女人同美国兵保持亲密关系：每个女人似乎都有一个

美国大兵做自己的情人。

“针对这一历史和现实背景，年轻的罗伯托·罗西里尼编导了他的巨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游击队》，接着他爱上了英格丽。这位著名女影星来意大利是为了拍片子，可是她同我们的罗伯托·罗西里尼相爱了！‘好样的，罗伯托，好样的！’她离开了她那冷冰冰的北欧人丈夫。现在她将发现真正的生活和爱情。‘好样的，罗伯托，好样的，英格丽！’

“这是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饥饿和羞辱的补偿。噢，是的，我们喊过，‘好啊，罗伯托’但是我自己没有喊过‘好哇，罗伯托，’因为我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归根结底，我曾翻译过所有他写给英格丽的信，同时英格丽抵达机场时和参加招待会时我也在场。我被她的单纯和诚恳所打动，她在恋爱中，但没有任何恶意。

“我对罗伯托说：‘我了解你，我了解你同你的妻子，同那个希腊—俄国混血姑娘，那个德国舞蹈家以及同安娜·马尼亚尼之间的事情。我知道你那些罗曼史。听我说，我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对英格丽不好，如果你由于她的单纯和羞怯而进行欺骗，我就不是你的朋友，我不会再同你讲话。你那么精明，那么狡猾，去欺骗一个心灵纯洁的、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女人，我是不会容忍的，我的立场你应该很清楚了！’

“罗伯托回答说：‘你总是批评别人，你总是那么谨慎，那么爱管闲事。我爱她，你明白吗？我爱她。’

“一出问题总有他的份：钱财问题，合同问题，女人问题。他总是在混乱中生活，没有混乱他就不能生活。如果生活在平静中，他就要死了。他需要暴风雨。如果没有飓风，如果他没有在修筑防御工事，如果他没有在进行战斗，他就会感到厌烦——简直就没法生活。生活是一场战斗，拍片也是一场战斗。除非他去战斗，不然他就不起床。如果没有战斗，他就躺在床上抱怨‘我头疼，肠胃不好，我要吐了。’”

莉安娜继续说：“我曾为一家意大利杂志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把他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有着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所有缺点和特征。他是个复兴运动的信徒，一个顺应时机的人，还是个爱好艺术的人。他可以在头一天爱上一个女人，热情之高，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而第二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他会爱你，吻你，为了你牺牲一切，但到了第二天，他可以从背后扎他最好的朋友一刀子，而他那样做只是为了刺激。

“他的性格无法让人理解，因为这一分钟，他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做好事，而两分钟以后却早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

“英格丽对罗伯托一点也不了解，”莉安娜说，“她抵达罗马时就像一只无辜的羔羊。必须有个人支持她。我就打算支持她。”

褒曼觉得，和彼得·林斯特罗姆一样，罗伯托·罗西里尼也是个不寻常的、独具卓见的人。如果下达某种命令，彼得会毫不犹豫，坚定，果断，自信地往前走。如果同样命令下达给罗伯托，那就至少需要有12个不同的人服从了命令之后，他才会动。对他的银行家，律师，支持者，他是一张面孔；对他的孩子们，他是个爱情、温暖和慈爱的堡垒；对他的影业同事们，他时而尖声辱骂，时而极度称赞他们，或者不加理睬；

对安娜·马尼亚尼，他是引导她扮演影片中重要角色的人，她和他进行了一场两种不同意志之间激烈的争斗。而对褒曼呢，她自己是这样说的：“罗伯托一开头是能够对我的事业提供新的动力和得力指导的著名导演，还可能——只是可能，成为对我内心隐隐约约使人能够感受到的新的呼唤作出反应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在那时有一位明智和公平的法官被要求去裁决罗伯托·罗西里尼是否爱上了我，我是否也爱上了罗伯托·罗西里尼，那么他的裁决只能是肯定的，也只能是一声激动人心的回响：‘是的’。”

用罗伯托的话来说：“英格丽是原动力，她美丽，但属于别人。她充满活力而又有风趣，有时候她的生活并存着一种严肃和紧张的目的。”他对于这一点是不能理解的。褒曼说，她和罗伯托不一样，她从来不在同时把10个球扔到天空，而自己又没有把握让它们停留在空中，即使这10个球都掉下来也不在意。褒曼在某一阶段内只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如果再兼做另外一件事，她是不会感到愉快的。褒曼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她有时会突然纵声大笑，她的笑是那样发自内心，那样自然。和所有的意大利男人一样，罗伯托认为自己对女人的事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褒曼的种种表现却常使他感到惊讶。褒曼说：“按照罗伯托的性格，他在爱情上是毫无保留的。他的爱情不是用小汤匙从爱情大海里一勺一勺量出来的，而是倾泻的。他的表现是否呆傻，他并不介意，也不感到奇怪。他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特有的猜忌怀疑或谨慎从事。爱情夺走了他的心灵，分散了他的才智，把他驱赶到他所爱的人身旁。罗伯托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恋人；他已准备好愿意将所有财产孤注一掷；不管是赢还是输，他为了爱情是准备献身也在所不惜的。他不顾一切地贪恋着我，他需要我。他不想让我逃出他的手掌，离开他的视野。”

自从看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电影后，褒曼在内心深处爱上了罗伯托，因为她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罗伯托永驻在她的脑海之中。

罗伯托或许下意识地提供了解决褒曼现存的两个问题的办法：她的婚姻问题和她在好莱坞的生活，这一切在当时她自己也并不清楚。如果她提到意大利时，有人表示猜疑和敏感，她会十分愤慨地说：“我是去拍片子，我去那里只是这个目的，也是惟一的目的。”

B 罗马完全被她征服了。卡普里岛使人置身于梦境……

褒曼到达后的第二天，罗马的市民聚集在“艾克塞西尔饭店”的广场上，以表示他们的欢迎和喜悦。维亚维尼托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谁也无法进出饭店的大厅，褒曼只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

罗伯托和饭店的管理部门很有安排：“请褒曼小姐从这里走，下楼后，从后门出去，再进一条狭窄的小街……”转了几个弯以后，褒曼和罗伯托已在街头漫步，享受着和煦的阳光了。不久，他们还是很快就被一群摄影记者盯上了。没有多久，人群迅速地把他们团团围住。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礼貌有节制的，每个影迷都具有善良的性格，都为能看到褒曼感到激动不已。

罗马的美丽风光把褒曼完全征服了：两旁围着淡褐色高墙的弯弯曲曲的街道，豁然开朗的广场，向四面八方喷溅着水花的喷泉，赋予人们的一种古朴雅典的感觉。褒曼这个生长在北欧的瑞典人从未有过任何思想准备，来欣赏这块美丽、温柔的富贵之地。她走到哪里，就被那里的色彩、音乐和伟大的爱所吸引和陶醉。

罗伯托要褒曼见见他所有的朋友。他想带褒曼去那不勒斯、卡普里和阿马尔菲以及另外十多个她从未听说过的景点。每一件事对她都是新奇：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们富庶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美丽。褒曼觉得似乎天底下所有应该知道的事，罗伯托一概全知。

那个周末，他们终于离开了罗马城，驱车往南，乘坐那红色的“西斯塔利亚牌”汽车，沿着古罗马时代的驿道，驶过古老的方石路，驶过路旁的教堂和寺院，一路还经过罗马异教徒的古老圣洞。汽车飞驰着，风儿在吹动着褒曼的秀发，阳光温柔地抚着她的脸颊，她感到心醉神迷。

他们继续往南行驶，经过了山峰耸立的高高的卡西诺山，又经过被炮火所毁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墓地里埋葬着 10 多个国家的年轻人。他们驱车来到了通向充满生机的那不勒斯的绿色原野。他们还从坐着缓缓行驶的高轮牛车的农民们旁边驶过。他俩在码头边停住了。前面就是一望无垠的蓝色海湾，从这里他们将乘坐弥漫着蒜味儿和烟草味儿的渡船去卡普里岛。渡船在浪花中摇摇晃晃，勇敢的海鸟尖叫着，海浪拍打着船身，沙哑的扩音器里播放着意大利男高音演唱的情歌。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浑的四重奏。

在卡普里岛上，褒曼站在罗伯托身旁，俯视着翻腾着的湛蓝色海浪。这里是罗马国王提帕里尼斯常来的避暑胜地，国王十分迷恋这个美丽的小岛。此时此刻，褒曼真觉得他们如同置身梦境。

褒曼珍藏了一张绝妙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她表露出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愉悦。他们来到了一个小舞场，人们都在那里跳舞。她想，那可能是她惟一的一次同罗伯托跳舞，因为他不会跳舞。但是那天晚上他高兴地跳了。褒曼想，为了赢得她的一颗心，罗伯托做什么事都心甘情愿。

她的新郎向她讲述意大利的历史，他通晓意大利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褒曼想，如果他有某个细节不清楚，他也会随口杜撰出来。他对历史、纪念碑、废墟无所不知。他还熟悉所有的帝王野史。褒曼知道的人和事，他几乎都知道。

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游玩，摄影记者们总是尾随其后。罗伯托是那样平静、缄默和高兴，甚至不想用拳头威胁他们。于是就有了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那张彩色照片。那是在阿马尔菲海岸，他们正在攀登通向圆塔的阶梯。照片里他们手挽着手。这张照片遍及世界各地。

如果有人要挑选一段崎岖的海岸线，那里风光独特，景物自然，且具有历史传说，使人看了赏心悦目，那么，阿马尔菲海岸线是最理想的选择。

1949 年，阿马尔菲海岸线周围弯曲道路上车辆稀少，少有车辆驶到坐落在隐蔽的海湾里的这座小镇。过了阿马尔菲往南走，道路极为陡峭险要，在山顶上，离城镇不到百公尺的地方有一座叫伦纳的女修道院。

以前称月亮修道院。这就是褒曼和罗伯托下榻的地方，如今这里是一家豪华饭店。12世纪至16世纪，这个地方曾是托钵僧的修道院。直至今日，仍然保留着昔日修道院的古朴典雅。从实用出发，四周古老的回廊现在已是酒吧了。这里一直是罗伯托最喜欢的饭店之一。安娜小姐就是坐在这家饭店的餐厅里往他脸上扣面条的。今天同褒曼在一起，这种烦恼已远远抛在脑后了。

从褒曼住的套间的宽大窗口举目眺望，可以看到四面的环形山和宽阔无垠的平静海湾，陡峭的岩石耸立在深水之中。峻岭悬崖之下，可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映着苍穹满月。

此情此景不由使罗伯托忆起这儿的古老传说：从特洛伊战争回来的尤里西斯是多么英勇不屈。他的战船由于逆风被迫停靠在这儿的岸边，他偶然来到了美丽的魔法师西拉居住的海岛。

褒曼微笑地听着罗伯托兴致极浓的奇谈，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情节与这儿的环境极其相似，她似乎同西拉具有同样气质，也同样出名，岁月虽然过了万年之久，但今天的幸福和爱情与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有时候，褒曼简直无法相信，也没有真正理解过，罗伯托在做些什么。当他俩经过萨莱诺海岸城镇时，她第一次领教了罗伯托为他的影片配备演员的办法。他把车子停在海滩附近，那儿有些渔民在船旁干活。（自从褒曼抵达罗马后，他俩基本上用法语夹杂着英语交谈）。现在他平静地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找个男主角。”说完就向渡船走去。褒曼以为他在开玩笑，兴高采烈地笑了起来。20分钟以后，他回到汽车上。“我给你找了两个，”他很随便地说，“一个长得很帅，是位高个子年轻人，另一个是个小个儿。我们到斯特龙博列岛后，你可以挑选。”

褒曼仍然把这些话当做玩笑。直到到了岛上，他才知道罗伯托确实不是开玩笑。他把这两个年轻人列入发放工资的名单，把饭店的名称也告诉了他们。他们将在饭店里同当晚路过萨莱诺的摄影组会合。

当年，沿海的公路比今天狭窄多了，公路在高耸的山峰与广阔的山谷之间穿行。风景秀丽的村庄和小镇既偏僻又落后。他们离开海岸线后，朝坎塔扎罗小城镇驶去。罗伯托决定当晚在这儿过夜。显然，那位艺术大师的助手们已经把他们即将抵达的消息通知了市长。狭窄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的汽车缓缓从密集的人群中钻过，驶到镇上一家小饭店的前门。

学校都停了课，孩子们放一天假。人们列队街头向他们招手、欢呼。他们在饭店门口停下来，到处都是鲜花；门厅也挤满了人。上楼时，楼梯两旁都围了三层欢迎的人。在褒曼的卧室里，一张大床上面堂皇地铺着镶着花边的漂亮丝绸被单。市长在那里解释说，这就是几年前他和他的妻子新婚之夜用的被单，并问褒曼能不能在被单上签上名。明天早上留给他。

那时候，在意大利的小饭店里，没有带浴室的房间。市长发表简短讲话离开房门后，褒曼关上了房间，然后决定去浴室。天色已晚，她以为欢迎人群早已离开了饭店。可是当她往门外探头时，见人们仍列队站

在那里，一看到她的面孔，立即开始鼓掌。她微笑着回到房里，10分钟后她又看了一眼，他们仍然在那里。又是有礼貌的鼓掌，她微笑着关上了门。又过了10分钟，她只好打开房门，走出来进入过道。他们太好了，去浴室来回的路上，褒曼一直听着他们的掌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持久的欢迎场面。

C“一枚重磅炸弹落在彼得的头上”——她在丈夫面前作了痛苦的自白。她的婚变已不可避免……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的赴意大利重要旅行。虽然有不少先例使褒曼相信，意大利对情侣是放纵的，但她那颗经神圣的瑞典马丁路德教的教规锤炼的心，在他们到达阿马尔菲时，已经踌躇不安了。

褒曼在罗马停留期间，丈夫彼得一直连续不断的来信。3月初他写信提醒说，要想偷偷地不被人发现溜到罗马城是没有希望的，还说他高兴地得知她没有被人群挤死。3月31日他写信感谢褒曼来信介绍了在罗马的情况，并补充说，他汇寄给罗伯托的钱已经收到。他还说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拍片的消息。

在阿马尔菲，褒曼知道，对彼得必须彻底交代的时候来到了，即使她写给彼得的信是最为痛苦和最难下笔的。写了好几次底稿都废弃了，最后她终于在印有伦纳女修道院照片的信纸上开始写道：

亲爱的彼得：

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是困难的；而对我来说，写这封信也是困难的。但我认为这是惟一的办法，我要从头开始向你解释一切，虽然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我要求你宽恕我，但这似乎是很可笑的事。这不全是我的错，可我同罗伯托一起生活下去，你又怎能原谅呢？

我并不想坠入情网和永远呆在意大利。我们曾经一起拟定今后的计划并憧憬我们的未来，你知道我说的那些都是真话，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又怎能扭转它呢？你在好莱坞时看到我对罗伯托的热情是怎样与日俱增的，我们对同样的工作怀着同样的愿望，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多么相似。我原先认为，当我看到他按自己的社会意识办事，这个意识又与我的意识截然不同时，我想也许我可以克制自己对他的感情。但是情况却完全相反。我现在没有勇气来更多地谈论他，我以前也没有过多地对你谈论过他，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对我是如此情深。

我的彼得，我知道这封信会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落在我们家的房顶上，落在我俩的皮娅身上，落在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过去上，我们的过去充满了你的牺牲和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亲爱的，我从未想过，在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之后，会有这样一个痛苦时刻到来，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可怜的小爸爸，还有可怜的小妈妈。

按照意大利法律，如果彼得·林斯特罗姆飞到意大利并开枪射击，打穿褒曼或罗伯托的心脏，在一般情况下，他会被认为犯了谋杀罪，但是人们会认为那是出于深切的、可以理解的人类感情而犯下的罪行，因此可以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彼得不会那样做。彼得神志正常、头脑冷静、为人正派。他要把问题考虑周详、成熟以后才会行动的。报纸上早已四处传播罗伯托和褒曼恋爱的流言。但是，当彼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媚的阳光下漫步

时，他简直无法相信褒曼所写的那些话。不是他不想相信，而是他根本不相信。10年的美满婚姻是有过波折的，但是谁的婚姻当中没有过起伏波折呢？一所漂亮的住宅，一个美丽的小女儿，一个专门为皮娅的妹妹或弟弟修建的育儿室……他只会想，褒曼一定出了什么不正常的病症，他了解自己的妻子。他必须见到她。如果她说的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她应该回来亲自告诉自己的女儿，一切都终结了。只有这样他才能接受。他给褒曼发了一封电报，并坐上飞纽约的航班。

第九章 第二次爱情意味着什么

A 被第二次甜蜜陶醉了的恋人，重温古希腊爱情故事……

褒曼想让彼得知道，他一定要离开彼得，她对彼得并不忠……所以她写了那封信给彼得，把一切真情告诉了他。没过多久，她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找到了我想去的地方，这儿的人是我的人，我要留在这里，真对不起了……”信写完之后，她感到真的自由了。这就是她的离婚要求。她是诚实的。如果教堂坚持她仍存在婚约，那也不可能将她真正束缚住，因为她在3年前就提出了离婚要求，只不过是彼得坚决不肯接受而已。当时她没有找到意中人，因此她没有理由离开自己的家。

多年以来，她一直等待并寻找一个使她能下定决心离婚的人。罗伯托做到了这一点。她不认为她的个人问题会搅乱整个世界的安宁……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自作聪明、自欺欺人的想法。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世界上的新闻媒体有能力把恋爱之幻梦打得粉碎，并把生活变成噩梦。褒曼并不认为她和罗伯托对这个世界那么重要，以致要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世上毕竟还有其他合不来的夫妻也都纷纷离异。世上的姻缘离和符合客观规律。

因此，在那最初的10天里，他们这对情侣驾驶着红色的汽车驰骋在迷人的大地上。她被幸福陶醉了，不愉快的事情全部都被丢诸脑后。

他们驶到了卡拉布里亚的最后几英里（位于意大利的大皮靴的鞋跟处）。车子从山上开下来，沿着山下狭长的黑色海岸线奔驰，穿过岩石海角，下面的海水如水晶般清澈明亮，浅滩处是一片淡绿色。镶嵌在海边的村庄好像是西班牙大帆船船壳上的甲壳动物藤壶，而山上的村庄则像燕子窝一样紧紧嵌在高高的山上。它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结合，在古色古香的景色衬托下，简直美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罗伯托还不断讲着古希腊神话故事和爱情故事。

接着，在广阔的墨西拿海峡前面，耸立着西西里岛。拂过渡船的轻风，暖意洋洋。后面是意大利的蓝灰色轮廓，在烟雾弥漫中变得模糊不清，几乎完全消失了。墨西拿是一个低洼的滨水区，到处是浅黄色和白色的建筑群，蜿蜒地环绕着弦月状的海湾，后面是青青的起伏群山。

4月4日，星期一，他们把摄影器材都装到40英尺长的、结构坚实的渔船上。离开了西西里岛，船头上堆放着一箱箱的西红柿、成卷的电线、摄影器材、面粉、卫生纸以及摄影技师们的不成型的手提箱。“圣洛伦索号”渔船带着它那陈旧的发动机和鱼腥味，发着沉重的响声进入蒂勒尼安海，朝利帕里群岛驶去。最北边的那个岛就是斯特龙博列岛——这是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用了两个多小时跨越了开阔的海面，前面就是耸立在地平线上的斯特龙博列岛的高大火山圆锥体，周围笼罩着白色的烟雾。当“圣洛伦索号”靠近时，向上望去，可以看到2000多英尺高处活火山的黑色喉管。半圆形的深红色熔岩向外翻腾，就像是一个血红的大嘴从冒着烟雾的圆锥体中伸张开来。刚刚喷出来的一股巨大的黑泥岩浆滚滚流动，从

高处径直泻入明亮的大海。壮观的景色使人们受到很大震动。

他们找到了位于一个熔岩岬附近的斯特龙博列村庄。火山的喉管是向另一个方向倾斜的，对岛的另一边没有影响。在一个黑色的荒凉海滩上，更加古老的熔岩渣形成了一个不大的斜坡。经过了许多世纪后，上面已覆盖了小树丛，斯巴达草和毛竹丛。在这块肥沃的火山土壤上开辟了花园。蔬菜、鲜花、无花果林、葡萄、叶子花和天竺葵都呈现勃勃生机。但在 14 英尺高的地方，绿色植物消失了。在这些较低的山坡上，村民们修建了他们的广场和摩尔式的带有短烟囱的白色房屋，窗户上装有护栏。房屋沿着狭窄的小巷密密地挤在一起，有时小巷仅有三四尺宽，弯弯曲曲伸向广场，通向建有高尖顶的白色教堂。但是斯特龙博列火山的锥形体主宰着生活的各方面，在一定的时间，它挡住了太阳。夜晚一片黑暗，它遮住了明亮的星星。从它那地下的肚皮里，日日夜夜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和低沉的爆炸声。确实，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火山向他们显示了无穷威力，而使得制片组的男人们兴高采烈地乘坐“圣洛伦索号”渔船出海拍片，直到天明。

他们抵达时，在墨色的海滩 100 码远处波涛汹涌的深水中下了锚。演员和技师们改乘小艇靠岸，各种物资和器材也都随即转放到小艇里，然后再向岸边划去。褒曼蹒跚地走上海滩，迷惑地环顾着这个岛屿，它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乐园，但却是拍摄外景的绝妙地方。

他们一到斯特龙博列岛就开始工作了。人们看到罗伯托和褒曼在一起的时间要比拍片的时间多得多。于是报社记者来到这里，并开始询问，到处向人们打听：褒曼的卧室里有几把牙刷？罗伯托睡在哪里？他妹妹睡在哪里？褒曼是不是一个人单独在自己的卧室？先是意大利的报纸记者，接着还有英国和美国的记者。

褒曼原来以为“这件事不会搅乱整个世界”，然而事实却超出了她的设想。意大利新闻界找桃色新闻线索就如同鲨鱼嗅到血腥味一样来得神速，他们竟派记者装扮成渔民、旅行者，甚至有一次还装扮成教士来到这个岛上。一时间，对罗伯托和褒曼关系的各种猜测和流言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新闻热点。

彼得接到褒曼的来信后，给她回了一封信。这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普通的问候信。彼得感谢她离开罗马以前发来的电报，问她拍片进展如何。信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女儿皮娅滑雪的成绩。

4 月 9 日和 12 日，彼得的电报发到斯特龙博列岛，要褒曼立即给他打电话，他不知道岛上没有电话。接着，在褒曼还没有打来电话以前，彼得对褒曼在阿马尔菲岛发出的信件的回信就来了。彼得称她为“凯特”，这是彼得给她起的爱称。他说，自从接到褒曼的信以来，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但他希望这个创伤能够得到医治，期望他们和好仍能幸福。

有一件事他希望讲清楚：“一个不想同我相处下去的妻子，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然而，他并不想坐视不理，任凭她去做丑恶可耻的事情。她必须认清，她能够离婚的惟一办法是回到美国同他好言进行商量。为什么要让这种不体面的事广为流传呢？

他深信在褒曼提出离婚一事时，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罗

伯托是生活在天主教国家里的已婚男人，而褒曼只不过是取代安娜做他的情妇。罗伯托如果想再结婚，在意大利是不会得到批准的。

褒曼说过她要在意大利呆下去。这对好莱坞和接受她为公民的美国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

只有褒曼、彼得和罗伯托 3 个人知道褒曼写给彼得的信。可是这信的内容又怎么会被一家纽约报纸知道了呢？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消息，一个极大的丑闻正在酝酿之中。彼得不得不关闭了办事处，以躲开“猎狗”的追逐。他把皮娅送到明尼苏达州，住到褒曼的商业经理的妻子弗农太太家里去。

褒曼了解彼得已有 14 年了，知道他绝对忠实。现在彼得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说，这位“意大利人”（彼得经常这样称罗伯托）离开他们在贝弗利山的住宅那天，曾向彼得保证过，他惟一关切的事情就是拍摄一部传世的影片，把褒曼托付给他是可以信赖的。他将保护褒曼不让人们说她的闲话。他喜欢彼得“就像他是自己的兄弟”。他将应彼得的请求，会尽快地把褒曼介绍给安娜认识。然而，罗伯托却设法在褒曼到达罗马之前把安娜骗到伦敦。他还切断了褒曼和所有朋友以及外界的联系，背叛了彼得。而彼得曾每天清晨给他送早餐，并为他筹钱，以归还他的私人债务。

彼得深信这样的事情是一个“本质善良，为人公道”的女人做不出来的。他曾对褒曼有过意见，要她除了为自己打算之外，也要多想想别人，并且说“现在你也该到了懂事的年龄了”。彼得说，在婚后的生活中，他一直想办法帮助褒曼；他承担了褒曼所有的责任和义务。以前如果让她自己承担这些事情，也许更明智些。他抱怨褒曼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会有缺乏主见和内心痛苦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爱褒曼，“任何一个爱自己妻子的男人也不会像我一样给你那么多的自由。”彼得说，仅仅几个星期以前，1949 年 1 月时，他一直非常快活；他同建筑师一起设计了新的厨房和育儿室，为“将来生育的孩子”做好准备，但是在意大利只呆了两个星期，褒曼就把他毁了，现在只有上帝能帮助他们了。

罗伯托给褒曼的丈夫彼得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彼得：

你记得我答应你永远对你忠实。我认为现在是你、英格丽和我 3 个人开诚布公地交谈的时候了，希望我们彼此能用尊重的、通情达理的眼睛正视三方。

我离开美国后，在意大利度过了 3 个星期，此间我所受到的折磨，即回到安娜身边的责任使我懂得了，我对英格丽的感情是多么深，我曾经告诉你那种感情。英格丽抵达后，我们的感情，她的眼泪使我真正下了决心。现在彼得，我想同你通情达理地谈谈。

怎么办？如果我对你没有崇高的评价和尊敬的话，一切都会很容易。但是英格丽和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背叛你，不想使你受到无情的伤害。什么都不告诉你吗？让时间拖下去，不，那样做肯定是背叛你，而且是不通人情的。在你的信和电报的字里行间，你的疑虑和痛楚是明显的，因此马上让你了解所有的情况对你有好处，对你对我和褒曼都有好处。我知道我使你陷入极度的悲伤。相信我，你的悲伤对我也是极大的痛苦。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说话的那个晚上，你告诉我英格丽容易动感情、敏感但并不聪明，一冲动就没有头脑。相信我，如果你那样认为，那你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非常认

真地，并以诚挚的冷静深思过。在两个月中英格丽和我隐藏着相互的爱慕，因为我们在贝弗利山相见后，立即理解这是件非常大的和严肃的事情，我们感到如果把这种感情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将永远分不开了。为了不伤害你，我们什么都没说，直到无言以对的白热化。现在，我们在这里，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被一种不可言状的爱所支配，同时对于不得不给你造成痛苦而感到难过。你把英格丽判断错了，错的是你对她那么生硬，总是命令式的，致使她害怕你，而这种恐惧才使她悄悄离开了你……我想告诉你，我要保护英格丽使她不受你的惊吓，你使她担惊害怕是不公正的……希望你理解任何人都不能谴责一种伟大的爱，反对它也是徒劳的。

我已开始办理离婚手续，现在彼得，请让我们彼此之间通情达理，谅解和相互尊重吧。

罗伯托

彼得一口咬定他没有接到这封信。报纸援引彼得的话说：“英格丽可能使用了麻醉品，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在做什么。”

B 安娜的早逝是一个悲剧。她声称，从来没有当过这位导演的情人……

意大利报界以虚伪的愤慨、快活的影射和十足的喜悦叫嚷着，喧嚣着。“特拉瓦索”杂志特编辑了一整页的彩色漫画，描绘了演《圣女贞德》女主角的褒曼穿戴着全身盔甲被捆绑在木桩上，罗伯托在阻止安娜用火柴去点火，他抗议说：“你知道你要烧的是 100 万美元吗？”——而安娜说：“我才不管呢。我要毁掉整个斯特龙博列岛。”

安娜·马尼亚尼的照片是在抵达巴黎时由“法国晚报”拍摄的，她的嘴角向两边咧开，露出美丽的牙齿。通栏大字标题写着：“罗伯托——褒曼——令我发笑！”

在回答问题时，记者报道了安娜的话：“我从来没有当过这位导演的情妇，而且我从来干涉他的恋爱。我同他的关系一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梦魇。我惟一遗憾的是他把我去下，赶往美国，使我下部片子无人导演。”

“他在美国时，你们的关系怎样？”

“他每天给我来电话。他住在英格丽·褒曼家里的时候，偷偷给我打电报。”

“那么你在伦敦时怎么样？”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直到英格丽·褒曼宣布她离婚才不打了。”

“你难道不应该去斯特龙博列岛吗？”

“我从来没想过。我现在想做的是为我的工作和孩子。我相信英格丽和我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但她们没有成为最好的朋友。事实上她们一直没见过面。厄科尔·格雷齐亚戴是罗马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他认识意大利电影界每一个具有影响的人。他是罗伯托和安娜·马尼亚尼的朋友，以后也是褒曼的朋友。他总是表示安娜的行为无可挑剔。“她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她从来没批评过罗伯托或者英格丽一句。这个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出生在罗马一个赤贫家庭的女人，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女星，在人格方面也是伟大的。”

许多年以后褒曼回顾了那几年的情况，终于同意这种评价。安娜也

是个不幸的女人。

褒曼认为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安娜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安娜深深地爱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褒曼所知，后来他们多年没有了来往，但在70年代安娜患病了，罗伯托听说病重，就写了一个便条，送了一些鲜花到医院去。她写了回条并问他能否来探望她。他去了，从那以后他按时去，一直到她去世为止。

褒曼听到这个消息时，从伦敦打电话告诉罗伯托，他这样做是对的，她感到极为快慰。破镜终于重圆了。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的葬礼隆重得体。街上挤满了人群，教堂旁边也围满了怀念她的人，人们含着泪水。她被意大利人爱得如此之深是尤为感人的。当灵柩抬出来时，人们怀着深切的悲哀向她道别。那时没有埋葬她的地方，她事先没在坟场买块墓地，所以罗伯托把她的棺材葬入他家族的墓地，就在罗马附近，同罗西里尼家庭的人埋在一起。

在斯特龙博列岛上没有饭店，没有电话，只有一个很小的邮电办事处，没有自来水，因此连卫生设备也没有。由于没有汽车，只有靠两条腿跑来跑去，这里的居民很少，主要是儿童和上了年岁的人。大多数年轻人都离开这里到陆地谋生。或者在德国、法国工作，寄回一部分工资给妻子和父母。

这是一个没有欢乐的奇岛。为了生存，老人们在这不毛之地和鱼类枯竭的海湾施尽千方百计，除此之外，他们无可依赖。他们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着沉重的劳动。受这种沉寂气氛的影响，曾经非常活跃和快活的影片拍摄队也逐渐变得冷漠无情，开始分裂、互相提防，形成好斗的若干集团。罗伯托、褒曼、罗伯托的妹妹玛塞拉、褒曼的秘书埃伦·南瓦尔德是一伙的。褒曼不十分了解自己要个秘书做什么，但是这是在与雷电华公司签订的合同上写明的，所以埃伦无论对什么事都插手帮忙。他们分别住在靠海的一所4间房的浅粉色住宅里。罗伯托坚持必须为所有的电影明星安排浴室。这样，靠着这所旧住宅又修建了一间特殊的房子。洗澡盆、马桶和坐浴盆都运到了岛上。岛民们从未见过这些奇妙的玩艺儿，费了半天劲也安装不好。他们在浴室房顶装上一个漏斗，洗澡时，值班员将海水一桶一桶地倒进漏斗。

好莱坞的利益是由阿尔特·科恩先生代表的。他是雷电华公司派来的作家，在罗伯托的作品里插进适量的、可以被承认的对白。阿尔特的妻子玛尔塔也是一位作家。他们俩人都喜欢褒曼和罗伯托，马上和他们结伴。

雷电华公司还派来一名英国籍的广告设计师，他看了一下这儿的设施之后，就离开他们到岛的另一端的小房子里住，那儿可以眺望大海。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把杜松子酒和软饮料搅拌起来，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他和谁也不交往，只是记了大量的笔记以备将来使用。

C 她有了“哨兵”和盯梢者，他们要挖出她的隐私。派这位广告师来的目的是协助他们工作。而他所做的一切则完全是为了监视。世界各地的报社都派人来斯特龙博列岛，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电影？他们根本不关心……至于桃色新闻呢……

这倒是他们需要的，并作为重大新闻加以渲染、扩大。这位宣传员最后终于离开了。他走后为英国《星期日报》写了许多篇报道，内容都是胡编乱造。他甚至还编造了罗伯托和褒曼的对话。原来他就是那个跑到褒曼洗澡间看放着几把牙刷的人。实际上一切都是虚构的。褒曼简直气极了，她去找那位律师说：“我要控告他，我要控告他！”律师说：“控告他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明白，这正是报纸求之不得的、绝妙的重大的法律控告案。这家报纸从此会名声大振，利润会滚滚而来。他必须去伦敦，还要出席作证，他们要问很多使你难堪的问题。你真想去受这些罪吗？”她想了想说：“不。”褒曼想，全世界都会相信他所写的那些东西是真的了。

在罗伯托眼里，雷电华公司现在成了他的头号敌人。影片公司所懊恼的是褒曼周围发生的“丑闻”，担心这部影片会遭禁演，以至不得不派出作家、宣传人员、制片经理来设法保护他们的巨额投资。

罗伯托一直是全部摄制工作唯一的主宰者。他想要使这种愉快的状态继续下去。作家们可以被允许进行基本创作，而罗伯托，是用摄影机来写作的。通过他使用的并列角度、灯光、色彩的变化，情绪的反应，描写并揭露了人类本身固有的矛盾、怜悯的渴望。所以他不需要作家。事实上他越来越喜欢阿尔特·科恩，几乎忘记了他是作家，但他始终不允许阿尔特在影片中插进任何对白内容。至于派来的宣传人员，他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他们。而制片经理、制片的细节、拍摄的速度，这些权利是罗伯托要维护的。

俟德·基利是雷电华公司派来的第一个制片经理，他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好莱坞以解决难题闻名的哈罗德·刘易士取代了他。哈罗德身体魁梧，健壮如牛，且顽强而有进取心。他的信条是：宁肯要火腿而不要艺术。他的职责是把制片工作推向新高度，保持工作的神速进度，使一卷卷拍好了的胶片及时装箱，以便安全运回美国。

对罗伯托来说，伟大的影片是想象力和灵感的产物。他的灵感被激发时，他会像疯子一样拼命工作。罗伯托以一个高超的斗牛士所具有的敏捷性和准确性，避开哈罗德要求高效率的大叫大嚷。他那意大利眼睛一眨，就能找出胶片盒里拍好的胶片为什么长度不够的理由。他用礼貌的风度使哈罗德倾倒并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

罗伯托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难以捉摸，十分粗暴，感情容易冲动，常作富于热情的手势。尽管他大发雷霆，人们也觉得他亲切和通情达理。大家除了对他让步以外，别无他法。即使在斯特龙博列岛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只有褒曼对此进行了一次尝试。

D 热恋者之间也有火爆和暴风骤雨来临的时刻，但他们仍衷心地相爱着。他的魅力、关怀、以至缺点总是战胜了她……

罗伯托“生性不喜欢男演员”，但在男演员中，他仍有许多朋友，这是因为他感到他们有趣，但是他拒绝相信他们。“你看到过男演员照镜子吗？”他说。“我认为女人倒没什么，因为她们总是照镜子，而男演员一照镜子就必须摆弄领带，或者往后梳一梳吹乱了头发，或者

干点别的什么事情。”

从一开始，褒曼同罗伯托在一起工作，互相交换意见就没有什么困难。褒曼能理解罗伯托的眼神，甚至当他不能用语言说明他想要做的事情时，褒曼可以感觉到他之所想……

在最初的日子里，在斯特龙博列岛上，他们没有专业男演员，只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褒曼永远不会忘记同罗伯托第一次激烈争吵的原因。她天天忍受着罗伯托的固执，终于忍无可忍了。褒曼向他发了火，她简直气得发抖。“你要拍现实主义的片子你就拍去好了，”她喊道，“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这些人甚至连对话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往哪里站，他们不懂规范，不加约束，任意行动。我无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了。哪怕是一天！”

长时间的沉默。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两个热恋者之间，似乎太不应该了，甚至那些意大利人吓得停止了谈话。罗伯托找来的这些人都是农民。褒曼并不反对农民，她喜欢农民，但是让他们去演戏，她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农民们毫无顾忌，他们只站在旁边看热闹，大声笑着，罗伯托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按这条白线走到那个地方去，摄影机就在这里，明白吗？”然后他们就会回答：“好，是走这条线吧？这样走对吗？”罗伯托让他们随便谈个话题，于是他们就喋喋不休地说开了，而褒曼站在那里像个痴人，因为她不懂意大利语，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说完，更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伯托在他们大拇脚趾上拴了一条线，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线，起初他拉拉这条线，一个男人说话了，接着他又拉另一条线，另一个人说话了，褒曼的脚指头并没有拴线，所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而这就是罗伯托以现实主义的拍片方法！对白总也弄不好，或者，根本不要对白。褒曼觉得自己要发狂了。

接着就是爬上火山去，那个喷着火的活火山！第一次褒曼必须试着爬，他们顽强地往上爬了整整4个小时。爬了近2小时后，她坐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很抱歉，我爬不动了。”但是休息以后，她又爬了上去，在火山顶上，她不得不躺在那里，感到十分疲劳。以这样的速度他们恐怕永远拍不完这部片子。

自然，罗伯托把她的发火看成是电影明星的正常行为。褒曼爱上他就是因为他这种人很罕见。以前褒曼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从没有看到过对生活采取这种自由和放纵态度的人。他把现实生活里的每件事都放下了，他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尺度，一味寻求新的刺激，新的地平线。他给了褒曼从来没有过的勇气。褒曼总是怕这怕那，他说：“害怕什么？有什么可怕啊？”罗伯托从来不惧怕任何人和事……如果一只黑猫在他车前跑过马路，他就把车停下来，等着另一辆车开过去，那么那个司机就帮他坏运带跑了。

所以，尽管发了暴风雨般的脾气，褒曼从未怀疑过罗伯托，从来没有不爱他。漫长的一天结束后，他的魅力，他的关怀，以及他的缺点，总是把她战胜了。

褒曼着迷般地相信他的才华。她也知道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他使用了同样的先进技术并创造了更新的纪录。

褒曼常常对罗伯托与她连在一起的偶然事件感到惊讶不已。例如，她给罗伯托的第一封信寄到米纳瓦电影制片厂时，这个厂马上就烧毁了，而这封信居然从灰烬中被找了出来。《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由于类似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好运在美国首场演出时取得了成功。

在意大利这部影片却失败了，评论家们不喜欢，观众也不愿意看。它在美国发行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由于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一位美国大兵罗德·盖格尔，一天横穿罗马的一条大街，他的脚绊在电缆上，脸朝下摔倒在地。这条电缆原来是那天晚上罗伯托在拍摄影片时，他的摄制组里一个机灵的电工把插头非法插到为美国陆军印《星条报》的印刷厂的电源上的。水兵罗德从地上爬起来，顺着电缆找来源，找到后来，发觉自己正站在拍摄影片的镜头中间。

罗德对罗伯托说，电影是他生命的血液，他在世界电影界中有广泛的联系。几个星期以后，他从陆军退役，箱子里装着一个宝贵的影片拷贝，动身去纽约了。

在纽约，他安排影片发行人乔·巴斯廷恩看了这部片子。乔先生安排了发行，这部影片据说在美国挣了50万美金。而罗伯托和他的助手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中的分文。但是乔先生却做了这样的交易——为罗伯托在拍摄《游击队》影片提供一笔资金。

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乔先生没有立即认识到它是一部令人赞叹不已、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品。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这是“真正的东西”。辛酸的现实使罗伯托得以生动地描写了在令人发指的专政后期和绝望的战争结束时的那个破旧、消沉、颓废的罗马：很少有人知道居然有这样的背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评论家们公认这是世界电影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影片。

关于罗伯托这部在遇到褒曼以前所拍摄的影片，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一影片中，罗伯托竟把褒曼的姓名全用上了：英格丽是那个罪恶的法国女人，褒曼是那个纳粹上尉。

褒曼知道，罗伯托一心所想的是“人”和“生活冒险”，他不喜欢摄影棚、道具和化妆，因为这些东西只能导致不真实。褒曼理解，为什么他感到有专门技艺和显著个性的专业男演员会抹煞他想创造的独特人物性格。

“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停止在表面，”罗伯托说，“而是在寻觅灵魂最微妙的东西。”他还说：“我一点也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只是个现实主义者，我非常愿意去表现一个充满欢乐和平静的幸福世界，如果我们事先能够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转回到圣弗兰西斯世界的原因，尽管世界上存在着邪恶，但他从博爱和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中找到了欢乐。而在今天，世界上似乎没有人愿意从这方面去寻找欢乐。”

罗伯托送给褒曼一只黑色的巴儿狗。这正是她需要的。她把它放在黑色熔岩的沙土上，它居然消失在沙土之中了——狗毛的颜色和沙土的

颜色完全一样，狗和沙土分辨不清。他们给这只狗取名“斯特龙博列”。以后这只巴儿狗和褒曼在一起呆了好多年，它朝着所有的摄影师亲切地吠叫不止。

因为褒曼感到很疲倦，罗伯托从陆地上买了两头驴子。斯特龙博列岛上许多人从来没有看到过驴，也没看到过电影。所以罗伯托也弄来几部影片，在广场上支起银幕放映给他们看。老人们简直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个非常原始落后的岛屿。

罗伯托在萨莱诺海滩上找来的两个男人，使出全力搬运东西，努力地工作着。他们还不知道罗伯托准备把他们俩人其中的一个当拍片主角来使用。罗伯托习惯地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使用业余爱好者了吧。如果我使用男演员，他们是不会搬运这些东西的。”

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渔民，他们只认为自己将在影片里扮演渔民。所以他们也参加搬运灯光设备、摄影机和其他设备。罗伯托让他们干各种各样的活，一直在非常密切地观察他们。他起初认为那个身材高的、长得比较英俊的人能扮演主要角色，可是后来他对褒曼说：“对不起，那个矮个子更聪明些，由他来演你的男主人公再合适不过了。”

当马里奥·瓦伊塔尔知道要他担任这个工作时高兴极了，他问：“那我什么时候吻她呢？”

“不用，”罗伯托醋意大发地说，“不，不需要，你每周挣75美元，这就很不错了。”个儿高的男孩在影片里扮演了另一个配角。

每星期从那不勒斯来的邮船都带来朋友、敌人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的信件。住在街心公园南区180号的费雷德·库兹先生寄来一封友好的信，信中向褒曼保证说：“对于你们俩人之间明显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感情，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加以敌视和谴责。作为一名作曲家，我正在为你们俩人作一曲美丽悦耳的新歌。我将把手稿——其中包括歌词和乐谱写好后寄给你。这首歌的题目是：‘我的西西里人是百万人里挑一，我这样爱他是不奇怪的’。”褒曼保存了这封信。

F 一封美国电影协会的来信引起她强烈的愤慨和痛苦……

1949年4月12日褒曼收到一封美国电影协会的来信。这个协会是一个由制片人自发组织的负责审查影片的机构，以保证在出资拍摄之前否定不能登大雅之堂影片，以便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对电影保持应有的道德标准。信是由制片标准管理委员会主任约瑟夫·埃·布林署名签发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褒曼小姐：

近来，美国报纸以很大的篇幅登载了有关你要离开丈夫，遗弃孩子，嫁给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消息。

毋庸置疑，这些报道使得那些曾经把你看成是银幕上的第一夫人的大部分人感到极度的惊讶。无论是从个人方面来说，还是从艺术方面来说，你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无可伦比的。从各方面我都听到人们对你有这种打算感到深为震惊。

我冒昧地就此问题给你写信，目的是为了引起你对目前形势的审视。我感到这些

报道也许并不真实，可能是某些报刊代理人过分热忱的结果，他们错误地认为从宣传效果出发这样做会有帮助。

持这种看法的任何人，自然是犯了悲剧性的错误。这样的事情不仅不会对你的影片起到有利的作用，而且还会极大地毁掉你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的前程。这可能导致美国公众的气愤，致使你主演的影片无人青睐，使你的票房价值遭到彻底毁灭。

情况已经变得异常严峻了，我谨冒昧地向你建议：找个适当机会否认这些谣传，越快越好，并十分坦率地宣布，它们是不真实的，你并不打算遗弃你的孩子和离开你的丈夫，也没有嫁给任何人的意图。

我极为诚恳地向你提出上述建议，完全是为了想制止一件丑闻的出笼和导致个人艺术的灭顶之灾的不正确报道。

希望对我这么坦率地给你写信不必放在心上。这件事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把我对此事反复考虑的想法转达给你。

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的真诚的约瑟夫·埃·布林

这封信不仅威胁了褒曼的影星生涯，也影响了她的生活。当时正在美国和欧洲广为发行的《圣女贞德》是否能成功也受到了影响。它还威胁着当时即将发行的她主演的下一部影片《摩羯星下》，而那时正在斯特龙博列岛拍摄的、构成这件风流“丑事”起因的那部影片的前途，更是受到威胁。由于好莱坞的制片商们握有巨大的权力，那些电影组织又控制在他们手中，如果他们出面干涉，这3部影片有可能被禁演或收回发行权。

监制《圣女贞德》影片的沃尔特·瓦格纳发来一封电报，内容更加重了褒曼的疑虑：

亲爱的英格丽，他们对你的恶意中伤，需要你立即出面反驳。如果你不关心自己和你的家庭，你应该了解由于我信任你和你的诚实，我才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你不出面反驳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电台和报纸传播的丑恶谣言，我的前途以及我的家庭的前途均将受到危害，完全会断送在你的手中。

我们应该对维克多·蒲莱敏和对相信我们的所有的人负责。可能你现在仍不知道或者没人告诉你，报纸上发表的这些新闻的分量及其后果，或者你现在头脑仍不清醒。不要自欺欺人，认为你所作所为是勇敢的或富有艺术性的，而把正常人的意见当成耳旁风。

收到此电后盼即复。

剪报、信件、漫画、嘲弄、愤慨的批评如雪片般飞来。褒曼思绪混乱，感觉自疚，几乎无法忍受。绝望中，她起草了一封给唐赛尔神父的信，他是位善良的法国神父，在《圣女贞德》一片中担任顾问。褒曼对他极为尊敬。

亲爱的唐赛尔神父：

我一定使你非常伤心，并使你的幻想破灭了！我把你形容我的那些极为美好的言词变得如此荒谬！当人们喜爱你并给予崇高评价时，你被捧得那么高；而在一落千丈的时候，又是摔得那么重！当前在世界上流传的报道和说三道四的闲言杂语中，我认为许多是说谎者和心怀恶意的人的发明专利。但其中也有真实的情况。我的隐私被公

诸于众，使我感到震惊，我所做的或说的，甚至电报、电话都被某些人提供给报纸。我能想象到我丈夫所经受的痛苦，我是如何伤害和羞辱了他和女儿皮娅。我写信给我的丈夫要求离婚，这是真的。我认为马上告诉他也许更好一些，更诚实一些。

我从未想到，在我向他提出离婚时，正在世界上酝酿着这种耸人听闻的“丑闻”。彼得现在在意大利，被记者到处追逐着。由于风大浪大，我还没能离开海岛去会见他。我对给家庭和同我一起拍片的同事们造成了悲剧十分难过。我知道我多么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英雄贞德……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在大庭广众之中出头露面太难了。因此我希望，如果我终止影坛生涯隐居起来，或许能够挽救贞德和我的人格尊严。我已把这个决定告诉好莱坞的布林，希望我已经拍好的影片不被禁演，同那几部影片有关的人员不要因为我而遭到非难。随信献上我所有的爱。

第十章 再婚会幸福吗

A 离婚前，科罗拉多州可敬爱的约翰逊 1950 年 3 月 14 日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一篇讲话，攻击褒曼和一位导演。话语尖酸刻薄，且令人震惊。在这种场合攻击电影界人士，在美国的参议院是空前的。

“主席先生，有一部无聊透顶，描写一个怀孕女人和一座火山的影片，但却以卑鄙的手法得以在美国风靡一时，诱惑了多少良知。对此，雷电华公司和名声不好的罗西里尼都欣喜若狂，而我们却只是漠然视之，毫无作为。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只要这件丑闻一传过就可以宽心，就可以把它遗忘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们必须想出办法，使人民将来不至受骗……”

“主席先生，即使在这千奇百怪的现代世界里，为了给一部毫无感染力的庸俗作品增加点胡椒面，让一位因婚外恋而怀孕的好莱坞红得发紫的明星去扮演一个卑鄙的女骗子，也实在令人作呕。为了钱——票房价值，他们竟然在《火山边缘之恋》一片中大胆地以白描手法渲染了这位女主角的婚外恋情……”

他又以轻蔑的口吻总结性地说：“新闻界胡吹乱捧的宣传报道真是令人作呕……这家公司赤裸裸地暴露出它那令人厌恶的商业投机心理……罗西里尼，这个不值一提的寡廉鲜耻的小人，在卑鄙下流和违反良好公德方面创造了可耻的记录……”

他说，他将提交一件提案，“要求商务部有关司局做出规定，女演员、制片人及影片必须经过审查并得到发行放映许可证后，才能拍片。”“英格丽·褒曼犯了‘侵犯婚姻制度罪’”，他认为褒曼是“当今世界影坛最有影响的女人之一，但是，她的影响会引导人们走入歧途……”

“当罗西里尼这个爱情的掠夺者面带胜利的微笑回到意大利时，系在这位凯旋而归的英雄腰带上的不是林斯特罗姆夫人的头皮，而是她的灵魂。彼得·林斯特罗姆夫人的肉体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它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没有母亲，另一个是非法的。”

在参议院永久性档案的记录中，附在这位参议员讲话后面的材料是从报纸、杂志中选择的 12 段摘录，都是痛斥褒曼和罗西里尼的。其中一篇是华盛顿明星报评论家杰伊·卡姆迪的批评：“这部影片是粗制滥造的拙劣作品，情节既单调又毫无意义，表演更荒唐可笑……像褒曼小姐的《天鹅之歌》一片，还是早点忘掉为好。”

约克逊先生承认褒曼曾经是他所喜爱的影星……他说：“她和蔼可亲，通情达理，她那吸引人的性格征服了每一个演员和观众。上帝对英格丽·褒曼一直是仁慈的。但是难道她患有可怕的精神分裂症吗？她是受某种催眠术影响的受害者吗？……她对自己的女儿皮娅的态度是反常的，肯定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毛病……根据我们的法律，犯有堕落罪的外国人是不能再在美国呆下去的。彼得·林斯特罗姆夫人竟离开了对她如此宽厚的国家，这完全是某些人蓄谋已久的。”他在讲话结束时说：“如

果从好莱坞《火山边缘之恋》一片的堕落中吸取了教训，并因而树立正派的艺术作风，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那么，英格丽·褒曼虽然毁灭了她的事业，但她能起到‘教师’的作用，从她的毁灭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完美的好莱坞。”

褒曼就是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谩骂声中，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在罗马度过圣诞节的。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仇恨和诅咒罗伯托和褒曼的恶浪铺天盖地而来。在罗马，到处是旅游者和朝圣者。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挂着饰物和彩旗，而她这个“淫妇”，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之中。

这完全是一个麻木的生存空间。褒曼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决定做一个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的女人。罗伯托家里的人待她不分彼此，极为可亲。他的妹妹玛赛拉的女儿菲奥雷拉，比褒曼的女儿皮娅稍微大一些，她和褒曼的关系极好，就像她自己的女儿一样。

罗伯托买下了圣玛丽奈拉公寓，那是一所坐落在海边的大住宅，离罗马 60 公里。但是他不让褒曼到那里去，因为意大利的老妈妈们传统地认为，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在离海很近的地方住。据说这样会对他们的听力、记忆力或者别的方面有害。罗伯托仍然在发疯似的拍摄《圣弗兰西斯之花》一片，所以他白天总是不在家，可是一到夜晚，全家人可以听到他驾车从山边往上爬坡的马达声，“费拉里”轿车大声鸣叫，他进门之后就就要来吻褒曼和罗勃蒂诺，然后几乎一倒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就立刻开车回罗马城里。

彼得必须成为美国公民才能自行开业。1949 年 11 月 1 日，他被接纳为美国公民。而褒曼却一直不想放弃她的瑞典国籍。她觉得，只要瑞典存在，做个美国人她是不会心安理得的。

B 她是一个已婚的瑞典公民，想要离婚，再嫁给一个未解除婚约的意大利人，而她的丈夫现在是个美国公民，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她要 and 罗伯托结为夫妻，这需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艰巨过程……

通过新闻媒体，全世界都知道褒曼生了个 7 磅的男孩，他的父亲——正如报纸上印的大标题：罗伯托·罗西里尼。但是，褒曼的名字能写在出生证明书上吗？不能！她仍然是彼得的妻子。如果写上她的名字，彼得将正式成为孩子的父亲。那么罗伯托则要捣毁出生登记处——这是他扬言的。如果他们能在出生登记的期限内办妥离婚手续，那就没问题了，因此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彼得一点也不着急。他一定要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且对他有利时，他才在加利福尼亚州办好离婚手续。彼得认为，他们在欧洲办的任何离婚手续都是非法的。他们在各地都试图办妥离婚手续。可是，惟一有希望的地方看来是墨西哥。于是褒曼找来了律师，她以感情不和等理由提出了离婚申请。2 月 9 日，她收到一封电报，说离婚已获批准，罗伯托和她可以与他们选择的任何人结婚。

然而 2 月 9 日对于领取出生证明书来说已为时过晚了。罗伯托不得不把自己登记为孩子的父亲，把褒曼登记为“身份有待说明的母亲”。

下一步棋是怎样才能合法结婚？瑞典和美国一样，都不承认墨西哥代理人出面办理的离婚，所以根据瑞典的法律条款，褒曼仍然是彼得的

妻子。除非她能提出瑞典的离婚证明文件，意大利当局才允许她再结婚。而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只能再到墨西哥找律师。他们的一个好朋友马塞罗·吉罗西，也是罗马影片公司的制片人，他飞往墨西哥，代表褒曼，同时还带着一个律师去参加结婚典礼。所以造成了两个男人充当鸳鸯的可笑局面，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我要你，英格丽·褒曼做我的合法妻子，”另一个则说：“我要你，罗伯托·罗西里尼，做我的合法的丈夫。”这种结婚游戏近于荒唐，令人啼笑皆非。

结婚典礼举行的那一天，马塞罗打电话告诉褒曼确切的时间，因为她希望就在他们说“我愿意”的时刻，她会感到，从数千英里以外说出的这些话能够传到呆在罗马教堂里的罗伯托和褒曼的耳中。她已经选好一座庄重肃穆的罗马教堂，外面停泊着一只小船。

那天晚上褒曼请了一些朋友，他们不知道受邀请的原因，以为只是像平常一样来吃晚饭。这些朋友是：阿米迪、费里尼和莉安娜·费里。电话铃响了，是罗伯托打来的，他像往常一样又耽搁在摄影棚里了。褒曼几乎要发脾气了，因为他俩一定要在教堂晚上关门以前赶到那里去。罗伯托终于来了，可是教堂也关门了。于是他们又另外找了一个坐落在阿比亚的一所很洁净的小教堂，在圣像下，褒曼跪了下来，罗伯托拉着她的手，然后他们回到家里，告诉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大家“乒”的一声打开了一大瓶香槟酒……

自然在这段时间里褒曼一直遇到语言障碍。尽管她的法语不好，罗伯托还是用法语和她交谈，然而不能完美地表达思想感情，结果还是说意大利语。褒曼没有正式上过法语课，只是凭听力来学习。她基本能用四种语言交际：瑞典语、英语、德语和法语。

褒曼很喜欢罗伯托的母亲。这位老人身材不高，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听力也不佳。她也很喜欢褒曼，她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罗伯托的母亲是个叫人感到愉快的女人，受过良好教育。她在威尼斯爱上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建筑师，就嫁给了他。他就是罗伯托的父亲。那时，她很年轻，家庭很富裕。父亲把4个孩子也惯坏了。罗伯托是长子。好几个英国家庭女教师先后教罗伯托英语。然而罗伯托极有个性，却不愿说英语，结果所有的家庭女教师回英国时，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罗伯托却仍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罗伯托的母亲和蔼可亲，对褒曼是个极大的安慰。她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星期天去教堂，每天早晚都坚持做祷告。她对褒曼说，希望她把孩子们培养成天主教徒。褒曼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为了使她高兴，褒曼表示同意她的说法。这倒不是罗伯托曾经施加什么压力，而是褒曼自己认为，既然家住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就不必坚持让孩子们成为马丁·路德的信徒或圣公会的成员。她对不同的教派从来没有过强烈的信仰。罗伯托对宗教也没有太深的感情色彩。

后来罗伯托和褒曼冬季住在罗马布伦诺·勃吉山上的一套10间公寓里，夏天就住到海边的圣玛丽奈拉去。褒曼一天到晚十分悠闲，因为仆人很多，家中琐事都有人做，买菜和做饭都不用她操心，也不用洗衣服、铺床或干其他家务事，但她还是坚持到处擦洗在他们眼里不认为是脏的物件器皿。褒曼觉得瑞典人的眼睛能看到的脏处和尘土要比意大利看到的多。

罗伯托像往常一样，继续过着富有的和高消费的生活。他卖好一部电影权，又卖另一部电影权。这部片子赚了钱，那一部片子就赔进去了。

圣玛丽奈拉别墅有个大花园，其中棕榈和松树成荫。这里有遮阳的长长游廊。汽车房里经常停放着四五辆汽车。小狗、小鸡处处皆是。在众多仆人的接待下，客人不断地出出进进。后面还有一条沿海岸行驶的铁路线，乘客们在经过他们的住所时，会挤在靠近他们的住房的一边，吵吵嚷嚷地向他们挥手和欢呼。他们家似乎成了旅游地的一个景点。他们也挥手向这些过往的人们致意。

褒曼不知道罗伯托是怎样维持生计的。罗伯托对人总是很慷慨。每星期一早上她去罗伯托那里拿零花钱。有时她说：“我需要买一双鞋。”他就说：“好，别买1双，还是买6双鞋吧，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些时间。”他有钱时大方，没钱时仍然慷慨。他什么都送人。问题是他也把朋友送的礼物又转送给另一些朋友。

罗伯托还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矛盾着的内心世界。他敬慕普通工人，他的大部分影片是描写劳动人民的。但是碰到支付小额费用，或为小人物做些必要的事情时，他就不那么着急和大方了。“忙什么，有的是时间。”使褒曼生气的是他们对此也毫无办法，总是一言不发。她对他们的小债主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账单交给他？你们为什么不去法院控告他？”

“我们怎能对我们的大师那样做呢？”

人们一叫罗伯托“大师”，他就生气地说：“我不是大师，”“但是你配得上当大师，你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师。”他们宁肯饿肚皮也不愿向“大师”讨债。褒曼气极了，东借西凑想办法付了欠他们的钱，她知道，这些人都是依靠罗伯托过活的。

褒曼说，罗伯托性格中有些东西是使人感动的，如果你说了些有趣的事情之后，他对你做个含情脉脉姿态，他会拿一种特殊的眼神看着你，向你表示他也有同感。你看着他的这种神情，会使你感到像得了奥斯卡金奖一样的高兴。每当他做出那种动人的神情时，在大多情况下，人们都会向他“缴械投降的”。

但是他发起脾气来，也可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一次，为了请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鲁宾斯坦和夫人来吃饭，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还是在褒曼和彼得同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鲁宾斯坦夫妇是他们的邻居。褒曼和皮娅都爱听他的钢琴演奏。后来他们两家成了朋友，褒曼和彼得曾应邀去他们家共进晚餐。褒曼和罗伯托住在罗马时，鲁宾斯坦到罗马举办音乐会。褒曼去听了他的音乐会，还去后台看望他们。他们夫妇看见褒曼非常高兴。褒曼热情地对他们说：“请你们方便的时候哪天晚上来我家里吃顿便饭好吗？”

“好哇，当然要去，”他们说。“我们对每天晚上的宴会都腻味了。这简直太好了。”

“好，好，罗伯托的弟弟伦佐是个作曲家，我也把他们夫妇请来。”

“太好了，太好了。”

褒曼把这件事告诉了罗伯托，他也赞成这个做法。褒曼尽其所能准备了晚饭。伦佐夫妇来了。鲁宾斯坦夫妇也来了，可就是罗伯托还没回来。他们喝了一杯酒，又喝了一杯酒，喝到第三杯酒时，褒曼开始紧张

不安了。她给摄影场打电话，罗伯托说：“是啊，有什么事吗？”

“你是不是忘了世界闻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和他的妻子到我们家来吃晚饭？我们在等你，我们已经喝到第三杯马提尼酒了，你一定得回来。”

“回家！”罗伯托生气地说。“我忙着呢，我在剪接影片。我尽快地回来吧。”

褒曼竭力装出一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的家庭主妇的样子说：“罗伯托要稍晚回来一会儿。我们先去吃饭好吗？他会赶来的……”

客人们鱼贯走进餐厅，吃了意大利辣火腿和西瓜，接着就要吃面条了。褒曼坐在那里看着那个空着的座位……于是她又去打电话催罗伯托快点回来。

“好吧，好吧，我尽快地回来。”他们继续用餐，吃完了主菜和甜食，话题越来越少。褒曼不知道再怎样谈下去了。他们一直彬彬有礼地坐着。“不知什么事情把罗伯托拖住了。”她找了一些借口说，“这次配音……很重要……在摄影场耽搁了……”客人们在餐桌旁越来越觉得尴尬，于是离开了餐桌，准备去起居室喝咖啡。正在这里，他们看到罗伯托进来了。他穿过客厅直奔卧室。

褒曼终于放心了，她说：“总算回来了，他太忙了”。咱们去喝咖啡吧。”他们喝着咖啡，可是罗伯托还不露面。褒曼终于说：“我去看一看……”

他已经睡下了。“我头疼。”他说，“别打扰我。”

她说：“我简直要活不成了。我怎么能回去对他们说你头疼，已经睡觉了！”

“那么，什么也别告诉他们，就说我没回家。”

“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你回来了。他们看见你回来了。”

“我病了。告诉他们我病了。”

褒曼走了回去。她使出了她所有的表演技巧，说：“太对不起了，他觉得不舒服。”

“哟，这太不幸了。我们很不安。”他们同情地说

褒曼坐在那里，知道她的谎话会在她的脸上全部表现出来。

突然间，通向起居室的三重门被推得四敞大开，罗伯托站在那里，遗憾地伸出臂膊做出要拥抱的样子。

“大师！”他喊道。

他一下搂住鲁宾斯坦，鲁宾斯坦也同样搂住了他。他们俩人互相拥抱，然后坐在那里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他们相互尊敬，亲近，褒曼简直无法把他们扯开。她想她要得心脏病了，又觉得即使心脏病发作，她心里也高兴……

第十一章 未了之情和轰动世界的诉讼案

A “丑闻”沸沸扬扬，不可收拾。瑞典报纸说褒曼的“丑闻”是国旗上的污点。必须重返影坛，因为她的经济情况不妙，因为她无法再找到一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了。对于她退出影坛，人们都指责她的丈夫：“你太傻了，捧着金饭碗讨饭，要是你和英格丽一块拍电影，全世界的钱都会跑到你的口袋里。”全世界新闻媒体关注一桩无法终结的“孩子看母亲的权利诉讼案……”

随着炎热季节的过去，褒曼的票房价值也从第一位降到了最低点，许多电影公司因她的原因倒闭了，破产电影公司之多也创了历史纪录。

《凯旋门》失败了。拍完《圣女贞德》后，企业制片公司开始进行停业整理。由沃尔特·旺格和维克多·菲莱敏共同创建的西埃拉电影制片厂同褒曼办的EN公司合并了。为拍摄《摩羯星下》而专门成立的泛大西洋制片公司因赔本太多而销声匿迹了。可以肯定，在罗西里尼的工作小组中，没有人指望能从《火山边缘之恋》中得到利润。

1950年初，褒曼曾经给她的代理人MCA写信，由于她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或在那里工作，所以她不需要再继续物色一个美国代理人，因此不再续订合同。她说，雷电华公司没有人把他们对《斯特龙博列岛》（即《火山边缘之恋》）的意见告诉她，或者告诉罗西里尼先生。可是根据小道消息，听说他们认为影片很好，但是他们却在对它进行删节，大删大改，使之与原来影片有许多差别。

《火山边缘之恋》终于在纽约上演，可是上演的是罗伯托·罗西里尼根本不同意改编的文本。《纽约时报》说这部影片“平淡无味，缺乏创见和表现力。”《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英格丽·褒曼的表演毫无深度。导演毫无生气。在影片里，既看不到理智，也看不到激情。《斯特龙博列岛》只能由于它的丑闻而著称；作为一个电影剧本来说，既浪费了才能，又浪费了时间。”

《剧艺报》还发表了一条消息说，美国电影老板们已经表示，他们要在电影院中放映《斯特龙博列岛》，如果盈利，就继续放映。否则，他们就“以有伤风化为理由禁止上映”。

褒曼对罗伯托说，这个世界奇怪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褒曼最关心的事情并不是演员的形象，而是她的男孩和女孩皮娅。她知道在世人的心目中，她已经遗弃了皮娅。这种看法她是无法容忍的。她非常渴望结束孩子的痛苦，但这非常困难。彼得提出要求同她按美国方式离婚，这样一来，报纸又会沸沸扬扬地喧嚷一通。

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一直在关注着罗伯托和褒曼。如果他们坐在餐厅，就会有人走到罗伯托的身后，低声说几句褒曼听不懂的意大利语。在意大利，挑起一场口角是轻而易举的事。而罗伯托又是个极容易受挑动的人。每个摄影记者都知道这一点。给他拍一张怒发冲冠的照片，可比拍一张他同褒曼在餐厅吃饭的照片更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罗伯托和褒曼一道访问了威尼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瑞典报纸大肆宣扬说这件丑闻是他们国旗上的一个污点。而《火山边缘之恋》和罗伯托第一次公演的《圣弗兰西斯之花》（这部电影是褒曼生孩子时

罗伯托制作的)都一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听说彼得在提出离婚申请。

1950年10月6日,褒曼在圣玛丽奈拉给彼得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她对女儿皮娅的思念之情,她说:“.....不管你怎样说我是否对皮娅拥有权利,我知道我不能没有皮娅,.....根据法律,我们俩人拥有各半的权利。”

1950年11月1日,洛杉矶法院终于批准彼得·林斯特罗姆同褒曼解除婚约。有人问他对褒曼有什么意见,他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我感到难过的是,她使自己陷入了难堪的处境。我认为她除了外表美以外,还有很多优良的品质。”

彼得还说:“我确实为她的成熟感到骄傲,而且对她的新伴侣,我并无嫉妒之意。她在瑞典拍了9部影片,在德国拍了1部,我作为她的丈夫从来也没有干预过。她在好莱坞拍片期间,我从未涉足过摄影棚,只有两次我必须找她才在那里驻足片刻。从1943年到1950年,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从来没有连续住过3至6个月。她愿意找谁或者同谁来往都绝对自由。她为女儿皮娅并没有花费很多时间,皮娅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是我料理的,我还按时参加皮娅学校里的活动和家长教师联谊会。”

至于是否允许皮娅看望褒曼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我非常高兴带领皮娅去欧洲看她的妈妈。可是不想带着女儿去意大利。”他又补充说,轮船只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是往返航行的,褒曼完全可以在欧洲搭上另一条船。

B 奉劝天下离异的父母别把气往孩子身上撒, 不能因为离婚让孩子终生痛苦, 孩子是无辜的,是痛苦的.....

关于皮娅的归属问题,法院的判决简单明确。皮娅将留在加利福尼亚由她的父亲监护并且在加利福尼亚上学。褒曼和彼得每人同皮娅一起度过寒暑假的一半。虽然褒曼对这一判决不满,可是在当时却毫无办法。

褒曼不断给彼得写信和打电话,请他尽早安排她和女儿会面。但是他说要到1951年7月他才有时间去瑞典度假。经过数次电话和电报交涉之后,彼得终于同意了,如果褒曼不能去瑞典,他可以带皮娅去伦敦,她们母女可以在那里见面。

可是还存在着不少困难需要解决。皮娅是这次离婚案件的直接有关人员,她要离开美国,必须提出申请,并取得法院的批准。为获得司法部门的许可还需要从彼得和褒曼为支付皮娅的费用专设的信托基金中提取2000美金。接受申请的法官询问,如获批准,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是否会丧失对孩子的监护裁判权。代表彼得·林斯特罗姆的律师回答说,可以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为防止发生意外彼得·林斯特罗姆则需陪同他女儿一同去瑞典或英国探亲”。

彼得说一切必须悄悄地进行。一定不能让记者先生们对他们的会面有所了解。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对褒曼来说尤其困难。离开意大利,穿越欧洲,然后飞抵伦敦而不被发现是极难做到的。褒曼在罗马结识的好友、拍摄《摩羯星下》的悉德尼·伯恩斯坦和戴维·李恩都答应帮助

她。李恩已经和安·托德结了婚。褒曼乘火车离开了罗马，到法国去乘船。在横穿海峡的船舱单间里，她全身遮得严严实实，请求船长不要透露消息。旅途中，他一直为褒曼保守秘密。悉德尼·伯恩斯坦在多佛码头迎接她。他驾车把褒曼径直送到位于伦敦伊尔柴斯特·普雷斯的安的戴维的家中。过了一会儿，彼得带着女儿也来到了这里。

褒曼和女儿已经长久不见了，开始都感到有点陌生。她们很高兴，但是幸福的时刻并不很长。

彼得对褒曼和她的朋友并不放心。他认为皮娅有被带往意大利的危险。而且，他原要被授予神经外科教授的职称，可是由于与褒曼有关的“丑闻”而被院长否决了。

褒曼问彼得，她是否能同女儿单独在一起。他说：“好吧，我们要坐车去悉德尼·伯恩斯坦的乡间住所，你可以去那里同皮娅单独在一起。”他们去了肯特郡乡村别墅，悉德尼同他的妻子和朋友们都在那里，虽然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仍然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一间屋子里置有一台电视机，他们叫皮娅在那里看电视，彼得对褒曼说：“你可以去放电视的那间屋子，单独同皮娅在那里呆一会儿，我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褒曼说：“皮娅会发现这是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褒曼想把事情尽量安排得自然一些，这样皮娅就不会感到吃惊。可是她同皮娅坐在那里看电视，而彼得却坐在另一间房子里。最后她走进彼得那间房子对他说：“你坐在这儿多不好啊。”过了一两分钟，他走进来站在褒曼的身后，悄悄对她说：“我要带皮娅走了。请对女儿说声再见。我已决定走了。”

褒曼说：“你不是答应我同她在一起住一个星期吗。整整两年我们母女只在一起呆一个星期，这并不算多吧。”

“可是，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你不能这样。咱们到外面走廊里谈谈这个问题吧，别叫皮娅听到。”

皮娅看电视入迷了，估计没有听见父母在走廊里的谈话。

“我在伦敦只同她住了两天，一天是在这里，而你就要把她带走。请别这样做。”

“我改变了主意。我要去瑞典。我早就对你说过，让你和皮娅一起到瑞典去。”

“我怎么能去瑞典？去斯托德见你的父亲吗？这对你父亲来说是场灾难。我处理不了这事。我无法应付那种局面。”褒曼哭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哭，她怕让皮娅感到难过。

彼得说褒曼毁了他的一生，他本来早就应该得到教授职称的，可是因为这件离婚纠葛的“丑闻”而前功尽弃。他说他对褒曼始终体贴入微，而褒曼对他却是以怨报德。褒曼打断了他的话：“请别说了，请不要伤害了皮娅的心。”

于是他们同车回伦敦，皮娅和父亲住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饭店里。褒曼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半月街的一家饭店，这样她可以去看他们。褒曼回忆最后一次见到皮娅时的情景说，女儿竭力装得非常高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她把真实感情藏在心里，而褒曼也尽可能掩饰着自己的

真实情感。她和女儿吻别时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褒曼还记得，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心里在想，很快又会见到她的。可是谁知这一别竟是6年！

褒曼感到心碎般的苦痛。她一直奉劝离异的父母们说：“请分手后仍要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要让孩子心头布上阴云。夫妻不和可以分手，但不能因为离婚和争吵而让孩子终生痛苦。”

C 他们的双胞胎——一对可爱的女孩……

正当她在医院候产时，地球的另一边在演出一出闹剧：皮娅的探视权利大战。

1951年一个寒冷的秋天，罗伯托由劳伦蒂斯影业公司出资相助，开拍《51年的欧洲》，这部片子在有些国家里译名为《最伟大的爱》。影片说的是艾琳（由褒曼扮演）和乔治（由亚历山大·诺克斯扮演）之间发生的事情。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是侨居罗马的美国人，他俩的18岁的儿子因为觉得母亲既不爱他又不理解他自杀了。《纽约先驱论坛》的评论文章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博斯利·克罗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值得注意的是，英格丽的温文尔雅的扮像看上去比以前年纪大了一些，她那永远引人注目的面颊更加美丽了。”但是这部影片并没有进一步提高她的表演声誉。她知道自己又怀孕了。

他们匆忙地拍摄这部影片，使它在褒曼身孕未显形之前拍完。后来她的肚子大得特别明显。经医生检查认为是双胞胎。临产前一个月，她住进了医院。超过了该分娩的期限，医生决定为她做剖腹产。

褒曼请葛雷格森·鲍泽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准许皮娅在1952年暑期来意大利住在圣玛奈拉。这对褒曼来说，似乎只是一方的正当要求。而彼得看来，这可能是完全失掉皮娅的第一步。他不信任罗伯托。只要皮娅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他又怎能保证能把女儿弄回来呢？彼得反对褒曼的正当要求。诉讼案于1952年7月开审，由一位名叫米尔德里·梯·莉莉的女法官审理此案。

判决完全取决于皮娅本人的意见。葛雷格森·鲍泽问了皮娅几个问题：

“去年夏天在英国你见到妈妈时，你对她说你爱她，惦念她，你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吗？”

“我不认为我说过我想念她。我——我想我说了。我们在一起呆了几天。妈妈问我：‘你高兴吗？’”

“你没说过你想念她而且愿意见她吗？”

“我认为我确实没说过。她没有这样问过我：‘你想我吗？’而我也从来没见过：‘是的，我想您。’即使她这样问我，我也很难说：‘不，我不爱你。’”

“你给你妈妈的信里说过你爱她吗？”

“信的末尾我总是写着‘爱你的皮娅’。”

“你这样写能代表你对她的感情吗？”

“不，这只是我写信结尾的方式。”

“林斯特罗姆小姐，你确实理解你母亲通过这次诉讼要达到什么目

的吗？”

“我明白，她要我去意大利看她。可是我不想去意大利。”“可是你一定要理解，你母亲不是要求你去同她一块生活。”

“去年夏天我们才见过面。”

“你理解到你母亲并不是请求法庭允许或者要你和她一起生活吗？”

“是的，我理解。”

“我现在这样理解，你在信尾写‘爱你的皮娅’，而实际上并不爱她，对吗？”

“我不爱我母亲。我喜欢她。”

“那你也不想她？”

“是的。”

“那你一点想见到她的愿望也没有？”

“是的，我更愿意同我父亲一起生活。”

“你很爱你的父亲，对吗？林斯特罗姆小姐。”“是的。”

“罗西里尼先生住在你家时，你见过他吗？”

“见过。”

“那时候同罗西里尼先生讲过话吗？”

“噢，他就住在我们家里，所以我想我同他说过话。可是我不记得我们说过什么了。”

“那时你认为他是个关心别人、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吗？”“我不记得了。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

“在你见到他的那些日子里，你没有注意到你讨厌他的地方吗？”

“啊，我不同他一块吃饭。我一个人吃，我睡觉比他早，所以我看到的事情不多。”

“那么在你见到他的日子里，你并不讨厌他吗？”“我不喜欢他，但也不讨厌他。”

“对于罗西里尼先生，你父亲常说过些什么，你都说过些什么？”

“我不记得我们谈论过什么。我们说话，他总是站在壁炉前对我们说，他对宗教是多么虔诚。他向我父亲借钱，然后给我买了礼物。”

法官莉莉插话问道：“你觉得你母亲现在对你不关心了，是吗？”

“我认为她对我不是很关心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她离开家远走的时候，似乎对我没有多大兴趣。她只是在离家出走，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突然又想要我。”葛雷格森·鲍泽接下去问道：

“林斯特罗姆小姐，先不说你现在是否很理解你母亲或者在将来是否有可能十分理解你母亲，现在你爱你母亲吗？”“不，不太爱。我的意思是说见她已经见够了，我已经见了她一面，但是我同她相处确实还没有达到爱她的程度。我父亲一直在关心我，我主要是同我父亲一起生活。”法官莉莉进行了总结，她对世界舆论注视这一案件表示遗憾，并认真地考虑了褒曼和彼得的意见。她认为褒曼和彼得都有错。

法官莉莉的判决是：“法院认为孩子和被告人之间应尽早言归于好。目前本院判决这个未成年孩子离开美国于1952年7月15日前去意大利

看望她的母亲是不符合孩子的利益的。因此被告提出带孩子去意大利探视她母亲的申请本院不予受理。”

分娩在即，又远隔重洋，褒曼无法反对法庭听审时提出来的证据。罗伯托非常生气，不只是把宣誓书寄去，还打算替褒曼出庭。

罗伯托申请了去美国的签证。但在案件结束以前，他是不可能赶到那里去的。赛尔兹尼克和许多别的朋友曾代他们家和罗伯托出庭作证。遗憾的是，法官拒绝罗伯托从意大利或从他的朋友那里寄宣誓书。10天里罗伯托光电话电报费就花了200万里拉。给法官拍电报就用了1000美元。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褒曼很希望为罗伯托生个女儿，因为罗伯托同他的前妻生了两个儿子，后又同褒曼生了个儿子。所以这次一定要个女孩，她已经给未来的女儿取了个名字，叫伊莎贝拉。

褒曼被推进了产房。女儿伊莎贝拉终于出生了，褒曼对医生说：“马上去告诉罗伯托，说他有了一个女儿了。”一会儿医生走进产房说：“告诉他了，他很高兴。”医生坐在褒曼旁边的一个小凳上说：“啊，现在我们还得迎候另一个小天使。”

医生们说：“又是女孩，伊莎贝拉的妹妹哭着找姐姐哩！”两个小女孩！多好啊！这个女孩的名字是罗伯托给起的，叫艾素塔·英格丽。可是从一开始他们都叫她英格丽。

听说皮娅那年夏天不能来意大利，褒曼心里很难过。她很惦念女儿，她感到思念的痛苦。可是来看褒曼的人们都对她说：“等待，耐心地等待。孩子会来的，孩子会回来的。”

褒曼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1952年的夏天，在此期间还拍了第一集短系列片《我们是女人》，它描述了女明星们的爱情生活和日常琐事。

8月里，皮娅寄来了一封祝贺生日的来信，说她绣了一条擦碟巾寄给褒曼。还说她很喜欢匹兹堡，尽管那里终日烟雾弥漫，那里的伙伴们也比贝弗利山的友好。

褒曼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她经常给朋友写信，可是她写得最多的，是给皮娅的信。

在1953年3月3日的信中她写道：

“我最亲爱的皮娅：我花了不少时间鼓起勇气给你复信。我是在痛苦中给你写信的，就像在痛苦中读你的来信一样……”

我曾经多次对你说过，收音机里、电视上、报纸上说些什么，我无法阻止。我可以拒绝记者采访我的隐私。我上次和你谈过之后，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可是既然我是影视圈里的人，那总会和大量的新闻媒体报道分不开。影片受欢迎与否，不仅在于影片本身的好坏，还在于宣传。因此我不能拒绝记者们除隐私以外的任何采访。直到现在情况也仍然是这样的。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电视上看到的都是胡说八道。从我离开你爸爸后，他总认为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要是你现在仍不相信我，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再重复我说过的话。

我将不再给你找麻烦了，皮娅。看来，我实在无法向你表白，我不想强迫你干任何事情。要是你年纪小些的话，我可能这样做。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了。你要求我别再管你。好吧，我将会这样做。我为了同你一起享

受母女之情，天伦之乐，已经奋斗了 4 年。我的要求并不高，不愿刺痛你爸爸，可是我没有成功。但是你是我的骨肉，我爱你就像爱我的每一个孩子一样。不像你所想的那样，一个孩子是不能取代另一个孩子的。我爱你。我的可爱的宝贝，我吻你的金色秀发，吻你那可爱的鼻子，从心田里爱你，我的那颗天下母亲都有的善良之心将永远和你在一起，即使你看不见我……”

第十二章 无悔无怨

A 人们指责罗伯托·罗西里尼，说他几乎毁了褒曼。而褒曼却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是她毁了罗伯托。罗伯托为了追求她，违反了一切常规，自己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婚姻之舟碰到了暗礁。

在同罗伯托相恋岁月里褒曼步入了中年。她说，他俩有着极为快活的时刻，但是两个人结成伴侣，目的是为了赚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彻底失败了。虽然赚钱并不是罗伯托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在一起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没有上座率。意大利的金色的油同瑞典的耀眼的雪水岂能混合？

褒曼的老朋友琼·雷诺阿挽救了她。在好莱坞时他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她常对雷诺阿说：“我们一定要合作拍片。什么时候能一起合作呢？”他总是很有分寸地说：“不行，英格丽，时机不成熟。对我说来，现在你太红了，不过我可以等待，等你名声下降一些我们再合作。好莱坞的演员都有类似经历，一会儿红得发紫，过后又每况愈下。现在你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你会暂时保持这种地位。不过我要等待，等待观众对你降温。那时我定会张开网在下面保护你的，到时候我一定拿着网接你。”

雷诺阿终于到圣玛丽奈拉来看望他们。他说：“英格丽，时间已经到来，我把网准备好了，希望你能来巴黎同我一块拍部片子。”

褒曼说：“这不行啊。罗伯托不让我同别人一块拍片子。”

他看了看褒曼又笑了。“我要同罗伯托谈谈，”他说。完全出褒曼的预料，罗伯托说：“这个主意太好了，你一定要同雷诺阿合作。”这就是褒曼去巴黎拍摄《海伦娜和男人们》的酝酿经过。罗伯托原先打算去印度拍一部影片，并作了长期安排。为此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因为雷诺阿是罗伯托所尊敬的世界少数几个导演之一，他对雷诺阿很放心。

在巴黎，雷诺阿任导演，他和梅尔·费勒、琼·马雷斯、珍妮德·格雷科一起合作拍片，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人们说这一年冬天是欧洲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可是孩子们同褒曼在一起，使这个冬天充满生机。《无奇不有的巴黎》一片演出时轰动了法国，评论家都很赞赏。可是在美国上映时，评论家却说这部片子简直是个灾难。

罗伯托的情况很不妙。他在意大利经济压力极大，拍片子困难重重，他和褒曼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这时他们的结合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褒曼在1956年1月19日深夜从巴黎写给在罗马的好友吉吉·乔西的信中诉说了她当时的心境：

我亲爱的吉吉，这是要求你在审判时作证的一封信。罗伯托刚刚动身去意大利，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他带走了我写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同意分居。只准许孩子们住在意大利，或者住在法国。他带走了孩子们的护照。正如我从前对你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是否在开玩笑？也许是真的。事情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当真。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害怕会发生什么，我想这回可能是真的发生了剧变。今天他对我说，如果不照他的要求写那封信，今天晚上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说，等我制片厂拍完《海伦娜和男人们》回来时，他们就已经走了当然我不信他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想即使没有火车票，他也会开着车把孩子们带走的。

于是我答应签字。如果需要的话，希望你把这一情况告诉罗西里尼的妈妈，正如我过去对他说过的那样，我不会同意签字的。罗伯托还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要制造出一件大丑闻来。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要制造什么丑闻。可是我得去制片厂，我没有更多时间来与他争辩这件事。

亲爱的，从你走了以后，我们安静地过了几天日子。然后他决定我们应该在星期天写这封信。我们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研究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的问题。整个星期天，我都在等着。可是他根本没提过这件事，最后我提议我们去看电影。令人奇怪的是，他和我一块去了。我不记得我们在此以前最后一次一同去看电影是在哪年哪月。就这样一天过去了。一周又过去了……他虽然有点烦躁不安的样子，可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谈论了各自感到苦恼的事情，我觉得要是我们能谈谈，也许会相互更加了解。可是，今天偏偏出了事。

晚上，我签完信件后还恳求他不要这样，我生气地哭了，我使出了我那痛苦的心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办法。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有时太易于激动。确实这样，我确实不会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他整理行李的时候，拒绝我的帮助。我拿出扑克牌来，也许他会和平日一样要玩玩，他也拒绝了。他躺在床上，我走近他，脸贴在他的胸部哭了起来，我失声痛哭。然而，此时我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幽默的天性，我竟大笑起来。感谢上帝，此时此刻，即使在最悲痛之际，我也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幽默的天性。我想是我的这种天赋的秉性在以后的岁月里拯救了我。我叫他临行前喝口杜松子酒，想开些，理智些，事情不要做的太绝，可是他充耳不闻。

早些时候，我在端详他的‘新费拉里’牌轿车。这是个庞然大物，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我对他说这简直像个飞碟，而且它也确实是个飞碟。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画了个十字，就像孩子们在睡觉之前我在他们额头上画十字那样。我敢肯定，罗伯托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当他驾驶着这庞然大物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疾驶时，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希望你保存这封信，也希望你能保存这个信封，邮票上的邮戳能说明这封信是今天写的，今天发出的。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我想这也可能是在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有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害怕再一次失去我的孩子，我不怕孤身一人，而是害怕我的4个亲生孩子被从我身边带走。

像往常一样，事情终于暂时平息了下来。

罗伯托应邀在巴黎大剧院导演一出话剧。接到邀请后他心情格外激动。这个剧的剧情是描写犹太人的。他从来没有在剧院导演过话剧。他开始研究剧本，认真地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方式。彩排时，男主角不喜欢罗伯托的处理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少的纠纷。一天，罗伯托脸色苍白地回到家说：“他们叫我走，他们要另请导演。”褒曼很为他难过。罗伯托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聘打击得心灰意懒。褒曼双手抱住他说：“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你肯定会有事可做的。”

巴黎大剧院匆匆辞退罗伯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问他是否可以导演《茶点与同情》。剧院经理问他：“你妻子愿意演这个剧吗？”褒曼替他回答说：“我这点法语水平是不可能演戏的。”可是剧院的波普斯库太太说：“听我说，我是从罗马尼亚来的，要是我能干，你也一定干得了。”她口音很重，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演出，大家却还喜欢她，尊敬她。

褒曼回到家中，阅读了英文本的剧本，觉得很喜欢它，当然心中也

疑虑重重。罗伯托过去从来没有导演过舞台剧。她想，一个意大利导演一位瑞典女演员用法语为巴黎观众演出一部美国戏，效果会怎样呢？后来情况还是有所变动，先演出《安娜斯塔西亚》。

褒曼的老朋友凯·布朗决心帮她重振精神，再返美国影坛。不久前凯·布朗曾把《安娜斯塔西亚》剧本带给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摄制权。安纳托尔·利特瓦克准备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他曾经宣布过他担任导演的条件：必须褒曼担任主演。

在好莱坞时，他们曾经晤面好几次。他想让褒曼演一个叫《蛇巢》的影片，可是她后来拒绝了。由奥里维亚·哈惠兰任主演，由于她卓越的演技，此片荣获奥斯卡金奖。安纳托尔不住地说：“瞧，你失掉了什么！”褒曼回答说：“我知道我丢了什么，剧情是关于疯人院的故事，我受不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角色，可是要是我主演，肯定得不了奥斯卡金奖。”她也谢绝了在《农家女》中主演一个乡音浓重的瑞典小姑娘的角色。后来洛雷塔·扬扮演了这个角色，也荣获了奥斯卡金奖。褒曼是瑞典人，又去扮演瑞典姑娘，她不愿意。拒绝扮演这两个角色，褒曼从来没有半点憾意。

在巴黎，褒曼有位朋友，叫伊莱恩·肯尼迪，她是位加拿大小姐，给褒曼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去雅典“广场旅馆”的酒吧间去见安纳托尔·利特瓦克，事情至关重要。

于是褒曼和安纳托尔坐在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商谈了《安娜斯塔西亚》一片的拍摄事宜。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要是我说服了别人，你是否愿意演？”“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里的“别人”认为褒曼是个扫帚星，无论他们要褒曼演什么片子，什么片子就一定要搁浅，就要被禁演，就要被逐出美国。这部影片准备在英国拍摄。这是个极好的角色，褒曼很有兴趣。福克斯公司对这件事讨论了很长时间。褒曼终于收到了他们同意并邀请她主演的电文。福克斯公司对她可说是孤注一掷。当然她必须告诉罗伯托，她不仅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而且还要在英国拍摄。

罗伯托不同意。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像往常一样，罗伯托威胁说要驾着“费拉里”牌汽车去撞树，过去他总是用自杀来威胁褒曼，他要去自杀，而她就会感到内疚。可是这次褒曼不想念他的威胁了，她决心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她说：“我们要为孩子们着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我们必须还债。我们必须重操我们已做出成就的旧业。”可是说服他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B 一个剧本引来的烦恼。罗伯托反复唠叨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剧本”。褒曼和他的婚姻似乎又到了尽头……

这是一个极好的角色，绝对不能放弃。褒曼扮演安娜·柴可夫斯基，一位神志不清，浑身湿透了的年轻女人，1920年的一天，她跳入柏林城的运河打算自杀时，被警察救了上来。可是安娜是谁呢？她是一位糊里糊涂的波兰农村姑娘呢？还是确实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族成员被杀后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小女儿安娜斯塔西亚呢？她是被两个红军战士救出后偷偷送到德国的吗？她手掌中的那块刺刀伤是那次可怕的大屠杀留下

的痕迹吗？

尤尔·布里纳尔扮演凶狠暴戾的上校伯恩乃因，他逼迫安娜冒充安娜斯塔西亚，因而提出要求继承大笔遗产。可是他逐渐意识到手中掌握的可能是皇室的女继承人。

这是部极好的片子，褒曼和大明星海伦·赫伊斯、大导演安纳托尔·利特瓦克一起通力合作。尤尔·布里纳尔这时刚步入影坛，他在《国王和我》一片中演得极为成功。他助人为乐，对别人关怀备至，是大家的好朋友。

在拍片期间，罗伯托只来看过褒曼一次。她想，很多人都意识到他俩的婚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安纳托尔同褒曼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有时他为褒曼练习对白时出现的迟钝而担心。有一次他说：“英格丽，你演得真好，如果你把对白都领会了，那将会演得更好。”有一天褒曼在她的活动木屋里读剧本，他从旁边经过。“了不起啊！你确实在研究对白了，”他说。褒曼不忍心告诉他，她当时是在揣摩法文版《茶点与同情》里的女主人公表演。

《安娜斯塔西亚》拍完后，褒曼回到了巴黎，知道罗伯托肯定要找麻烦。《茶点与同情》讲的是一个寄宿学校的小男孩，他担心自己得了同性恋的毛病。罗伯托从来对同性恋非常反感。每当褒曼想把罗勃蒂诺送到一所瑞士或英国寄宿学校就读时，他就大发雷霆。“什么！”他大声嚷道，“在那些寄宿学校里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因而罗勃蒂诺一直没有受过寄宿学校的教育。

褒曼定时向她的法语教师学习《茶点与同情》的对白，罗伯托也想读一下剧本。他坐了下来，很快就听见他咕哝地说：“奇怪！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一段，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懂，接着往下看。”

罗伯托不喜欢这个剧本的主题。剧中的一个情节是褒曼向这个男孩证明他不是同性恋者，并引导他进行性活动。整个情节使罗伯托感到非常厌恶。他看完剧本站起来，把剧本往房子对面墙上一扔，剧本一页页四处飞散了。

“这是我看过的最坏的剧本，你不能演。”

褒曼说：“我们俩人都已经签了字。”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已经签了不能随便毁约的合同。”

“我一生中还没有看过这样坏的剧本。描写同性恋……”

“很抱歉，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喜欢我的角色，我要演，而且几天后就要开始彩排。你应该在签字前先看看剧本。”

“你不要去演，我也不去。”

褒曼觉得如果是两三年前，她也许还可能当个百依百顺的意大利小媳妇，可是现在她不能这样，因为这牵涉到事业，她不能为此屈服。

“你可以不参加，”她说，“而我对于已经签字的协议是不会放弃和推脱的。我已经答应主演。另外，我十分喜欢这个剧本。”

“喜欢它？这个剧本曾受到巴黎戏剧界的嘲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

得停演。”

“好吧，那我就在巴黎演一个星期。有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在巴黎演出过，我只要演一个星期就行了。”

罗伯托无法使她屈服。他去找埃韦尔·波普斯库，说他不导演这个剧本，因为情节荒唐透顶。埃韦尔丝毫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色，只是简单地说：“好吧，很遗憾，你不来导演。我们只好另请高明了。”他们又找了琼·默科尔担任导演，于是他们开始排练。整个期间，罗伯托一直唠唠叨叨地说：“荒唐的剧本。你怎么去演这么个无聊的剧本。观众肯定会中场抗议退席。”

褒曼回答说：“他们可能中场退席，但我要尽力演好它。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她继续努力向她的老师学习法语对白。

开幕的那天晚上，罗伯托在化妆室里用意大利语没完没了地唠叨着。褒曼说：“罗伯托，你和我讲法语好吗？我就要用法语登台了。”他不同意。他说：“你演不长，要做好准备，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一半观众就会愤怒地退场。”

她没有回答。她像往常那样在他前额上画了个十字，表示“上帝保佑你，”她走向舞台一侧，和过去一样，心里多少有点出场前的不安，可是一切非常顺利。

褒曼回去换装时，罗伯托还在那里。

“有多少人退场？”

“我不知道谁退场了。我在全力以赴地表演，顾不上别的小事。”

“等到休息时再看。”

休息时间到了，没有人退场，更没有人愤怒。

在演最后一幕时，褒曼看见罗伯托一个人悄悄站在舞台边侧。演出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院。褒曼只记得在纽约演出《洛桑来的圣女贞德》时也曾博得过这样热烈的掌声。她想以后再也得不到那样的欢迎了，可是这次却和上次完全一样，整个剧院疯狂了，简直无法不让观众鼓掌喝彩。他们站起来大声叫好，热烈鼓掌，“好啊，妙啊”地叫个不停。然后褒曼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向观众鞠躬谢幕。她低头鞠躬时，斜眼看了一下罗伯托。他们四目相遇，彼此直溜溜地对视瞬间。她知道尽管他们还可能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婚姻到了尽头。

那天晚上，褒曼不得不同罗伯托以及他的意大利朋友们去出席一个晚会。他们都玩得很尽兴。没有人谈起那个剧目，也没有人说他们演出成功了。第二天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收拾衣箱，褒曼去火车站送他。她记得罗伯托的衣箱里装满了意大利细条实心面。他们沉默地立在人声嘈杂、烟雾弥漫之中。褒曼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段爱情插曲即将结束，以后的生活将和今天完全不同了。

《茶点与同情》在巴黎大剧院演出，盛况空前。每天晚上剧院的1200个座位都坐满了热情的观众。“奇迹于昨晚又回到了巴黎剧院。”一位评论家说。所有的评论都在颂扬这个戏，甚至有时褒曼在对白中说错了话，他们竟误以为这是故意让观众寻开心的合理安排。

C 影片《安娜斯塔西娅》在演出《茶点与同情》期间放映，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

这部影片在她的演员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都是个分水岭。有两个最重大的问题需要她妥

善解决：一个是与罗伯托的婚姻裂缝；另一个是关于女儿皮娅……

博斯莱·克劳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褒曼小姐的表演无懈可击，表现得活龙活现，值得授予学院奖。”奥尔顿·库克在《纽约世界电讯》中写道：“褒曼小姐依然感情充沛，热情洋溢，和7年前离开美国时完全一样。”凯特·卡梅伦在《每日新闻》中写道：“如果好莱坞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投入拍制《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影片，那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电影业的前途忧心忡忡了。”

1956年秋天，几乎没有争论，纽约的评论家就把当年最佳女演员奖授予了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要她回纽约领取纽约评论家奖。他们曾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次又想和她继续拍制影片，可是他们又想让褒曼回美国后先试演一下，看看美国公众是厌恶，还是继续喜欢她。他们要了《茶点与同情》的全部门票，星期六晚上一场，星期日两场。

此外，埃德·沙利文（他是星期日夜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电视节目中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测试美国观众对褒曼是喜欢还是厌恶。

1956年7月，沙利文对他的电视观众说，他刚从伦敦的制片厂回来，那里正在拍摄《安娜斯塔西亚》，而且对海伦·赫伊斯、尤尔·布里纳尔和“那位瑞典大影星”英格丽·褒曼进行了电视报道。他还说他听到谣传说，褒曼小姐拍完《安娜斯塔西亚》后可能重返美国。埃德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接着他说想请观众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让他在电视节目中播放对这位有争议的人物的访问。

埃德·沙利文给褒曼发去了电报说，到现在为止收到的来信中，大约有1500封信反对她访美，有2500封信说愿意让她登台与观众见面。

当然褒曼是不会在沙利文的节目中露面的。对于访问美国是否合适，她一直十分怀疑，尤其是罗伯托及其兄弟伦佐在竭力反对。罗伯托仇恨美国的心理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这时在印度，伦佐就给褒曼写了一封信，说她若访问美国就是违反诺言。可是褒曼从未说过她不再去美国。从这几年寄到意大利的大批信件中，她知道有数量惊人的观众愿意她回美国去，他们是爱她的。现在美国在召唤她，她对她的追随者和影迷们的热情不能无动于衷。

褒曼知道在纽约肯定要见美国新闻界，他们要问的问题会是令人不愉快的。尤尔·布里拉尔听到褒曼要去美国的消息后，在巴黎打电话对她说：“你要随身带点镇静剂。”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带镇静药，她也真的吃了一片镇静药。最使她受感动的是莱奥纳德·莱昂斯，那位美国专栏作家。他虽然和褒曼不很熟，可是对她一直很友好。他给褒曼打电话说：“英格丽，我在下边，就在你的旅馆的酒吧间里，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你的虔诚的崇拜者，谁要是故意同你为难，他就要打断他的鼻梁。这个人就是大作家海明威老先生。我们可以上楼吗？”

他们上了楼，他们拥抱接吻。海明威从眼镜上方看着褒曼，严肃地说：“姑娘，我要和你一块去纽约，我会保护你的，不会有什么麻烦。明天早晨我可以和你一起登机，我将守护在你身边。如果有哪个记者向你提出污辱性的问题，我就把他打翻在地。只要我在那里，没有人会给

你惹麻烦的。”

褒曼说：“您的心肠太好了，海明威先生，可是我必须孤身一人前去。如果我要带着个秘书，一位公关先生，一个朋友，或一名大夫，还有我同您，浩浩荡荡一大群人，他们就会说：‘瞧，她还带着一帮打手。她害怕了。’是的，我是害怕，可是我必须一个人去，让他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回去的唯一的办法，孤身一人回到美国去。”

D 重返美国。1957年1月20日，星期日早晨8点刚过，一架巨型飞机划破铅灰色的天空，降到了美国艾德威尔德机场的跑道上。她忧心忡忡地凝视着飞机窗口外面迎着刺骨的寒风等候她的人群。他们裹在厚厚的大衣里，眼睛望着飞机……

在机场上，记者们向褒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次回来你是否要长期住在美国？”她说：“我是欧洲人。我丈夫是欧洲人。我手提包里装的是意大利护照。我的孩子是欧洲人。我为什么要使他们离开欧洲呢？”他们开始追问罗伯托同她不和的传说。“你和罗西里尼愉快吗？”褒曼说：“每逢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已经分居了，先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她接着说：“他已在印度拍一部影片，而我在巴黎。”接着他们谈到了她的女儿皮娅，问褒曼是否准备见女儿。她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无法确定，她回避说：“我不知道，因为来去匆匆，可能见不着。星期一晚上有演出，我必须赶回巴黎。当我和皮娅再相见时，我希望只有我们俩人在一起安静地会面。多年不见，只和她相处短短几分钟，那会使我很痛苦。”这确实是真的，可是褒曼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机场上，影迷们的盛情欢迎，深深打动了褒曼。她原以为，他们一定会问她离谱的、令她难堪的问题，她必须面对愤怒讥笑的喝倒彩的人群，而不是她的这些忠诚的支持者。

褒曼离开机场前往纽约艾琳·赛尔兹尼克的公寓。在那里她看到了多年来从未看过的第一份美国报纸。从报上知道席各妮·海苏的儿子死于车祸。这消息使褒曼很震动。她同席各妮曾经一块在戏剧学校学习，在瑞典，席各妮经常在舞台上演出。后来她和一家大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也来了好莱坞。那段时间她们经常在一起。彼得和席各妮也成了好朋友。

多年来，席各妮为儿子治病操碎了心，她找了很多医生，跑了很多医院，把所有的钱和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现在她在纽约演出，她的儿子是一个只有21岁的漂亮小伙子，完全康复了，他第一次和一家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驾车在公路上行驶，出了事故，丧了命。

褒曼急于找到席各妮。在一位瑞典女演员维薇卡的帮助下，总算拨通了席各妮的电话。

席各妮接过了话筒，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英格丽，听到你的声音，太高兴了。你是来纽约领奖的吧！真替你高兴。你回美国真太好了。我知道，今天晚上‘萨迪’饭店举办大型晚会，已经邀请了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参加听到你说话，太高兴……”她不停地说了下去……

褒曼想，她的脑子也许出了毛病。她说：“等一等，报纸上说你的

孩子出了车祸，是吗？”

“是啊，难道不可怕吗？他死了。我真为那个驾车的孩子难过，他是我孩子最好的朋友。他没有死。我已经请他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照料他，他一定吓得要死……”

“可是你不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吗？”

“我还去干什么呀？我孩子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帮助那个孩子，叫他到我这里来。”

“你准备留在纽约？”

“是啊，再过几小时我要去剧院。”

褒曼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今天晚上你还能演戏吗？你当真要演出吗？”

她非常平静地说：“是啊，英格丽，今天晚上我必须演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褒曼哭了起来。同席各妮的这段对话多年一直萦绕她的心头。

褒曼知道必须给皮娅打电话，女儿知道她要回来。褒曼曾写信告诉女儿说，过了这么多年能再见到她该是多么高兴。她也曾经请艾琳和凯·布朗转告女儿。

现在褒曼知道这次她不能见皮娅了。没完没了的活动——机场上记者的即兴访问，会见阿尔文邦，同席各妮·海苏谈话，领评论家奖，同史蒂夫·艾伦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从“萨迪”饭店转播的特别节目）。她一想到那些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入，等着看她见到女儿皮娅时伤心落泪，悲痛欲绝的场面，她就无法忍受。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感情的极度爆发。褒曼给皮娅打了电话，把想法告诉了女儿。她竭力向女儿说清楚，她实在不知道怎样安排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望女儿。她尽力向女儿解释她无法控制感情，她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垮下去，而不能再做别的事情。褒曼说也许她应该这样做。她是鼓足了勇气才来美国的，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可怜的皮娅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认为褒曼不想见她。她认为母亲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为重要，认为褒曼想做的不过是会会老朋友和在电视上露露面。于是皮娅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又都拿了出来，上课去了。新闻记者打电话给她，她对他们说她功课很忙，无法脱身，因为她不想拉下功课。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

对皮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创伤，在她的心里一直积存了多年。

6个月后，1957年7月8日，渴望已久的会面终于实现了。彼得·林斯特罗姆博士已经再婚，他和妻子艾格尼丝、他们的小儿子彼得来斯德哥尔摩游览。皮娅也一同来了。这时她已经18岁了，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皮娅给母亲打了电话，约好在巴黎见面。

分别长达6年后，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会面。褒曼料定她和皮娅都会激动得泪流不止，但她不愿意让摄影记者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她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说明了上述情况，请他们予以协助。他们同情地说：“我们让你先呆在飞机上，等乘客都走下之后，你们母女可以留在飞机上单独相见。”

于是，褒曼登上了飞机，女儿皮娅等在那里，她们拥抱在一起，可是闪光灯立即曝了光。

《巴黎竞赛画报》曾经派了一名摄影记者，从纽约就跟随皮娅，以便拍下这张久别重逢的照片。当他发现皮娅留在飞机上时，他就藏在飞机上，趴在椅子下面。拍完照后，机组人员才把他叫了下去。皮娅惊奇地看着褒曼说：“你看起来多么年轻。”

她们在一起呆了12分钟，然后走到舷梯上，面对成群结队的摄影记者亲切地拥抱和微笑着。

“分别6年后的重逢，我们都很高兴。我真不知道我们一起在巴黎要干些什么。”这是褒曼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为了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她们不得不从旅馆的后门偷偷地溜出去坐车游览全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在皮娅逗留的日子里，她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包围上来。皮娅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褒曼带她去看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她们游览了西西里岛，皮娅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孩子们都在那里聚会，格外亲切。

皮娅回美国后，褒曼带着孩子们飞返巴黎。生活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因为罗伯托远在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工作9个月，现在需要褒曼自己下决心了。

她记得第一次拿到演出《茶点与同情》的工资支票的情形。从她16岁充当临时演员领取了10克朗工资以来，大把的钱没有在她手上停留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演员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协助理财，他在银行里给褒曼开了户头。这样工资和各项收入可以及时存入银行。

不久，褒曼听说她在法国的收入必须纳税。她不知道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意大利有罗伯托处理一切，她无须插手。后来有人告诉她，对于她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在法国开立银行户头是不合法的。他们还说，每张支票都将遭到扣留，并从中剔除税金。她应早些去税务局申报纳税单。她把律师找了来对他说：“这些情况你都没对我说过。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都花费了哪几方面的钱？”他问道。

“我已经付了旅馆费，3个孩子的生活及保姆的费用和工资。要是税务局要我缴纳很多钱，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噢，那很好办。你说你供养了一位情夫，钱都这样花了。”

“养个情夫？我还为他付账！”

“对。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这不奇怪，是很正常的事情。收税人懂得这一点，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

“别担心，等他们来找你时，我们再商量对策。”

于是褒曼没有再理这件事，只等着税务人员来找她，可是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给律师打电话说：“什么事也没有。”

“噢，好啊，如果10年以内不找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不喜欢……”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办吧。”

第九个年头，税务人员终于来找褒曼了。这时她已经又结婚了。税务人员找她要了一大笔钱。这都是那位律师的坏主意造成的后果。从此以后，她尽量不同律师打交道。

凯·布朗给褒曼来电话，说了《茶点与同情》的作者罗伯特·安德森的情况。他的妻子因患癌症刚刚去世，他的妻子长期病魔缠身，他每天都在照顾她，病情每况愈下，他一直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人世。凯说：“这简直毁灭了他，他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去帮帮他，开导开导他吧。我致电请他立即飞往巴黎，参加首映式夜场，也许他会鼓起勇气活下去的。”

安德森经历了穿越大西洋的一次可怕的飞行，飞机被迫返航。迟迟到达巴黎的他却赶上了首演式。

褒曼和安德森成了好朋友。很快褒曼看出他是个不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男人。褒曼尽力帮助他，使他心情逐渐愉快起来。那些日子里，安德森和褒曼关系极为密切，也许褒曼也需要这样做。她知道，对他们俩人来说，住在一起可能都很必要。

几乎在同时，褒曼第一次遇到了拉斯·施密特，他也是瑞典人。他演出过很多剧目。他正在巴黎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拉斯·施密特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相见的情景：

“1956年我说服彼得·布鲁克从伦敦来巴黎导演《热铅皮屋顶上的猫》。我们的演员阵容整齐，演出极为成功。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正在演出罗伯特·安德森的《茶点与同情》的英格丽·褒曼来看我们演出。演出前我以主人的身份会见了她。‘请您和罗伯特休息时来喝杯香槟好吗？’‘太好了，谢谢您。’她说时脸上露出了令人销魂的微笑，然后去找他们的座位。”

“休息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同我在一起，他是个高大魁梧的漂亮的瑞典人，名字叫古斯塔夫，他过去见过英格丽。英格丽同古斯塔夫谈了起来。我忙着给他们送香槟酒，看看是不是每人都倒上了酒。我同褒曼小姐离得很近。她长得很美，人很谦虚。”

“又过了几个星期，凯·布朗小姐来到了巴黎。凯是英格丽的代理人，她也是我的美国代理人。‘多好玩啊，’她说，‘两个瑞典人都住在巴黎，竟然互不相识，你们俩人甚至还住在一个旅馆里。我来安排这件事。’”

“这样我们就互相认识了。我请英格丽去吃饭。我们去了一家名叫‘金色白兰地’的小饭馆。英格丽坐在那里看着我：‘阴差阳错，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真有意思！’”

“‘可是我们过去见过面。’”

“‘见过面？在哪里？’”

“‘你来看过我演的剧《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噢，是你演的？可是我没看见你。’”

“‘你看见了。休息时你喝过香槟。我给你倒的。’”

“‘你倒的！哎呀，天啊，我以为你是男招待呢！’”

“那天傍晚我们吃饭时还谈到了瑞典。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个星期过去后，我像往常那样到处奔走。尽管我们还住在一个旅馆里，她很忙，我也很忙，我们没有再见面。

“一天，我回到旅馆，在早晨给她打了个电话：‘您能和我一起用早餐吗？’”

“ ‘对不起，我需要照料孩子。’ ”

“当然，我能理解，于是我和另一位朋友去吃午饭。我们驾车驶向位于布龙涅森林的洁净舒适的小饭店。我看到在靠近景色迷人的湖畔的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褒曼小姐。吃完饭后，我走近她用瑞典语说：‘褒曼小姐，您就是这样照料您的孩子吗？’她正同罗伯特·安德森在一起。”

“她抬头看了看我，脸红起来。我从来没看到过像她那样容易脸红的人。然后她看看我，神秘地笑了笑。那天夜晚我又给她打了电话，终于气氛活跃了起来。”

E 她因主演《安娜斯塔西亚》而荣获奥斯卡金奖。爱情是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新丈夫竟和印度女人私奔。她寻求印度尼赫鲁总理的帮助。分手的吻……

褒曼的好朋友卡里·格兰特曾经答应她，要是她得了“学院奖”，她就去领奖。褒曼演完了《茶点与同情》的夜场后，在“雷菲尔”饭店里按往常的时间上床睡觉。早晨7点钟电话铃把她惊醒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宣传人员在电话里大声说：“祝贺你，你获奖了，你获奖了！”

褒曼洗完澡，自己喝了杯香槟酒表示庆祝。小罗勃蒂诺拿着收音机说：“妈妈，他们说你呢！”他不怎么懂英语，可是听出了她的名字。法国广播中不断播放着奥斯卡金奖发奖仪式。罗勃蒂诺听到宣布“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和鼓掌声。他把收音机放在洗澡间的地板上，褒曼能听见扬声器里发出的鼓掌声。接着卡里开始讲话：“亲爱的英格丽，不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褒曼说道：“我在澡盆里！”“不论你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们，你的朋友们，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由于杰出的表演艺术而获奖，我在这里代你领奖，我们在为你高兴，也祝你和我们一样高兴。”可怜的小罗勃蒂诺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洗着澡却哭了起来。

接着同罗伯托又开始了新的纠纷。褒曼从来没想到过和他离婚，即使下地狱，她也愿意和罗伯托一起去，为了嫁给他，她经历了多少苦难，凌辱……

另外，褒曼不能离开他，也因为她觉得罗伯托在事业上的失意，有一部分是由于她的原因。如果离开他，褒曼会觉得对不起他。归根结蒂，褒曼觉得是自己主动迈出第一步的。是她写信给罗伯托，要罗伯托来和她拍一部电影，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此引起的。褒曼以为当他从印度回来后，他们还会言归于好，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下去。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似乎还不可能，因为她已经同意参与美国影片的制作了。

195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电话铃响了起来。“罗伯托，你在哪里打来电话？……是从印度吗？一切都好吗？”“噢，很好，很好，近来报纸上不断谈论说我有女人。如果报界人士打电话向你询问我的事，你要加以否认，说那是无稽之谈，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了。”

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挂上了电话。

关于罗伯托和褒曼的生活有人曾这样写过：虽然褒曼可能时时刻刻受着清教徒的良心折磨，但她认为和罗伯托相处可能比大多数人的境遇要好。褒曼觉得这是真的。和罗伯托在一起，既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也为她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她认为，烦恼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烦恼，总是一帆风顺，这个人一定是个不为人们喜欢的俗子凡夫。

为了和罗伯托共同生活，褒曼曾有过许多设想。当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困难时，她曾经对罗伯托说：“喂，让咱们宣布破产吧，宣布破产是有例可循的，是不是？破产以后又会怎样？我们还不至于去坐牢吧？让我们根据现有的物质条件生活吧，租一套小公寓房，我来打扫卫生，拖地板、做饭。我们也不必雇佣人。”罗伯托紧盯着她，觉得她好像发了疯。“那样的日子不值一过。”他说。“那样的生活不值一过！生活就一定要生活得像个样子。”这是罗伯托的生活逻辑。

褒曼放下话筒，坐到床上，心里在思考着这些事，不知怎样做才好，因为她知道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她知道罗伯托给她打电话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一定另有新欢了。他又陷入了情网。肯定她一定很爱他。现在她一定在照料他，使他过得愉快。

罗伯托已经离她而去。她坐在床上，她感觉到自己的笑声变得越来越高，似乎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耳际。她是那样高兴，为了他，也为了自己。现在该是他们冷静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电话铃声又在半夜里响了起来，又是罗伯托。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有钱的制片商，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防范措施。他不仅不让罗伯托再当导演，而且扣押了已拍好的影片。这样，罗伯托无法把影片带出印度。罗伯托说：“一切都过去了，简直是愚蠢，说我爱上了这个女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惟一能够帮助我解决影片问题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他现在正在伦敦访问。你在伦敦认识很多人，能不能找找他，看看他是否能帮忙，让我把影片带出印度呢？”

“我试试吧。”褒曼说，“我只能试一试。”

第二天早晨，褒曼给伦敦的好友安·托德打了电话说：“你和各界人士都有交往，我想见见尼赫鲁，请他让罗伯托把影片带出印度，你看行不行？”安说：“好吧，我认识尼赫鲁的妹妹，她也在伦敦，我给她打个电话。”

安给她回电话说：“明天速从巴黎坐飞机来，午饭前到达我家。”这样，尼赫鲁的妹妹、褒曼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就在一块用午餐了。褒曼想，尼赫鲁对她在这里出现一定感到奇怪，可是午饭后在花园里散步时，褒曼发现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褒曼说：“我丈夫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您的国家里遇到了点麻烦。”

“我听说了，”他非常平静地说，又往前踱步。一会儿，他说：“我想他迟早会被允许离境的。”

“可是，他不能不带拍好的影片离开印度，”褒曼说，“影片就是他的生命。”他们并肩散步，边走边谈。

“嗯，我听说发生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事情和丑闻，还和金钱纠纷联系在一起，听说问题很复杂。”

褒曼说：“是啊，是这样的。他总是出问题。可他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总是会出问题的。如果能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印度，那就太感激您了。”

“是啊，是啊，问题终究会解决的。”

可是褒曼不想就此作罢，一定要请这位一国之君为他开绿灯。她说：“瑞典有句谚语，‘草刚发芽，牛就要挨饿’，您不要让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太长。他是个大好人，您不能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他拍了影片，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好吗？”

他们继续散步，可是，尼赫鲁只是笑笑，点点头，什么也没再说。

就在第二天，罗伯托终于得到允许带影片离境。他立刻登上了飞机返回法国。

人们对褒曼的行动感到奇怪，因为这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罗伯托怎样被逐、怎样热衷于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怎样和她私奔。

褒曼想，人人都会做错事，会做荒唐事，应该客观地权衡一下他们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罗伯托带着自己拍好的影片回来了，影片可能很有价值，对了解文明古国印度很有艺术借鉴，也许影片拍得不成功，得冒点风险。罗伯托也许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又怎样呢？她觉得那并不重要。他是个人才，甚至是个天才。这是谁也无法夺走的，而人才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

罗伯托回到巴黎时，褒曼去机场接他。这使围着她转的记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吵吵嚷嚷地说：“褒曼小姐，听说你丈夫同一位印度女人私奔了，是吗？”“你丈夫不是同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私奔了吗？褒曼小姐？”褒曼说：“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我是来接他的。”

罗伯托下飞机后，褒曼竟扑在他的怀里，罗伯托紧紧地搂着她，他们吻了又吻。这样的照片登载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还加了以下文字说明：“那些谣言是多么可笑，看英格丽·褒曼迎接罗西里尼，他们在热情拥抱。”

没有允许新闻记者随他俩回“雷菲尔”饭店。回到褒曼房里后，罗伯托坐在扶手椅里，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他们分别后，已经逝去了漫长的9个月。他说：“你在上演那出戏吗？”

“是啊，我当然要演。卖座率仍然居高不下，且每场座无虚席。如果今晚你想看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张票。”

“不去，我想，我还是不去为好。”

褒曼去剧院演出后回到了饭店。这段时间罗伯托也可能曾经出去过。可是，褒曼回来时，他还坐在扶手椅里用手捻着头发。褒曼心想，现在可能是俩人心平气和谈谈的最好时机。

褒曼没有直接对他说，她已经见过同他私奔的那位印度女人索娜丽了。她在罗伯托到达的前几天来到巴黎。褒曼并不想见她，可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褒曼说：“她从印度来了，想见见你。”于是褒曼说：“我立刻就过来。”

褒曼觉得她长得漂亮，人很和蔼，可是满面愁容。她怀里抱着个婴儿。褒曼想，噢，天啊，这怎么可能？这可能吗？罗伯托走了多久？九个月，当然，这不可能，这个小孩有好几个月了。

褒曼和索娜丽谈了起来。这个孩子是她和她的印度丈夫最小的儿

子。她把大儿子留在印度，同她丈夫在一起。“报纸太可怕了，”她说，“他们散布了大量隐私，说了很多谎话。”

褒曼说她已经和报纸上的谎言打过多次交道了。索娜丽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见见褒曼。这时褒曼想的是，可怜的女人，多么奇怪，又多么相似，这女人和她一样，也把一个孩子留给了丈夫。

现在褒曼和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她心平气和地说：“罗伯托，你愿意离婚吗？”罗伯托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依然抚弄着头发，望着房顶上的电灯，一言不发。褒曼以为也许罗伯托没听清她说的话，于是又非常平静地说了一遍：“罗伯托，要是我们离婚，你觉得好吗？”

还是一言不发。他的两只眼睛仍然望着电灯。褒曼不想再说第三次了，只有等待。她等了又等，好像要无休无止地等待下去。他满面凄清，仍不停地摆弄头发。最后，他终于慢条斯理地说：“是啊，我已经厌倦称当褒曼先生这个角色了。”

对他这种说法褒曼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向大名在外，一向是傲慢自信的罗伯托·罗西里尼先生，从来不是褒曼先生。

“是啊，我的感觉如此，我厌倦了。”

她说：“好吧，我懂了。我们离婚吧！”

他们终于解决了纠缠了多年的难题，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还拥抱亲吻。然后褒曼对他说，她见过索娜丽了，祝她幸福。

他说：“你可以领养孩子们，他们属于母亲，不过我有两件事请你答应。”

“好吧，什么事？”

“孩子们永远不回美国。”他非常憎恨美国和霍华德·休斯，所以不让他们再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

“永远不去美国！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呢？我们可以叫他们接受欧洲型的教育——瑞典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英国式的……可是，等他们18岁时，我们就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了，其中也包括美国，要是他们想去的话。”

“好吧，好吧。到18岁再说。”

“第二件事呢？”“你永远不要再结婚了。”

“我应当永远不再结婚？”

“对了，按照你现在的年龄，不要再结婚了。”“我现在的年龄！你几乎比我大十岁。你出去时带着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人。你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就不应该找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吗？你没权利阻止我，让我不结婚。”“你应当照料孩子。你有3个孩子，加上皮娅是4个。我是说，你还想要什么呢？”

“这件事我不答应。”褒曼说罢大笑起来。她觉得荒唐可笑，她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第十三章 第三次姻缘

A “你在祈祷吗？”她问拉斯。

“是的，我向上帝祈祷你将成为我的心上人。”

她笑了笑说：“你怎么这样干呢？我已经结了婚了。”

拉斯对她笑了笑说：“嗯，我可以永远祈祷，不是吗？”

……

这是在巴黎的一个星期天，褒曼和拉斯去莫特里山，他们走进了圣心教堂，每个人点燃了一支蜡烛，拉斯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他们终于有了上述的对话。

是不是该和拉斯结婚，起初褒曼下不了决心，她觉得也许罗伯托说得对，她已经结了两次婚，有过4个孩子，也许这就够了。

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都同褒曼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安排，罗伯托似乎颇感高兴，因为他并不知道拉斯在悄悄地追求褒曼。罗伯托认为她在巴黎潜心地演《茶点与同情》，然后再演出《轻举妄动》，接下去她正要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六福客栈》。他认为褒曼除了照料孩子之外，每天晚上一个人呆在家里。他万万没有想到又一个男人已经潜入了她的生活。褒曼的意大利律师格雷兹德到巴黎后，她问律师：“离婚要用多长时间？”他说：“你还能等3个月吗？”“当然能等3个月。”她说。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要比3个月长得多。

他们开始在平和气氛中分居着，一点纠纷也没发生，只是向律师作了申述。褒曼的法国律师罗尼·福洛里阿特问他们：“你们确实想离婚？而且下了决心这样做吗？”褒曼说：“确实如此。”律师说：“你们二人都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好吧，现在要考虑的是孩子的监护问题，法国法院肯定会把监护权判给母亲，条件是允许父亲同孩子们定期正常会晤。”律师又一次从法律角度予以解释。

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求废除墨西哥的代理人婚约。按罗马的法律是完全可以的，是合法的，而且立即就可以废除。

圣诞节那天，罗伯托、褒曼、还有孩子们都在布仑诺·博兹公寓里团聚。他们过得很快活。聚在外面的记者说：“你们已经分居，怎么还在一起过圣诞节呢？”褒曼说：“当然应该在一起过圣诞节，为什么要让孩子们感到痛苦呢？我们在一起举办了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晚会。1月份，我就要去英国拍片子了。”

这件事褒曼记得非常清楚。罗伯托把头靠在她的大腿上。她大声笑着。“天啊！人们都在下边的大街上，应该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一定会成为这个星期的新闻特写。”

他们俩人都喝了“格劳格”——这是一种瑞典饮料，一半是温和的红酒，一半是荷兰杜松子酒，里面再加上果料、葡萄干和橘皮。这种酒相当有后劲。褒曼送了一瓶给光临的记者们喝。

“我觉得太对不起你们了，”她说，“在这滴水成冰的时候，你们在下面等着，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真是太辛苦了。请你们喝点酒，暖暖身子，喝完之后就回家吧，我们不外出了。”摄影记者走了后，罗伯托回到了他的寓所。

记者们当然无法弄清他们的行动，在婚姻破裂明朗化以前，他们一直采用了这种办法对付记者。

拉斯·施密特出生在哥德堡的一个世袭军人的殷实家庭，可是，拉斯却爱好戏剧。少年时代，他被送到威尔士的斯旺西，使他熟悉航海专业。在当地的酒吧间里，他结识了很多矿工。在矿工们的怂恿下，他到井下干了几个月的活。伦敦的诱惑，剧院的舞台灯光，终于使他离开了矿井。

他的戏剧生活一帆风顺。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伦敦的戏剧业基本瘫痪了。

由于瑞典是中立国，他想去纽约，那里戏剧界颇为繁荣兴旺。可是40年代初，没有飞越大西洋的民航班机，乘船又十分危险，因为纳粹德国的潜水艇不断袭击商船。拉斯想方设法搭上了一艘芬兰小火轮，接近法罗群岛的时候，德军轰炸机突然从低矮的云层中俯冲投弹。拉斯跌跌撞撞去拿自己的钱和护照时，轰隆一声，一颗炸弹落在船上，把拉斯隔壁的船舱炸沉了。小火轮燃烧的烟火引来了瑞典船只，人们马上进行营救，救起了近一半船员和旅客，然后就开走了。稍后，又来了一艘英国船，救起了拉斯和其他乘客，并把他们安置在法罗群岛上。他在岛上艰难地度过了8个星期，然后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地来到了纽约。到纽约后，他决心从事戏剧工作，他干过布景管理员，换布景员，杂役，助理的助手等工作。他导演了第一部美国话剧《砒霜与旧花边》，并买下了在外国的演出权。

他继续创作和导演话剧，在纽约、伦敦、巴黎以及欧洲各地开设了事务所。

拉斯的经历与褒曼的非常像，他出生在瑞典，受的是瑞典教育，侨居他国后，一直讲侨居国语言。这使得他们俩人更加接近。他们互相了解，心心相印，许多事甚至不需要用语言表达：褒曼知道拉斯在什么时候不喜欢做什么，不喜欢谈论什么。他们只要相互对上一眼，就彼此心领神会。拉斯也非常理解她，能十分准确地知道她的反应，知道什么事情会使她生气，她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她不高兴等等。他们深有所感：“爱”和“恨”都能使人坠入情海而难以自拔……

对拉斯来说，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如果褒曼坚持要去圣特罗佩、卡普里岛或蒙特卡罗去消暑，那他们的婚姻就会立即告吹。如果她喜欢拉斯的丹霍门小岛，他们就会结合。于是在瑞典的一个冬天，他们一起去看这个小岛。它离瑞典西海岸几英里远，隐设在星罗棋布的大岩石群岛之中。他和他的朋友埃森几年前就来过丹霍门，并且迷上了这个小岛。他曾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希望下次再见到这个小岛时，它是我的。”他对感到惊讶的小岛主人说：“你什么时候想卖，请告诉我。”10年后，也就是他刚认识褒曼的时候，他买下了这个小岛的全部地产。

一条吨位较大的渔船冲碎了冰凌，把他们送上了小岛。褒曼喜欢这次旅行，更喜欢这个小岛。岛上寂静无人，一望无垠的蓝天，汹涌澎湃的大海，岛上到处都是一个个巨大的圆石和小港湾。在夏天，海水、岩石和天空都在闪烁发光。使人有远离尘世的感觉。

多么像原始的大自然啊！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电灯电话。要

自己汲淡水，自己生火，自己捕鱼。离尘世是多么远啊！她能理解拉斯为什么爱上它。

第一次来这个小岛时，他们坐在屋子旁边的圆石上，褒曼说：“我喜欢你的小岛。”拉斯说：“好，让我们结婚吧。”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可实际上却并不如此。

与此同时，她还要重新学习和体验传教士的生活。

B 在台湾拍摄《六福客栈》碰壁的回亿令人百感交集。1958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买下了作家伯吉斯先生的《小妇人》剧本的摄制电影权，并定名为《六福客栈》。

加拿大出生的导演马克·罗伯逊负责摄制影片《六福客栈》。他对执行导演巴迪·艾德勒说，褒曼是扮演格拉迪斯·艾尔沃德这一角色的惟一合适人选。艾尔沃德原来是伦敦的一位女佣人，1930年到了中国华北的僻乡当传教士。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她带着100多名中国儿童越过了陕西山区抵达了安全地带。

巴迪·艾德勒说他认为马克可能聘请不到褒曼。马克立即乘飞机来到巴黎，径直奔向“雷菲尔”饭店褒曼的房间，他一走进房间，就看到一本《小妇人》。这是他让“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伦敦办事处送给褒曼的。她喜欢这个角色，表示愿意签订拍片合同。

影片开始拍摄时，褒曼给格拉迪斯·艾尔沃德写了一封信。这时，艾尔沃德正住在台湾，计划用她的稿费和收入再创办一所中国孤儿院。

1958年春，马克·罗伯逊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技术人员去台湾拍摄外景和争取格拉迪斯·艾尔沃德的帮助。一位热心的助理导演请她找她的朋友制作演出用的帽子和服装，他们也将被聘请为临时演员。

后来，流亡到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当局要审查《六福客栈》的剧本。审查后，他们气愤地指出，贫穷落后，剥削和不平等在国民党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在共产党来到之前，到处只有光明、充满了活力和仁慈。如果不修改剧本，影片的拍摄工作将遇到很多麻烦。

马克·罗伯逊当机立断：“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小组在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台湾，可是大家都忘了通知格拉迪斯。10多个台湾人生气地要求她支付他们的劳务费和服装半成品费用。有一次，褒曼几乎被人从一辆三轮车上拽下来。因此，她非常厌恶这部影片，从来也不想看它。

威尔士的斯诺登山区被选作拍摄“中国陕西省”的外景。在威尔士的山顶上建起了格拉迪斯·艾尔沃德曾经居住过的四周环绕着城墙的阳城县城。加的夫、伦敦、利物浦的中国洗衣店和饭店里的孩子们都被聘来扮演中国儿童。可是，他们都带着令人头疼的伦敦口音。他们的父母和被聘的其他中国人也一起参加拍片。

C 她希望5月份能办完离婚手续，很快她就要再当新娘了。她觉得她的孩子们都会很平静地对待她的再婚的，可是皮娅会更加烦恼和不理解。不久，聪明的女儿终于理解了她……

皮娅的来信警告褒曼说，她是在从油锅里往火坑里跳，并说：“你可真不会挑选丈夫。”皮娅希望她先不要忙于结婚，要三思而后行，说他们两个人相处时间太短，彼此不会很了解，并且问拉斯过去是不是结过婚，如果结过婚，那个婚姻该怎样处理。皮娅提醒她要对孩子们负责任，说人们正在注视她的一言一行，并且认为她的孩子们将来也许会像她。可是，在信的最后女儿说：“不管决定怎样做，我是支持你的。”

不久，皮娅来巴黎看望褒曼。拉斯和皮娅相处得极好。他们彼此有说有笑，还不时和褒曼开玩笑。那天夜里当皮娅和他们在一起时，她对褒曼说：“妈妈，要是您不和他结婚，我会嫁给他。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家里。”

看来，皮娅对他们的这桩婚事很高兴，褒曼还要听听双胞胎对此事的看法。

她在威尔士拍摄《六福客栈》期间，两个双胞胎女儿都跟她在一起。一天晚上，他们都洗了头，穿着浴衣坐在地板上吹干头发。褒曼对6岁的英格丽和伊莎贝拉说：“要是妈妈再结婚，你们高兴吗？”她们脸上立即都流露出兴奋的神色。“那太好了。”她们想了想说：“你找到中意的人了吗？”褒曼说：“找到了。你们还记得来这里看我们的那个漂亮的男人吧？他叫拉斯”。“当然记得，我们很喜欢他。你什么时候和他结婚？”

这时，儿子罗勃蒂诺在巴黎和他父亲罗伯托第一个妻子生的男孩伦佐在一起。伦佐已13岁了。因为忙于拍片，褒曼无法去看望罗勃蒂诺。

她对孩子们说：“你们别对罗勃蒂诺提起这件事，我会亲口告诉他的。”

罗伯托知道了褒曼和拉斯的关系，他告诉了伦佐，伦佐立刻告诉了罗勃蒂诺。当褒曼带着孩子们回到巴黎走进卧室时，罗勃蒂诺和伦佐虽然已经听见他们进了屋，他们却相互做了个鬼脸，嚎啕大哭起来。“怎么啦？”她说，“出了什么事？”

“你……又要……结婚了，”两个孩子哇哇哇地哭个不停。

“很抱歉，我本来早就要告诉你的，可是你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了。”

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也难过起来。也许她们的哥哥是对的，似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了。

褒曼需要带着两个女儿和罗勃蒂诺去公园和拉斯见面，一家报纸要为他们拍照片。他们3个人都表情呆板，很不高兴。褒曼觉得要是带着满面愁容的孩子们去照相就太可怕了。

于是，她对罗勃蒂诺说：“你不是认识拉斯吗？你和拉斯一块去过动物园……”

“是啊，我对拉斯不反感，我喜欢他，可是这并不是说你非得嫁给他不可。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

这样，3个孩子和他们的父亲都联合起来反对褒曼。可是这两个女孩子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她们悄悄地咬耳交谈着。对它们的哥哥的意见似乎拿不定主意。

拉斯在公园门口迎接他们，大伙儿一同去参观他们想买下的乡村别墅。它位于舒瓦塞尔村，离巴黎40公里。罗勃蒂诺同拉斯坐在前座，褒

曼带着英格丽和伊莎贝拉坐在后座。罗勃蒂诺不理睬拉斯，他沉默地两眼望着车外。

小英格丽趴在褒曼耳朵边小声说：“妈妈，拉斯知道你要嫁给他吗？”

“嗯，我想他知道。”

“你问过他吗？”

“是的，我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她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你应该先问问他。”为了摸清情况，她往前探了探身子问道：“拉斯，你愿意和我妈妈结婚吗？”

拉斯感到很奇怪，迅速向后看了褒曼一眼，没有说话，继续开车，因为他太激动了。

小英格丽转身向妈妈急切地说：“他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噢！”她很吃惊，她以为拉斯也许不愿意和褒曼结婚。她又往前探探身子说：“拉斯，我妈妈还很年轻啊。”

褒曼几乎要痛哭了，因为她觉得这是6岁的孩子能为自己的妈妈找意中人所说的最感人的话了。

拉斯笑着说：“如果你想要我和你妈妈结婚，我也许就照你的意见办。”

伊莎贝拉也和他们一块谈了起来。“是啊，”她说，“我们非常愿意您和我妈妈结婚。别担心罗勃蒂诺，我们会说服他的，他会理解的。”

他们来到别墅的绿色大门前，两侧是石头垒的灰墙。走进大门，只见在一片开阔的绿色草坪中，生长着一行行美丽的珍贵的雪松树，这是褒曼从来没有见过的。淡绿色羽毛般的树枝垂下来吻着草坪，真有点像迪斯尼笔下的动画片。小英格丽往前走了几步，终于看到了那所精致的用灰石砌成的农舍和古老的墙垣。

看到这一切，褒曼立刻想到，这所别墅和拉斯的小岛一样，正适合他们和孩子们居住。

还有几周褒曼就可以拍完《六福客栈》一片，英国著名男演员罗伯特·唐纳特正在病中。他已经退休闲居，为了扮演清朝官员这个角色，又应邀出来客串。在罗伯特抱病为他的角色配音时，影片的其他摄影工作都停顿了。几天以后，他溘然长逝。朋友们都把这部影片当作他的安魂曲。影片很受欢迎，唐纳特和褒曼都得到了世界影坛的称赞。

伦敦《每日简报》说：“这部影片自始至终尽善尽美。褒曼小姐的表演是她一生中最优秀的艺术天才的体现，是女明星嘉宝达到顶峰以来的又一最完美的表演。”

《时代》杂志一方面批评这部影片在花费了500万美金的巨资，说影片太长要演157分钟，还说这是以中国为主题最差的一部影片。但另一方面也说这部影片在描写女人的性格方面却是成功的，气氛真实感人。“这部影片的故事是动人的，女人像火一样的纯真、热切，像石头一样的坚实质朴，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0年以后，褒曼去日本旅行，顺道去台湾特意想要见见格拉迪斯·艾尔沃德。可是她来得晚了一步，格拉迪斯已在10天前长辞于世。褒曼给

伦敦的艾伦·伯吉斯寄去了一封充满哀思的短信：

过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来到了台湾。但是格拉迪斯·艾尔沃德已经告别了人世，真是令人难过。今天下午，我见到了凯思琳·兰顿-史密斯，她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从英国来台湾协助格拉迪斯办孤儿院。格拉迪斯死后，她接管了这所孤儿院。我们二人一块去访问了格拉迪斯的家。她的屋子同她生前时一样，陈设十分简陋，使我大为感动。我见到她的很多孩子。只差 10 天我没能见到她，这是我永生的遗憾。我心里难过极了。她是一个多么高尚的女人啊！她一直坚持工作，操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凯思琳·兰顿-史密斯给褒曼看了一本剪贴簿，这是她在格拉迪斯的一个柜橱后边找到的。在剪贴簿里，格拉迪斯贴了很多褒曼和那部影片的剪报和照片。褒曼觉得最令她感到惊异的是，一个高大的瑞典女人同一个纤小的伦敦女人竟然在情感、意志力和献身精神方面有那么多相同之处。自从褒曼和凯思琳·兰顿-史密斯在台湾会晤以后，她花了不少心血来保证格拉迪斯·艾尔沃德的孤儿院能按时得到捐款和资助；她竭力促使美国联合演出俱乐部成为孤儿院最慷慨的解囊人之一。

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孩子

A 防不胜防的摄影记者；和记者捉迷藏的痛楚；她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的一切都在曝光之中，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褒曼和拉斯结婚的那些日子里，要想摆脱记者们的追踪，真是太难了。拉斯要她去探望和拜见住在哥德堡城外的公公婆婆。她先乘飞机飞往哥本哈根，好让记者误认为她是去探望她那住在这座城市，过着退休生活的姨妈莫蒂。褒曼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偷偷地从后门溜出来，坐进了拉斯的朋友斯卡鲁勃驾驶的汽车后座，藏在一条毛毯下面。拉斯不动声色地钻进了另一辆汽车，驶离了旅馆。所有的摄影记者都乘车尾随着拉斯的车子。这时，褒曼慢慢能舒舒服服地坐起来，一直到了莫蒂姨妈家。那里到处都有摄影记者。他们立刻认出了褒曼。她大声对斯卡鲁勃喊道：“快开车，快开车！”摄影记者们也飞快地奔向他们的汽车尾随其后。褒曼对斯卡鲁勃说：“向左急转弯，然后放慢速度，让我跳下去藏起来。让他们追你。”他向左一拐，驶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她打开车门跳到雪地上，滚进一条小沟里蜷缩着身子，一直等摄影记者们的车子驶了过去。

她忍痛往回步行到莫蒂姨妈家，再坐进拉斯的汽车，径直驶向瑞典边界。可那里的摄影记者更多，她又藏在毛毯下面。当然，摄影记者认识拉斯，而且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拉斯停在路上给家里打电话，他的父母对拉斯说：“整个院子里都是人。他们把聚光灯安在汽车顶上，可以四处照射，观察你们来了没有，了解你们可能从哪条路来。”

拉斯决定驾车往他父母居住的达格波哥，他知道房子后面有条小路。在黑暗中，他们把车停在一座公墓附近，穿过一块块墓碑向前走去，翻过了一道墙，跳进了到处是积雪和泥泞的空地，然后他们又爬过大门。褒曼的袜子都被撕裂了。他们又爬上了一道高墙，家里的男管家早已在这里架好了一个梯子，他们顺着梯子下到地面。这儿真像一座集中营，探照灯向四周照射，它照在雪地上，照在树丛中。他们只好趴在雪地上，等探照灯扫过后，往前紧跑几步又趴下来，用这种办法他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后门。

褒曼在影片中和舞台上曾演过很多角色，经历过许多动人心弦的场景，却还没有如此惊险的经历。她满身是泥，袜子撕得粉碎。她就是以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去拜见她未来的公婆的。她对拉斯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借我一双袜子穿，再去吃晚饭？”接着，电话铃响了起来，而且一直响个不停。拉斯请他父母说他们不在那里，但是他的父亲素有教养，彬彬有礼，不会说那种谎话。他拿起电话客气地回答说：“请等一等，我去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在这里。”

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终于走了。第二天一早褒曼和拉斯也离开了这里，他们只好到朋友家去躲避无孔不入的记者群。

B 又一次结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记者们搜寻他们的闪光灯像放焰火一样在他们身边闪亮……

由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瑞典的法律手续繁杂，很长时间褒曼不

知道她是否已经合法离婚。不久，离婚判决书终于来了，他们开始准备结婚，但是在法国他们没能办好有关的法律手续。

拉斯在英国找到了一位好心的律师，他依据法律文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仔细阅读了全部文件后说：“毫无问题，你们可以在这里结婚。”于是他们就订在1958年圣诞节前夕，在卡克斯顿礼堂结婚。拉斯希望这件事能保密，就像他也这样要求别的事一样。他说，每个人都有权过自己的私生活，为什么这件事非得登报不可。于是，他们又做了安排。拉斯的瑞典老朋友戈伦和玛丽安娜·埃森，以及恶德尼·伯恩斯和他的妻子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褒曼悄悄地从“康诺特”饭店的后门溜了出来。其他人也从不同的大街小巷前往礼堂。登记人在悄声低语地主持婚礼仪式，最后他要求拍一张照片供他个人作收藏品。他们相信了他，可是过了一天以后，报纸上却登出了这张照片。

他们回到“康诺特”饭店吃午饭。大家举起香槟酒庆祝说：“生日愉快”，以此来蒙混服务员。恶德尼说：“6点钟我能在格林那达电视中第一次发布这个消息吗？”恶德尼除了是制片人外，还拥有格林那达电视台。他解释说：“那时候你们已经乘飞机回法国，而且就要抵达舒瓦塞尔村了。”于是，褒曼说：“当然可以，”结果她还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他们同玛丽安娜和戈伦回到舒瓦塞尔村时，法国记者听到了发自格林那达的电视新闻，他们一窝蜂似的钻进自己的汽车。刹那间，一片喧嚣声此起彼伏。舒瓦塞尔村的宁静气氛荡然无存，法国的照相师和摄影记者比意大利的毫不逊色。他们翻过墙头，越过篱笆，想方设法撬开百叶窗，他们的闪光灯像焰火一样忽闪忽闪地亮着。“不要这样，”他们阻拦着说，“我们不想在夜间这样的时刻照相。明天我们可以送你们一些照片。”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使他们罢休。他们继续向室内“入侵”。玛丽安娜正在她的寝室里，百叶窗突然被弄开了。玛丽安娜大笑着说：“我正弯身从衣箱里取东西，他们拍的是我的大屁股。”

拉斯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拿着手电筒前来救助。摄影记者们只好一哄而散。警察对他们说：“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拍照片，也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休息？”

他们却很固执。“不，”他们说，“什么时候同意拍照，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遭受了包围，我们拒绝妥协，更不肯让他们拍照。”

警察一直呆到凌晨4时，同拉斯和褒曼一起喝了香槟酒，祝贺他们新婚。第二天让摄影记者们尽情地拍了照片，大家才皆大欢喜地离开了。

C 前夫罗伯托对她的又一次结婚十分不悦，他寻找各种事件来纠缠她，这一切又触起了她内心的隐痛。同罗伯托的纠纷从现在起才算真正开始。他提出诉讼，要求充任孩子们的监护人……

罗伯托似乎能找到对付褒曼的各种武器。他说她是新教徒，她家里没有人了，没有祖母，没有姨妈，没有叔父。现在她又和一个瑞典人结了婚，因此她有什么资格来抚养孩子呢？罗伯托为此大叫大嚷，四处扩散。他甚至还说褒曼的名字根本没写在孩子罗勃蒂诺的出生证明上，她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作儿子的监护人呢？此外，他说褒曼的婚姻的合法性

仍值得怀疑，是否犯了重婚罪还值得探究。以后每次去意大利访问，褒曼都担心罗伯托会不会想方设法把她送进监狱。

后来罗伯托要他母亲和姐姐玛西拉签名发表一项声明，说她们将住在罗伯托罗马的房子里照料孩子们。褒曼很敬重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他们也都很喜欢褒曼。后来她母亲多次笑着对她说：“英格丽，我不想签署那份文件，玛西拉也不想这样做。”褒曼说：“我完全清楚罗伯托的为人。他强迫人们去做他要做的事，他是我遇到的最顽固的男人；一旦他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变得和蔼可亲。”

1959年1月，在巴黎的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上，法官雷内·德罗拉特判定褒曼承担3个孩子的临时监护人。他还裁定孩子们应该上巴黎的意大利学校，罗伯托先生拥有周末去探视他们的权利。

罗伯托企图阻止法国法院采取的法律行动，他说：“法国法院没有裁判权，我是意大利公民，”他说，“3个孩子都是意大利公民。我认为，到底应该由谁担任监护人，应该由意大利法庭裁决，而不应由法国法庭进行裁决。”

褒曼早已料到，这会成为一场公开的冲突。现在她不得不在意大利法庭上进行申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莉安娜·费里对褒曼说：“你是演员，你可以在意大利法官面前失声痛哭，你肯定会得到孩子的，我很了解意大利人。”她回答说：“在舞台上我是演员，可在日常生活中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不能弄虚作假。”

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轻举妄动》和《六福客栈》取得成功之后，褒曼又夺回了失去的荣誉，成了那10年中的巨星之一，收到了纷至沓来的演出邀请。同过去一样，她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们，她喜欢“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D 一切为了孩子。无休止的孩子“争夺战”愈演愈烈，使人心力憔悴……

现在，孩子们同拉斯和褒曼一起住在舒瓦塞尔村，每天乘汽车到巴黎去上意大利学校。罗伯托有权在任何时候去看他们，这是褒曼已表示同意的。他在罗马的法庭上指责说，褒曼让孩子们在舒瓦塞尔和巴黎的意大利学校之间来回奔跑，简直不顾孩子们的死活。尽管有一名司机驾车送他们上学，罗伯托还是指责说，每天汽车这样长途行驶太危险了。他们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褒曼被迫让步。

孩子们只好住在巴黎。褒曼在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的管家埃里娜·蒙提斯日夜照料孩子们，褒曼也几乎每天都去看一看，晚上她驾车去舒瓦塞尔，回到拉斯身边。

罗伯托决定每周末都来巴黎和孩子们在雷菲尔饭店呆两天。褒曼想让他们出城来舒瓦塞尔，这里空气新鲜，孩子们可以玩狗，可以在树林里奔跑。可是很难说服罗伯托改变主意。有一次，孩子们和罗伯托在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回法国时褒曼去车站接他们。她发现罗伯托也在那里——他乘飞机提前到达。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接孩子们去饭店。”

“可是，我是来接他们的。汽车就在外边。我和他们这么长时间没

在一起了。我要带他们去乡下……”

“不行，我需要他们，他们要和我在一起。”

孩子们来了，都扑到褒曼怀里。毫无疑问，他们都想坐进她的车。罗伯托说：“不，你可以带着两个女孩，我带走罗勃蒂诺，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

褒曼本想跟他去饭店商量这件事，可是她没有去。她带着两个女儿驾车去舒瓦塞尔，然后给罗伯托打电话说：“现在我就要来领罗勃蒂诺。”

等褒曼回到巴黎时，罗勃蒂诺不见了，罗伯托把他藏了起来。一连三天褒曼不知道他在哪里。最后褒曼终于得到同意领走她的儿子。这个可怜的8岁孩子哭着说：“爸爸说你偷走了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你偷走了她们……”

褒曼说：“好吧！让他说去吧，可是，这是该我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了。”

“好啊，”他说，“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不偷走我呢？”

第二年夏天，1960年6月，褒曼带着孩子们去拉斯的小岛。要是依罗伯托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去的。

埃里娜也和他们一起来了。一天到晚总在下雨，可是孩子们并不觉得扫兴。他们在小岛上到处玩耍、划船、在小海湾里游泳。他们从来没有玩得这样痛快过。

褒曼和孩子们也会碰到不少的难题。有人对孩子们说，同新教徒的妈妈一块祈祷是一种罪恶。褒曼习惯于用瑞典文祈祷，一天，他们拒绝同妈妈一起这样祈祷。褒曼问：“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一块祈祷呢？”

他们说：“父亲说你是异教徒。”

褒曼说：“不对，我不是异教徒。实际上我们所信奉的都是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只是向上帝祈祷的方式不同。要是你们不愿意，可以不和我一块祈祷，我一个人做。”于是褒曼开始祈祷起来，起初听到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参加祈祷，接着又一个小孩的声音也参加进来了。

同罗伯托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褒曼意识到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极为不利。只要电话铃一响，他们就跳起来说：“是律师，是律师的电话吧？”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因为家里的大人经常吵架。

该下决心先解孩子们的忧虑了。褒曼对他们说：“告诉我，你们愿意留在舒瓦塞尔呢，还是愿意回意大利和你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呢？我现在写好了‘愿意’和‘不愿意’的小纸片，要是你们想留在我这里，在‘愿意’旁边画个x，我回避一旁。你们每人拿一张纸，然后放在这个帽子里，我允许你们自由选择，也不会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公布结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可是他们不同意。

拉斯也很苦恼。他在舒瓦塞尔村尽心尽力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家，一切安排井然有序。可是孩子们却彼此小声说：“你不会去吻他吧，是吧？你不会去和他玩的，是吧？”罗伯托给褒曼写了好几封信，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改善不了这种气氛。罗伯托想带孩子们去西西里，他正在那里拍一部电影，可是褒曼不同意，因为在那里无法保证孩子平静而有规律地生活。

褒曼不得不再一次去意大利向法院申诉。罗伯托带着孩子们去了西西里，一直呆了3个月。她想把孩子们接回来。法官对她说：“当然你

可以把他们带回法国去。”

走出法庭时，罗伯托怒气冲冲地发作了一顿。褒曼说：“你不能一意孤行，你并非拥有对孩子的全部监护权，临时监护权仍在我手里。在你取得监护权之前，我坚持他们和我回去。他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

“好吧，”他说，“你把孩子们领走吧，成天守着他们。”褒曼在整理他们的东西时说：“他们的护照呢？”“哈，”罗伯托说，“法官根本没有提护照的事。”“就是说，你不打算把孩子们的护照给我吗？”“对了。判决书上没有一个字是提及护照的。你自己再去看一遍判决书。”

非常幸运，瑞典大使是褒曼的朋友。

他说：“我可以给孩子们发瑞典护照，因为他们的母亲是瑞典人，可以允许他们有两本护照，一本瑞典的，一本意大利的。”

尽管天色已晚，他还是打开办公室，为他们拍了护照专用相片。第二天早晨，褒曼领到了三本瑞典护照。他们出发去机场。罗伯托到处也有朋友和私人侦探。有一个人探明褒曼去过移民局，立即给罗伯托打了电话：“英格丽在机场，她给孩子们弄到了护照。”

“不可能，”罗伯托说，“她没有护照，孩子们的护照在我身上。”

“罗伯托，她一定弄到了3本瑞典护照。他们就要起飞了。”

罗伯托简直气疯了。他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车尖叫着向停机坪扑去，警笛一个劲地尖叫着，变色灯闪个不停。褒曼走下飞机舷梯说：“你们没有权利要我和孩子们下飞机。我们的护照是有效的。请你们检验。我是孩子们的母亲。我拥有对他们的合法监护权。他们已经在意大利和他们的父亲呆了3个月了……我们要走了，再见。”

警察说：“对不起，我们不过是执行任务。”

“那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再见！”

后来罗伯托反复唠叨说，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件事引发的。

褒曼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诉讼案。这似乎是把罗伯托的孩子从他可爱的国家中领走，置于和褒曼结婚的瑞典人保护之下。拉斯在机场迎接他们，以防罗伯托打电话给他在巴黎的熟人，在孩子们下飞机后把他们强行带走。谁都无法预料罗伯托会耍什么手段。

又迎来了一个除夕之夜。在除夕之夜褒曼总是多愁善感。她非常重视除夕之夜，她想，一年又过去了，她做了些什么呢？她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又做错了什么事呢？在新的一年里处事待人能否更为通达和蔼，能否更多地为别人设想？新年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响彻了城市和乡野，人们在祈祷和平，祝愿祥和，而她却在为3个孩子奔波，就像她曾为女儿皮娅终日操劳那样。

褒曼曾经给罗伯托去过电话，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他却暴跳如雷。他们就像在所罗门神面前争夺儿子的那两个女人一样势不两立。

褒曼开始思索：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到底有多少错？她绝不能放弃孩子，可是如此相争下去会给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身体带来损失。要想让孩子们过得平安幸福，总要有一人让步。

她终于想通了。在电话里对罗伯托说：“好吧，我放弃了。孩子可以归你。你可以在意大利把他们抚养成人。我马上把孩子们送到你那里

去。”她确实这样做了。

她对法官说：“谢谢您，我不再等候您的裁决了。”

她的律师说：“你就要打赢这场官司了，我们掌握了罗伯托·罗西里尼的一切情况。他想要孩子，只是具有父亲的身份是不够的。他是意大利人。他说他有众多的家人来照料孩子们。意大利法庭不可能推翻法国法庭的判决。你已稳操胜券，就要得到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了。”

“很抱歉，”她回答说，“我不准备上诉了。我不会再到意大利去打官司了，我同意把孩子们交给罗伯托抚养。”

罗伯托一旦得手，他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的大转弯。

当褒曼把孩子送交给罗伯托时，他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下第一好人。他还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一套住房，并且对褒曼说，随时欢迎她来。从此以后，她同罗伯托再没有发生过争吵，且经常保持着必要的联系。

以后的12年里，褒曼穿梭于罗马与巴黎的空中走廊，这几乎成了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巴黎住上二十几天，然后去罗马住上十几天，或者回巴黎到拉斯那里住上两个星期，再去罗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尽可能地多接近孩子们，多给孩子们一些温暖和母爱。照料未成年的子女是件十分细微繁杂的事。一位善良的意大利妇女给褒曼帮了大忙。她叫阿吉尼德·帕斯科里尼。埃丽娜走了以后，由她负责照料孩子们。她和孩子们同住了14年。她很爱孩子们，照料得十分周到，她成了他们的第二母亲。孩子们非常敬重她。伊莎贝拉结婚时，她还是证婚人之一。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小英格丽首先跑去找的就是阿吉尼德妈妈。罗勃蒂诺长大后每次回罗马，也一定要去看望她。

E 第三次婚姻的苦果。爱神啊，这多么缺乏公允和良知。就在那天晚上，拉斯告诉了她，他又找到另一个人——克里斯蒂娜。那时，拉斯和她已经结婚12年了……

起初褒曼由于拉斯的不忠很不平静。她意识到这是她自惹之祸，这是她自己的过错，莉安娜很久以前就警告过她。她知道不能责备拉斯。起初，她火冒三丈，很不冷静，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讨论了离婚问题。她想，她该离开，走得远远的。接着又想，也许他与克里斯蒂娜的婚外恋情可以结束。拉斯和褒曼之间的联系仍十分密切，他们也许还能和好如初。不过，虽然表面和解了，毕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褒曼又面临着沉重的选择：争取把现实的婚姻委曲求全地保持下去重要呢，还是为艺术献身更重要一些呢？是去摄影棚，去剧场演出好呢？还是坐在家，当无聊平庸的贤妻好呢？她一直带着这些痛苦的思考沉重地生活着。突然间，一切面目全非了。

他们什么事也没做。拉斯的年轻的情人仍然藏在幕后未能露面。褒曼想，长此下去，他们会互相把对方置于极不愉快的处境之中。她还是像过去那样过日子，解除内心痛苦的灵丹妙药就是工作，拼命地工作。一个叫宾基·波蒙的男人再次出现在她的生活里。褒曼在演《村居一月》以前就认识宾基。他是伦敦最有名的制片人之一，也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褒曼坐在舒瓦塞尔村的家里看书，看电视，看看时间，估计拉斯什么时候回家。接着电话铃响了，是拉斯打来的，他说：“我今晚排练太

忙。别等我了，我可能回来很晚。”整个晚上她的心绪不宁，只好耐下心来看书。电话又响了，说话的是宾基：

“你觉得烦闷吗？”

“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为你找了一个剧本。”

“什么剧本？”

“是乔治·萧伯纳写的《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剧本。”

“好吧。我送给你看看。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吗？”“没有，什么都没有。”

“好吧。你看看，然后我们再讨论。”

褒曼看了剧本，觉得很好。剧中有个角色是个非同一般的 200 女人。她是个见解独到、聪敏机智、幽默风趣的女人，同 24 个呆头呆脑的男人作对。褒曼觉得，要能演好这个角色也是一种尝试。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具备演各种角色的艺术素质。

她给宾基回了电话，她说：“我可以演这个角色，但是这个剧本还要加工，否则许多内容叫人难以置信。你了解剧院的情况，你认为这个剧本能行吗？人们会来看吗？”

“有你参加演出，他们就会来。”他说。

每次褒曼主演一个角色，她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竭尽全力演好。虽然纽约剧院富丽堂皇，法国剧院也不错，而伦敦剧院却有某些特殊的东西。

她跃跃欲试。同拉斯商量了一下，他认为想法不错。她给宾基打了电话，说她就来。

褒曼觉得选择适合于剧情的服饰也是饶有兴趣的事。她在一本书里看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照片，那是很久以前在非洲旅行时拍摄的。褒曼说：“这还是塞西莉·韦恩弗利特夫人在摩洛哥时穿的衣服，这正是我想穿的服装。”

宾基说：“太男人气了！”

“好吧，”她说，“我们订个协议，第一场我的表演将充分显示女人的魅力，第二场我的表演就要十足的男性化了。”他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褒曼和她的剧中的 24 个男人，在布赖顿进行首场演出，乔斯·阿克兰饰布拉斯邦上校，肯尼思·威廉斯饰德林克沃特。劳伦斯·奥立弗来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开幕式演出——褒曼对此十分激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排了一次晚宴。褒曼去参加以前，她那剧中的 24 个男人说：“多加小心。你要是在劳伦斯那里听到一大堆意见，你将无所适从。”褒曼说：“我将高兴地听到我能得到的一切忠告。我希望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在晚餐进行到一半时，劳伦斯爵士还在同乔斯闲聊。他们谈的意见都富有深刻的内涵。褒曼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同他谈话呢？

喝完咖啡之后，他们正要告辞时，劳伦斯望了她一眼说：“一旦你真正掌握了对白，你就更加完美。”

在伦敦，他们在剑桥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舆论批评好坏不一。褒

曼猜想对她的批评是少不了的，不仅仅因为她的道白有时结结巴巴，而且因为她不是英国人。有人说，为什么要让一个外国人来演塞西莉夫人呢？

英国观众对这种闲话并不在意。天天晚上剧场爆满。伦敦《每日快报》戏剧评论家赫乐曼·克雷茨马尔声称他要到票房去退一张多余的票时，遭到在那里排队、希望得到退票的中年观众的围攻。他们说都是来看英格丽·褒曼的。她对此感到欣慰。

褒曼和一个新组成的美国剧团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演出了《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这个剧在威尔明顿市举行首场演出后，还到多伦多演出，最后是在百老汇演出。演出获得了成功。她无论在什么地方演出，都会受到那里观众的赞扬。评论家们公认“英格丽是了不起的”，“能看到她回来很高兴”。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后来终于得知那年在百老汇演出的新剧中，只有《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的投资全部收回了。

F 华盛顿。她在全国新闻协会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使她喜出望外。这是她渴望了 22 年的难得机会。多年来，她一直未能忘记参议员约翰逊对她的尖刻毁谤，这个讲话载入了 1950 年 3 月的国会记录，特别是那个使人难忘讲话的结束语：“如果从《火山边缘之恋》堕落中吸取了教训的好莱坞，从此树立正派的作风，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英格丽·褒曼的事业虽然毁了，但也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从她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美好的好莱坞。”

以后的事实回敬了约翰逊先生……

美国议员那段讲话太伤人了，且入骨三分。褒曼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要时刻注意礼仪，要诚实地生活，对待别人要重于自己，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实践自己所受的教育。她不认为同罗伯托·罗西里尼恋爱结婚，为他生了孩子，就该受人羞辱。报纸的某些过激言词，她还能容忍，因为记者们必须生存，报纸也得卖得出去。但是受到位于首都的美国参议院的羞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参议院的大理石圆柱门廊内镌刻的字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崇尚真理、主张正义、自由、男女平等的，然而她觉得参议员先生应该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剥夺了一个女人的权利。

70 年代初，电影业面临被电视取代，被电视挤垮的危机。褒曼说，当时如果有什么被化为灰烬的话，那不是她，而是好莱坞的电影业。1972 年 4 月，报界说：“英格丽却像凤凰那样从火焰中腾空而起，达到其他女演员很难达到的成功之峰。”

此时，全国新闻协会举行了前所未有的评论家、记者、作家，电视及无线电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与会人数比会见著名人物如赫鲁晓夫或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人数还要多。会上他们向褒曼提出的问题，过去她已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你认为演喜剧要比演传统剧难一些吗？和你演出所到过的其他剧院相比，你对肯尼迪中心的印象如何？你是怎样保持你的艺术青春的？你作为一个演员除了对戏剧感兴趣之外，还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吗？譬如说对政治？”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褒曼首先说，她从来没有因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影响过自己的行动。她是一个演员，除感谢上帝赋予的一些天资外，她拥有的只是艰苦的工作和某些机遇。她想她活着应该对别人有利，

但这并不是政治。她感兴趣的是社会、儿童、战俘和战争的孤儿问题，这些就是她同政治惟一有牵连的事情。

他们还问褒曼是怎样学习的，是怎样进入角色的。

她的回答是：“关于表演艺术的书籍我看的不多。我曾努力钻研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甚至在第一次读剧本时，就本能地领会到要扮演的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旦遇到我不理解的剧本，我就拒绝演出。我必须完全了解这个人物及其性格。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上必须要有那个女人的某些素质，然后我才可能理解并进入角色。与其说这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灵感。每当我深入生活去体验一个角色，我便四处寻找。我漫步街头或乘公共汽车，我可以和许多人接近。这时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记住被观察的那个人的行坐立姿势。我必须记住她的服饰。若是以后在演出中突然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我必须戴一顶她那样的帽子。人们要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

需要回答的问题源源不断地提出来了。突然间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像铃声一样使褒曼一惊：“听说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个损失呢，还是件好事呢？”

褒曼回答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个损失。当年好莱坞采用明星制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现在又要推翻这种制度了。你们有设备先进的摄影棚，一流的技师，但时代在变化，所以我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许多事情都变得虚伪，变得华而不实，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

她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合她意，为她要讲的话开了个头。

她说：“我曾觉得好莱坞是很理想的从影之地，我对它无可抱怨，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极美好的时光。人们好像都喜欢我，我们也拍了一些好影片……然而我只不过是想做些更现实的事情。当我看到《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时，我认识到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正在拍制一种不同类型的影片，于是我暂时离开了……”

“现在我要说十分关键的话了。我等待这个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已经等了22年。我必须说，在我离开这里去意大利时，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先生发表了一篇攻击我的话，他在讲话的结尾部分说，好莱坞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好的好莱坞。”

褒曼没有意识到自己把原话颠倒了。她说的是“好莱坞的灰烬”，而没有说“英格丽·褒曼的灰烬”，这样完全失掉了她的话的讽刺意味以及说话的目的。别人没有理解她的话的含义。有几个人的面孔显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但多数人的表情看上去是高兴的和感兴趣的。

一直等褒曼回到法国，放听全国新闻协会赠给她的记者招待会实况录音带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等了22年要说的话，都让她说颠倒了！直到后来谈及此事时，还叫她大笑不止。

她想，精神病学者可能会说她的口误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漫不经心的走嘴，她已经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其实她的愤怒情绪早因美国和美国人民对她的热情接纳而平息。而且她自己意识到：“自从‘玛丽女王号’轮船1939年3月把我这个身材修长、面带笑容的瑞典金发姑娘送到纽约的土地上后，在这些年代中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给了我温暖和慷慨

的接待。是美国在培育我成为电影明星，美国和美国人民为我做出了贡献。”

1972年4月，褒曼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公正对待。参议员查理士·H.珀西在褒曼访问华盛顿时，在美国参议院站起来发言说：“总统先生，22年前，就在这个会议厅里一位世界上最可爱、最通情达理、最有才华的女性成了极少数人猛烈抨击的牺牲品。今天，我愿对这位无与伦比的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影星英格丽·褒曼致以遗忘已久的深切敬意。”他赞扬褒曼在《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中的演出。他说：“如果没有她的艺术才能，我们的文化将会变得贫乏。对美国公众来说，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知道遍及我们国土上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同我一道，对英格丽·褒曼事业登峰造极之时，由于受到个别人及电影行业某些人的迫害而远走他乡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同我一起，对她的今天表示最令人信服的敬佩、爱戴和尊重。美国不仅欢迎褒曼小姐，我们还对她的来访深感荣幸。”

参议员约翰逊曾将对褒曼不友好的报刊文章目录收入国会记录。参议员珀西也把赞扬和祝贺她的长篇文章载入了国会记录，并把这个记录的副本送给了褒曼。为了感谢他，褒曼写信说：

亲爱的珀西参议员：

我和美国参议院的矛盾很久以前已告结束了。然而创伤依然存在。现在，由于您在参议院所做的慷慨和谅解的讲话和正义的姿态，我的创伤已全部愈合……

G 拉斯和她仍在努力从事他们热爱的职业。拉斯有他自己的戏剧及版权机构。他同剧作家、演员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上演过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阿诺德·韦斯克和艾伦·埃克伯恩的剧作。婚姻破裂的危机依然存在，她用事业来“麻醉自己”。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是《人类之声》，那是在1967年……

拉斯习惯于用瑞典语戏称褒曼为“金鹅”。因为只要她在剧院演出，准能获得成功，等于下了一个又一个金蛋。她的丈夫是个制片人，她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使她多少有点不满的是，拉斯从来不想为她找一个理想的剧本。

他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褒曼终于知道他永远不会给她找剧本了。拉斯和蔼地对她说：“你应该从我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亲爱的。我不想剥削你，从不想利用你的声誉。把英格丽·褒曼摆进一个剧本里，就一定能成功，那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俩人相处得很好。久而久之，褒曼也不介意这件事了。于是他们认为，他们俩可以像过去那样，再重新生活在一起。她朝这方向努力了，但毫无用处。他们的婚姻已接近尾声。这样，像平常一样，她又全心投入到事业中去了。她把这叫做“通过事业来麻醉自己”。

宾基·波蒙有时打电话到舒瓦塞尔村找褒曼。“你在做什么？”“噢，我在这里闲坐消磨时光。”“一个人吗？”“是的，我一个人。”“那么，我告诉你，赶紧收拾好行装，坐飞机来这里吧。给拉斯留个条子就

行了。”

到机场来接她的汽车，直驶宾基的寓所，那里通常有一些同行们在一起聊天，也总离不开戏剧话题。褒曼觉得这种没有外人干扰的社交小圈子很温馨，大家都在谈论自己的事业，谈论剧情和演出情况。这里充满着笑声和友谊。

宾基才华横溢，精通戏剧，且富有创造性，只要他说某件事能成功，那件事就能有所获。他们有时也许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只要听他耐心精明地预测未来，大家也就信服了。于是，褒曼也信心百倍地和他一道坚持做下去。她把宾基当成可信赖的益友良师。

遗憾的是，1973年，在他们合作排练萨姆赛特·毛姆写的剧《忠贞之妻》的过程中，宾基突然病逝了。

第十五章 水银灯下——生活的主旋律

A 拉斯是怎样评价他们婚后的前几年生活的？

从一开始，拉斯和褒曼就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生活非常相像。两个人都想离开瑞典；都想做一番超过瑞典能给予他们的更有价值的事业。他们必须离开瑞典。他们俩人都有幽默感，他们互相都很了解。

拉斯同褒曼首次在一起合作的是电视。1959年，褒曼在纽约为全国广播公司演出了《鬼魂附身》，这是亨利·詹姆斯写的鬼怪故事，叙述两个年轻人如何被已故的两个仆人的鬼魂困扰。她扮演家庭教师，设法保护孩子们不受超自然力量的危害，结果一个孩子还是死在她的怀抱里。整个情节阴森恐怖。这个片子使褒曼获得了“艾弥”电视大奖。

谈到他们婚后的前几年生活时拉斯说：“同英格丽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惶恐不安。爱英格丽这样身份的女人，并同她结婚意味着要放弃静谧的生活——至少放弃一部分。我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这可能是瑞典人的性格。突然间我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人物……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我认为英格丽在嫁给我以前生活透明度大一些。婚后我们顶住了新闻界叫人头痛的宣传，而且确实有了成效。我们在一起非常快活，不愿意让记者先生们干扰我们的幸福生活。

“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两个人工作都非常勤奋，我在巴黎演出了70个剧，我们俩人都在各处拍摄电影。有时，几个星期都在忙于各自的工作，甚至好几个月我们都见不到面。

“那时，我的主要工作是《美丽夫人》。我得到了这部音乐剧在欧洲的演出权。英格丽和我都出席了在哥本哈根的晚场首演式——实际上英格丽参加了在欧洲各地举行的所有的晚场首演式。”

1961年11月，褒曼又回到了纽约，演《一个女人生活中的24小时》。这个剧本是根据斯蒂芬·茨威格的名篇改写的。在这部电视剧中，褒曼扮演一个奶奶的角色。这位老祖母了解到她年轻的孙女因为同一个花花公子谈恋爱，一生将要毁掉。为了阻止这个悲剧延续，老人把自己过去的恋爱经历讲给自己的孙女听。茨威格大师用倒叙的手法追溯往事，展开了一个有悲惨结局的故事。拉斯担任这部电视的制片人。

演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24小时》以后，拉斯安排了同褒曼合作演出的长期合同，想使她成为哥伦比亚广播网的一颗明星。这是英国电视台与哥伦比亚广播网的合作项目。拉斯和戴维、萨斯坎德作为合伙制片人。第一部电视片《海达·高尔乐》是根据名作家易卜生的剧本改编的。他们的演员阵容整齐强大：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拉尔夫·理查森和特雷弗·霍华德。对褒曼演出的每场戏，拉斯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反复地叮咛“在这一点上，你应该演得更加出色一些，声音要大一些。这里你移动的次数太多了，太戏剧性了。手不要动，别做得好像是在同意意大利人谈话似的，这是个美国剧。啊，很好……在你转过头来并且停下来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褒曼一直被海达这个悲惨的女主人公所吸引。这个剧目是个古典剧，她想换换花样，演好这个剧本。同时她也喜欢次电视剧，虽然在那个时候她限制自己每年只演一部电视剧。

拍完电视片后，褒曼对拉斯说：“我的上帝，我刚对海达有了些了解，片子就结束了。我们用3天时间拍片，已经拍完了。你知道这是很令人伤心的，因为我认为这个剧很好，有那么多东西值得向这个女人讨教。从表演艺术看，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想在戏剧中再次扮演这个角色。”

拉斯说：“好，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剧用法文本演出，我们到巴黎去公演。”

他们终于和法国的同行们开始排练这个剧目了，由雷蒙德·鲁罗导演。这样，她在巴黎剧院又演出了这个使人倾倒的剧目。反响是令人满意的。

B“世界把我变成了妓女，现在我要把世界变成妓院”——《贵妇还乡》引人入胜……

褒曼于1963年秋天到达罗马和安东尼·奎因合演《贵妇还乡》。这是由迪伦马特写的剧本，于1958年在百老汇演出后获得极大的荣誉。由艾尔弗莱德·伦特和林·芬丹主演。

由褒曼扮演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卡里亚·扎卡纳西安伯爵夫人。女主人公在回到中欧盖伦小城向塞奇·米勒（安东尼·奎因饰）复仇时慷慨激昂地说的一句话是：“世界把我变成了妓女。现在我要把世界变成妓院。”在她17岁时，塞奇·米勒诱奸了她，抛弃了他们的孩子，花钱买通了伪证人指控她，最后逼迫她沦为娼妓，并离开了这个小城。

盖伦是个很贫穷的小城。卡里亚提出要使那里的公民富裕起来。条件是要他们裁决塞奇·米勒有罪，并依法处决他。

公民们慢慢地屈服了。他们需要钱，他们深信只有把塞奇缉拿归案，他们才是纠正一个大错的好公民。

在纽约舞台上，迪伦马特的男人们和他们的公正都可以用钱收买，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价格。这个主题被评论为“一部较好的惊险小说”和“一个贪婪玩弄妇女的阴森恐怖的故事”。现在为了拍成一部广泛发行的商业片，而把恐怖情节冲淡了，但它还是极其吸引观众的。

在百老汇的演出中，塞奇这个角色被处决了。而在电影剧本中让卡里亚的性格有了某些改变，同时对惊恐万状的塞奇则做了“予以释放”的处理。

纽纳利·约翰逊写了一个剧本，把这个剧本变成了西部片子。女主人公骑车进入小城，由于作恶多端而被人枪杀了。褒曼拒绝主演这个剧本。她坚持要维持迪伦马特的原作。她总是忠实于作者的。她说，这是她选中的剧，也是她想要演的。虽然她再三坚持，他们还是删掉了好多东西，使剧情较为温和。

他们要影片没有什么喜剧味道，要把它演成一部严肃的片子，不赞成最后杀掉塞奇·米勒。当安东尼来了以后，褒曼告诉他：“在这个剧里你要被杀死的。”安东尼回答说：“我预计他们原来希望让卡里·格兰特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他们才修改了剧本。如果他们知道我要来演这个角色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我在剧中被杀掉。”

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首演式，但迪伦马特拒绝参加，并通过报纸发表谈话，说他们毁了他的剧本。

一年以后，在 1964 年，褒曼和拉斯在舒瓦塞尔村的住所的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告诉褒曼说，瑞典电影业要拍一部想让她演出的影片。自从她在瑞典从影以来，转瞬已经过去了 30 年！

这部影片由 7 个故事构成，每个故事由一位名导演负责。英格玛尔·伯格曼将导演一个故事，他们已经同古斯塔夫·莫兰德联系，让他导演另一个故事。

“什么？”古斯塔夫说，“我！我已经 77 岁了，已经有 10 年没有制片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想再回去工作了。”但是他们恳求他，说因为他是名导演，必须请他参加。后来他不再坚持了，说道：“好吧，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能去导演。你们去把英格丽找来，同我再一次合作拍片。”褒曼得知后马上说：“我去，我一定去。”他们问：“你不想知道故事的内容吗？”她说：“不必知道，你们只管对古斯塔夫说好了，我就来。”

1964 年，褒曼的女儿皮娅决定来罗马同另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她简直像个独生女，彼得和褒曼之间的许多麻烦事使她蒙受了巨大痛苦。现在她的情绪逐渐恢复了正常，她已经 25 岁了。她决心换一下环境，到别的地方住一段时间。褒曼鼓励她这样做。儿子罗勃蒂诺，他们叫他罗宾，现在 14 岁了，长得比褒曼还高。双胞胎女儿也已满了 12 岁。

约翰·奥格尔曼担任褒曼的化妆师已有十多年了，他还随褒曼去美国演出。褒曼很喜欢他，因为他非常幽默。

褒曼在拍《黄色的罗尔罗斯汽车》时，约翰·奥格尔曼正在给她化妆，这时走进来一位身着蓝色旧工作服、旧衬衣、个子矮小的人，捧着一束鲜花，递给了褒曼并对她说：“欢迎你！看到你太高兴了。”

“谢谢你，你太好了。”褒曼说。

他离开后，褒曼转向约翰问道：“上次拍片子时我好像见过他，可能是场务或是一位电工？”

“英格丽！”约翰耐心地说，“这是你的导演。他是安托尼·阿斯奎斯。”大家都开心地大笑不止。

他们开始拍片。实际上与阿斯奎斯一起工作的每一个演员都给他送过新工作服，但是安托尼不穿。他认为他的旧大衣能给他带来好运。在整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一直穿着旧装，不让好运溜走。他是褒曼所认识的导演中最友善和彬彬有礼的人。他是那样有趣，甚至他被电线绊了一下险些跌跤时，也要转过身来说一句：“噢，请原谅我。”在他需要配角时，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想打扰你们，无论如何请你们喝完茶后，等你们有点空时，请走过来站在我的背后，因为我需要你们几位站在那里，先生们，别着急。”

接下来便是雷德格雷夫从伦敦打来电话：他在吉尔福德又开了家剧院，他希望第一个剧目能演根据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村居一月》改编的剧本。问褒曼能不能扮演女主人公纳塔利亚·费得罗夫娜，他自己扮演米哈依·雷基丁。褒曼拒绝了。

“很对不起，迈克尔，拉斯和我不想在夏天演出，这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们要一起到岛上去消暑。如果有什么要拍的，我们只能留在冬天干，从来不想在夏天……”

这时拉斯走了进来，听到褒曼说话。他从褒曼手里接过话筒说：“迈

克尔，把剧本送来，因为这个剧本对她再合适不过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褒曼看着他说：“可是我们说好夏天 3 个月不工作，不是吗？现在你愿意去英国，并在这个剧里扮演角色吗？”

“是的，我不愿被人指责，我是你的绊脚石。这是个极好的剧目，是屠格涅夫的名篇，在吉尔福德演完以后，你还可以去伦敦演出。如果你将来一旦说，要不是为了我，你定会在伦敦演出的，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何以对答呢？”

褒曼没看过这个剧本。但拉斯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古典剧，描写一位美丽的中年已婚女人，在她一生中第一次爱上了 21 岁的小伙子。他知道褒曼会喜欢这个剧的，不愿意阻拦她，这是他的大度。但是褒曼却有一种感觉，可能时间会拖得太长。一部电影只用两三个月，但是如果一个舞台剧演出获得成功，那么要花 7 个月的时间，排练至少 1 个月，接着是 6 个月的演出合同。拉斯亲口说过，任何演员如果提出少于 6 个月的合同，他是从来不接受的。

尽管如此，褒曼仍然读完了这个剧本，而且非常喜欢。于是，她去了吉尔福德。通过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她会见了德克·博加德。他认为褒曼住在吉尔福德饭店有所不便，因为每天都会碰到她的热情观众，会妨碍她的演出。他坚持要她到他的乡间别墅去做客，他和他的经理以及友人托尼·福伍德都住在这所别墅里。

吉尔福德乡居的日子是褒曼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不久，他们带着这个剧目去了伦敦。一连 8 个月，伦敦剑桥剧场座无虚席。

C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突然出现在剧院里，没有警卫，也没有警察……

他们在伦敦取得的成功与人们曾在几部影片里看到过褒曼这样一个事实是有关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说：“我记得她在《插曲》和《卡萨布兰卡》中的表演。她现在仍然在演吗？她现在一定有 105 岁了。”他们为好奇心所驱使。一个找褒曼签名的人告诉她：“你是我母亲最喜爱的名角。”一听到这句话，她顿时觉得自己似乎老了 20 年。

在伦敦演出期间，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晚上，在后一排座位的边上有两个空座，灯光刚暗下来，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坐在那个座位上。马上服务员就交头接耳地说：“那不是女王来了吗？是的，一定是伊丽莎白女王殿下。”

自然人们说话的嘈杂声很快就传到了后台，但是没有人给剧院来过电话，没有打过招呼，更没有警察和保卫人员。女王会就这样走进来，坐在走道旁的座位上吗？

经理打电话给剧院的老板埃米尔·利特勒尔，然后他打电话给白金汉宫问私人秘书，或一位皇族侍卫官，对方说：“今晚是女王的休息时间，她每个月有一个晚上自行支配时间，她可以早睡觉，或是找朋友聊天，或者做她想做的事。”

这样，埃米尔·利特勒尔召来了摄影师以备万一。中间休息时，他走下去陪同女王和她的女侍从来到一个小接待室。女王郑重地说：“告

诉演员们，因为我不工作，不准备到后台来。今晚是我休息的时间。但是请转告演员们，我非常欣赏这个剧。”

她一直看到最后一幕。他们大家感到，有女王和他们一起度过她的休息之夜确实太令人高兴了。

D 水银灯下是他们的主战场。拉斯跑遍了世界各地，而她在伦敦演出《村居一月》，第二年在罗马照顾伊莎贝拉，同年秋季开始用6个月时间演出《巍峨庄园》。当然，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他们都用电话保持联系，写信或者丈夫飞伦敦、纽约、好莱坞，但毕竟不是美满的婚后生活。她认为他们俩人都接受了这种生活，但是并没有注意到潜伏的危险。丈夫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比她年轻多的姑娘……

莉安娜·费里第一个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英格丽，你把你们的婚姻生活弄得这样紧张，你确实认为你有必要做那么多工作吗？”

她说：“我不能没有工作。这是我的生活！”

褒曼嘴里虽然这样说，但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意识到这种危险是从《村居一月》开始的。当然在那段时间里，她仍然常和拉斯见面：他来到吉尔福德参加演出开幕式；他来伦敦进行访问。褒曼有时飞往舒瓦塞尔去度周末，星期天早上飞去，星期一下午又飞回，搞得非常紧张。按道理讲，她是不可以去的。因为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离开伦敦去度周末只能在离伦敦若干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她不能按时返回剧院进行星期一晚场演出的话，就会被控告不遵守合同。

经过非常认真地考虑之后，褒曼知道必须决定，今后她应该怎样生活，是坐在舒瓦塞尔等着拉斯下班回来呢？还是到剧院去演出？她是个演惯了戏的人，她下定决心再有什么演出她还是要去。

然而她知道，而且也得到过警告——使她伤心的是拉斯在所有的信中总是真真假假地对她说：“我太寂寞了。”“你总是不和我在一起，我独自坐在这里，太没意思了。我又不能等你回来。”“请和我呆在一起吧。”但是他很了解褒曼，知道她愿意工作。另外，他也经常外出旅行，他在西德、瑞典、丹麦都经营公司，每次回家最多住一个星期就要走。褒曼呆在乡下，尽管景色美丽，但却十分寂寞。

当褒曼在纽约执行《巍峨庄园》的演出合同的时候，凯·布朗给她送来一本雷切尔·马多克斯著的小说《春雨中的漫步》，她很喜欢这本小说。她认为能找到一本描写一位50岁妇女的小说是很不容易的。这位妇女的丈夫52岁，但她却爱上了一个比她年龄更大的老头子。

凯告诉她，曾因《炎热的夜晚》剧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斯特林·西林费恩特对此很感兴趣，他来看褒曼并同她进行了讨论。他说：“我被这本书迷住了，我想自己来制片。我过去虽然没制过片，但我不愿意让别人插手。”

褒曼结束了《巍峨庄园》的演出，准备回法国，然后和拉斯一起去海岛。因而褒曼邀请斯特林和他的妻子到岛上来玩。

他们进一步谈了剧本的事。斯特林已着手根据《春雨中的漫步》一书写脚本。哥伦比亚公司愿意支持影片的拍摄。理想的外景地也已找到。

这部片子预定为1969年准备拍摄的片子中的一部。褒曼回到了舒瓦塞尔。米盖·弗兰科维奇从贝弗利山打来电话：

“英格丽，我已经获得《仙人掌花》剧本的制片权，我特别希望你来主演。”

褒曼久久地沉默着。

“我已找到沃尔特·马豪，由他扮演牙科医生，戈尔迪·霍恩扮演他的女友。”

“是的。”

“我似乎听得出来，你在犹豫不决。”

当然他能听得出来。褒曼已经看过这个剧本，当时宾基·波蒙曾经要求她在伦敦剧院上演这个剧，由于她不想再长期离开拉斯而拒绝了他。

“是的，我在犹豫。”

“为什么？”

“牙科医生助手的角色由一个 35 岁的女人来演。”“那又怎么样呢？”

“我 54 岁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

她笑了笑说：“米盖，我认为你最好来巴黎，先看一看我现在的模样再作决定。我决不会介意的。”

米盖和他的导演吉恩·萨克斯终于来到了巴黎。当他们和她见面时，她有意站在明亮的灯光下，米盖笑着在她周围来回踱步，从各个角度仔细审视着她，接着他说出了他的结论：

“英格丽，你太能胜任了！先告诉你，让你早高兴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参与呢。”

他确实是一位好摄影师。他的技术精湛，后来在拍《春雨中漫步》时，褒曼也坚持要他拍摄。由于主要演员安托尼·奎恩正忙于拍片，所以《春雨中漫步》要等奎恩结束手头工作后再拍。于是 1969 年褒曼将在好莱坞拍两部影片，几乎连休息的时间也被占用了。

米盖·弗兰科维奇说：“沃尔特·马豪是个出了名的固执己见的人。但是就在褒曼抵达以前，他显得心情不安，不停地向我唠叨，‘你认为我们会处得来吗？她会喜欢我吗？’”褒曼确实是喜欢他的。他们 3 个人，褒曼，戈尔迪和沃尔特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影片拍完时戈尔迪说：“她是一个最典型的女人。我意思是说，她具备作为真正女人的一切条件。她是那种使男人不会感到害怕的女人，因为她是那样热情。我原来以为我会怕她，甚至恐惧她，简直无法一起工作，结果证明完全相反。我觉得自己无须与她对立。只感到能同她合拍一部片子是荣幸的。她有王室风度。她未能成为某个国家的王后是件憾事。”

第十六章 癌症威胁下的阴影

A 58岁的她似乎已经疲倦了。这两年她还会为自己的生日搞点庆祝活动，再演两年，她就想从舞台上消失。人老珠黄乃是人生的规律，她不免有悲戚之感……

报纸连篇累牍刊登了大幅广告：“坦南特荣幸地宣布，由英格丽·褒曼，约翰·麦卡勒姆，巴巴拉·费里斯，迈克尔·艾莉森和陶尔赛·雷诺主演，约翰·吉尔古德导演的《忠贞之妻》一剧，自9月29日至10月6日上演以来，首创阿尔贝丽剧院最高票房价值。”可是《太阳时报》的影剧评论员霍普森却用他的巧舌贬低褒曼：“英格丽·褒曼的口音很像学说英语的外国人，怎能让她演一个英国女人呢？”然而英国《戏剧报》却称颂说：“《忠贞之妻》太妙了！”《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是：“一次不寻常的演出。”

在化妆室接受采访时，褒曼告诉记者先生们说，她已经58岁了，岁月不饶人，上了岁数的人总会有悲戚之感，在今后的两年里，她还要庆祝自己的生日，以后，就宣布不再登台演出了。戏剧界在发生变化，且日新月异，花样翻新，这个剧是老式的，但是老瓶装新酒，她都难以理解。过去她只演严肃剧，当然能听到观众放声大笑也是件好事。

关于同拉斯的婚姻即将破裂的传闻，她淡淡一笑，说：“我们会很好安排的，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B 她与拉斯正准备和平分手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她恐惧和震惊，医生发现她有乳腺癌的症状。她只好打电话给在巴黎的拉斯……

褒曼刚从剧院归来，在蒙特大街的饭店里躺在床上看报。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女读者写给报社的信，信中说她是怎样从杂志上了解乳腺癌的症状的，多亏这篇文章的提醒，她及时进行了治疗，不然她可能现在已经拥抱上帝了。

那段时间，有关乳腺癌的报道屡见不鲜：福特总统的夫人是怎样进行乳腺癌手术的，洛克菲勒夫人也正在接受手术治疗。报纸提醒成年女人都应当进行普遍检查，无论多么小的一个肿块，后果都会是严重的。一边读着报上的文章，她下意识地摸触自己的乳房，她的手停住了。心想，啊，上帝！不，这事绝不会与她有关的！这太可笑了，这不会发生自己身上。

她立即给在巴黎演出的拉斯打了电话。他温和地说：“你必须去医院找医生检查，明天就去，一刻也不要耽误。”

“我正在演出，演期又长。在这些日子里我无法分身去干别的事。”

但她确实去拜访了一位医学专家，医生一再提醒她说：“嗯，你必须采取措施，但是不必慌张。”

《忠贞之妻》正在演出期间，拉梅特前来拜访褒曼，要她在根据有“侦探女王”之称的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改编的电影中担任女主角。艾伯特·芬尼扮演著名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尔·波罗，悉德尼还找到了10多个一流明星来分别扮演其他角色。他在吃晚饭时告诉褒曼，他组织了出色的剧组：劳伦·贝考尔、万尼萨·雷

德格莱夫、杰奎琳·比才、萧恩、康纳里、约翰·吉尔古德、温迪·希勒和其他影坛名流。

“我要你扮演那个绝色的俄罗斯公主。”

他把剧本送给褒曼，她看了以后觉得自己喜欢那位瑞典女传教士，希望能扮演这个角色。

悉德尼说这个角色对褒曼不理想。她回答说：“在整个故事中是艾伯特·芬尼扮演波罗，其他演员的表演分量都差不多，人物的描写既简单又清晰，我想，我能演好这个小角色，也一定会表演得滑稽可笑的。如何表演好这个女传教士，我有很多想法，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最后，悉德尼还是同意了。

他们大家相处极为融洽，他们当中许多同行每天晚上还要在剧院演出，大家都在忙碌中愉快地生活着。

格里夫对褒曼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她总想有标新立异之举。

《忠贞之妻》在演出8个月后，进行最后几场演出。导演223

举吉尔古德来到包厢对褒曼说，谢幕之后请大家都呆在台上，他想和每一位同仁告别。

演出结束时，他来到后台，面带微笑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有些地方我想再改一改。”这时已经演出8个月了，再演两天就完成了合同规定的演出日期。

演员们纷纷对约翰说，别再改了，已经演了8个月了，还改什么？然而褒曼不是这样，她对改戏立刻产生了兴趣，愿意尝试一下。即便演出只剩下日场、晚场这最后的两场，她也还想修改一下自己的表演。每修改一次可以从中探索艺术的活力，也许还有一点新意。艺术总是在探索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

结束《忠贞之妻》的演出后，褒曼又去看望了那位医学专家。她说：“现在演出终于结束了，我想回美国去，找位美国医生再仔细检查一下，同时看看女儿皮娅。”这位英国医学专家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皮娅在纽约电视台工作，结识了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名叫乔·载利，长得很帅。他俩婚后已有了第一个孩子。

褒曼终于飞回美国纽约了。她欣喜万分地看望她的第一个外孙。出人意料的是，外孙出生时，除了罗伯托在场以外，拉斯这时也凑巧在纽约。他们俩人从未谋面。用罗伯托的话说，这是水火不容的情敌。罗伯托是来看在纽约工作的伊莎贝拉的。小女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对母亲说了。

有人看到罗伯托和拉斯肩并肩地站在玻璃隔间外，目不转睛地看着皮娅的小儿子。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摄影组来到这里，为他们出色的记者皮娅和她的儿子拍照，也给围观的陌生人拍照，却险些放过了这个正被他们遗忘和丢失的、可以抢先发表的头条新闻。

他们二人相互十分友善，且待之以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女儿伊莎贝拉笑着说：“他们互相给对方开门。‘罗西里尼先生，您先走。’‘不，您先走，施密特先生。’他们互相敬烟，还有：‘您坐第一辆的士，施密特先生。’‘不，第一辆车一定要让给您，罗西里尼先生。’‘好吧，如果您一定这样客气，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在汽车发动时，罗伯托坐在车里看着女儿伊莎贝拉，笑着骂道：“让

他的肺部发炎吧！”

这可能是当天在纽约的最有趣的新闻了。

褒曼去见了美国的医学专家。他直言道：“你要马上去医院动手术！”这是褒曼十分害怕听到的忠告。怎么办？6月11日她要为拉斯举行生日庆祝晚会。还要去瑞典买别墅，接着还要为他们的朋友汉斯·奥斯蒂里西斯举行晚会，他是跟他们去远东采访的随团记者，他70岁生日，现在住在葡萄牙。那是6月15日。只有在这以后她才可以动手术。她把上述日程安排告诉了医学博士。

医生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能往后拖呢？太荒唐了，马上住医院，今天晚上就入院！”

褒曼说：“不行，绝对不能马上住院。我来纽约有好多事要办，等我把这些事情办完才能去医院。”

他说：“我要和你在伦敦的医生谈话。如果你不愿意明天在这里动手术，那你必须马上飞回伦敦去。我现在就和你的医生商量好。”

他拨通了电话，褒曼能听到他们在谈些什么。接着，他把话筒递给褒曼手上，英国专家说：“喂，我同意我的同事的看法，你把动手术的时间拖得太久了对你不利，你应该立即飞回伦敦。”

“我马上回不来，因为明天要和女儿皮娅和我的外孙子到公园骑自行车，我还不想在哪儿开刀。要开刀的话，也要去伦敦医院，那里离拉斯和孩子们近些，好照应些。还有，拉斯的生日庆祝会不可能改期。”

她放下了话筒，那位美国医生火冒三丈地说：“到底什么重要？是你丈夫的生日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她却说：“丈夫的生日庆祝晚会重要！”

医生恼怒已极，不愿再和她说什么了。她离开了专家那里。她如期给拉斯举办了生日庆祝晚会，一同去看了新购置的瑞典避暑别墅，不过只在那儿住了一天。她没能去参加汉斯在葡萄牙举办的生日晚会。而是住进了伦敦一家医院。她的手术正是在汉斯的生日那天做的。

罗伯托让3个孩子到伦敦这家医院来看望她。女儿皮娅也从美国来到了她的身边，拉斯来医院守护她。由于麻醉针的反应，她头昏目眩，十分难受，她哭了又哭。她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两只胳膊也交叉机械地紧贴在胸前，她自己无法动弹。据后来医生说，这是一种来自大脑的自卫性反应，意思是说，不准医生再切她的肉了。医生来了，她能一眼看出医生的内心隐情。她很同情医生。告诉动手术的女人，说她们上身的某个部分被切除了，这是件十分恐惧的事。

这次手术并非如褒曼想象的那样可怕，孩子们都守护在她身旁，给她一种无形的力量，给她安全感。

她无法否认，动手术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确实不想再照镜子了。她想，如果她是个妙龄女人，她会感到百倍的痛苦。

在进行化疗以前，她回到舒瓦塞尔村住了两周，以恢复一下体力。

两周以后，她返回伦敦进行化疗。医生们告诉她，化疗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会感到疲倦，恶心，呕吐，精神变得消沉。她简直不想再活下去了。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轮流守护她，安慰她。化疗以后，她总是倚在孩子们的身上，回家后就上床休息。

后来褒曼又回到舒瓦塞尔村休养。起初，她连汤勺都拿不稳，胳膊

也举不起来。由于坚持经常性的锻炼，各部位的肌肉逐渐恢复了功能。她在衣柜门上做了铅笔记号，记录胳膊每天能举多高。她还下到游泳池坚持游泳。由于坚持锻炼，不到两个月光景，她几乎能把胳膊举到正常人能达到的位置，且自我感觉良好。

她进医院动手术的事，只通知了她的几位挚友。

第十七章 亲切的怀念和眷恋

A 人们对她的记忆，怀念，关切，爱心是她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1975年1月，褒曼自我感觉极好，她前往美国巡回演出《忠贞之妻》。格里夫任她的剧团经理。格里夫对她进医院动手术一事全然不知，她毫不费力地瞒过了格里夫。

他们在洛杉矶举行了首场演出。这个新组建的美国剧组是在纽约排练的。马蒂·史蒂文斯是剧组的成员之一。

排练场设在地方很不起眼的第九街。约翰·吉尔古德爵士担任导演，这时褒曼像一阵旋风似的来到了他们中间。她没有化妆，进来之后就带来了笑声。“噢，你们好，我迟到了10分钟。”她的一举一动激起了人们的深情回忆：“她是那样热情，使我们的排练有了一个良好的祥和的开头。接着是午休，隔壁有个舒适的地方。室内设有专为演员们准备的桌椅，哪里有座位，大家就坐在哪里。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种生活。我们要进行的是一次长时间的巡回演出，从洛杉矶出发，接着去丹佛、华盛顿和波士顿。当时决定不去纽约。后来还是去纽约演出了，这完全是为了英格丽·褒曼一个人。

“对于她，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要她一登台，立刻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她在银幕上的表演也是如此……对褒曼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她的魅力在于能在舞台或银幕上，把她的精湛艺术全部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她没有任何做作。在她的身上，你会有一种眩惑之感。无论在酒吧间，在大街上，或在任何地方，她都显得魅力超群。你无论把她放在何处，她永远不会被湮没，她总是引人注目，光彩照人。

“你会碰到许多人：20至150岁以下的各式各样的人，你喜欢他们，但你和他们仅能维持在相识的水平上，就像坐火车经过的大小车站，你熟悉这些车站，但又不想在某一特定的车站下车。在你的生活里能终生影响你的只有很少的人，可谓寥寥无几。而她像一种能激起情感的化学元素。她又像是位一见倾心的朋友，同她在一起你会有安全感，不必存有任何猜疑，你将得到的是无穷的乐趣。英格丽生性幽默，情趣无穷。在她看来，任何一件小事都值得欢笑和庆祝，她总是在寻找着人生的真正欢乐。不论发生任何大事小事，都会在她身上引起童贞般天真的喜悦和欢愉。‘现在工作完了，如果找不到去吃晚饭的地方，咱们就在烫衣板上聚餐。’‘我们在这儿演出结束以后，咱们把酒都喝完，这样就不用带着酒去下一站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享受一番呢？’这里讲的享受，内容广泛，几乎是人世间包罗万象的一切。

“她像一台发动机，只要发动就转个没完没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还有那种笑声——噢，那种笑声。这种笑声是从她的心底迸发出来的，像是一串串的水泡在水底徐徐上升，突然间，升到空气之中爆发。她又像一股强大的激流，能把任何人都卷入漩涡，有如尼亚加拉瀑布那样不可抵挡。是的，这确定是一次永生难忘的巡回演出。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格里夫……”

格里夫回忆说：“英格丽最令人难忘的是从来不摆大明星的架子。在洛杉矶演出时，舞台上有一把古老的沙发椅。演第二场戏时，她着装

整齐，准备参加阿斯科特竞赛。她准备和想成为她的情侣的保罗·哈丁一起去参加竞赛。

“她坐在那个沙发椅上，而这个沙发椅摇摇晃晃，很不牢靠。我有些担心，我以为他们已经把它修好了。

“突然弹簧塌陷，她掉了下去，膝盖顶住了下颏。她哈哈大笑起来！自然观众也随之哄堂大笑。更糟的是，她必须爬起来，最后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还在舞台上踱着步子。我站在舞台侧面正在想着，这会儿，她不会再去坐了吧？甚至她自己也明白，不能再往那里坐了！但是由于排演得非常顺利，她忘记弹簧已经坏了，又往椅上一坐，这一次她又陷进沙发不见人影了。观众大笑不止，享受了他们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刻！简直可以在出口处再收一次钱了！

“她认为这一切非常好笑，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名女演员身上，定会娇气十足，大发脾气，并要求把有关责任人员除名，而她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件极普通的小事。

“这也是我的过失。我负责最后检查道具，我以为沙发钉牢了。同她一起工作最放心的是，如果什么事安排错了，或出了什么事故，她从不生气。她知道一个人有时总会有些闪失的。

“记得那时我们刚开始在美国巡回演出。我们已在世纪城的‘舒伯特’剧院演出有两三个星期了。一天，一位演员告诉大家，从这里走10分钟的地方，有一家法国饭馆。于是，在星期六日场结束后，我们决定去吃一顿。英格丽中途绊了一跤，扭伤了踝部，我们只好搀着她回来。

“正是星期六晚上，我们找不到医生；后来终于找到了医生，医生告诉我们，她脚上断了骨头，要给她的腿敷上石膏。我问：‘她还怎么登台呢？’他说：‘我是医生，必须这样做。’我给剧院经理打电话说：‘褒曼今天晚上不能演出了。’经理着急了，‘但她必须演出。我们的票全卖光了！如果请观众退票的话，票房的现金不够。现金早送到银行入库了！’

“英格丽突然说：‘我准备上场！’我说：‘你怎么能行呢？当时连轮椅都找不到。’她坚持说：‘我要上场！’于是，全体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安排了每个人的戏和场次。与此同时，经理走到台前向观众宣布说：‘很遗憾，褒曼小姐脚上一块骨头摔碎了，至少需要1小时后才能演出。如果有人想退票，请便好了。’

“观众全都进了酒吧，没有一个人退场。我们晚开演了一个半小时。所以这样长，是因为要等敷上的石膏干燥。幸运的是，这场戏里有个男厨工，英格丽敷着石膏坐在轮椅车上，由这个男厨推着轮椅车上舞台。她坐在台中央，随着轮椅转来转去，同每个上场的演员聊天。完全改变了原来设计的演员舞台动作，演员们居然在台上互相推推搡搡，妙趣横生。英格丽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观众们看得入迷了，还以为戏中有戏，十分欣赏英格丽那天晚上的精彩表演。

“演到最后一场了，我们终于找到一辆轮椅车，把她扶上去。结尾时，台上只剩下两个人，“丈夫”和英格丽。英格丽的台词说：‘现在我该走了’，然后退场。我在台上独白说，‘现在你要像个小姑娘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等我们去把幕落下来就行了。’但她没有老实地坐在那里，她转动椅子朝门驶去，但轮椅却没有对准门，几乎把整个布景撞倒

了，书架上的书全都撒落在地上，观众呼喊狂笑不止。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高兴过。此时演员们登上舞台，英格丽也乘轮椅车登台再次亮相，观众们的情绪沸腾了……坐轮椅车的英格丽在美国各地进行了五周的巡回演出。

“我们终于找到一位著名的骨科医生。他的医技高超，专门为纽约的‘美国佬’棒球队队员受伤后接骨，他去掉了英格丽脚上敷的石膏用绷带紧紧裹住。这位医生最后说：‘我想你现在不用轮椅车可以行走了。’英格丽居然上瘾了，喜欢坐在轮椅车上让别人推着表演。这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尝试。她说：‘现在，我想我应该按新的办法表演了。’她在华盛顿又坐在轮椅车上演出了一周。

“到那时，人们都知道她曾经坐在轮椅车上演出，她恢复正常演出后，说来奇怪，却不如她坐在轮椅车演出时那么受人欢迎。于是她决定谢幕时坐轮椅车，观众竟为她喝彩不止。他们就是专门来看英格丽·褒曼坐轮椅车的风姿的。她确实是个又热情又爱开玩笑的女人。至今我还想不出我的同行中有第二个这样的女人。”

《忠贞之妻》巡回演出时，褒曼在道白中出了两次“有纪念意义”的失误。第一次失误是：“你撒谎，是骗子，是牛皮大王。”被她说成：“你撒谎，是骗子，是汉堡包！”第二次是在最后一场，女主人公要离开她丈夫时说的话。丈夫低三下四地问：“我应该准备什么饭菜呢？”女主人公生气地回答说：“厨师自己有脑袋，你就甭管了。”而在那天晚上却被她说成了“把你的脑袋给厨师吧，你就甭管了。”全场竟掌声雷动。

在波士顿演出时，传闻在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上琼·伦努瓦将被授予特等奖。琼在家里卧室，他要褒曼去替他领奖，否则，他宁愿不接受这个特等奖了。在“奥斯卡金像奖”授奖仪式上褒曼做了简短发言，发奖仪式通过电视播放，琼在自己家里就能看到。在讲话中褒曼颂扬了他的表演艺术富有强烈的个性特点，说他有奔放的艺术热情和热爱人类的崇高品质。她把获奖证书和奖杯交给琼·伦努瓦时说：“感谢你，琼，是你教育培养了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给世界千千万万的观众以艺术享受。我在这儿和他们一道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你，我们尊敬你，琼。”大家为她的一席衷言鼓掌不止。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奖。因扮演《东方列车谋杀案》中的瑞典传教士，褒曼被提名获奖。她也曾因扮演影片中各个角色5次被提名为大奖候选人，也因主演《煤气灯下》和《安娜斯塔西亚》两片获过这项奖。对于任何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都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传教士这个角色实际上只有一场戏，在这场戏里，她解释了作为一名女传教士的职责，应如何以爱心对待婴儿。

瓦伦丁娜·科蒂斯在影片《颠倒乾坤》中演技出色，褒曼认为她会获奖。获奖人名单宣布了：“英格丽·褒曼获《东方列车谋杀案》最佳女配角奖。”

她急忙跑上台去说出了她的想法：“这样做太不公平。我希望这个奖应该授予瓦伦丁娜·科蒂斯……她应该得到这个荣誉。”这时聚光灯，

英语 humbug 是“牛皮大王”，而 hamburger 是“汉堡包”。英格丽说走了嘴。

摄影机纷纷向瓦伦丁娜照去。她起身向褒曼飞吻，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当然，电影界所做的决定本是无私公正的。那天晚上，瓦伦丁娜和褒曼相聚多时，她们一起照了相。褒曼为瓦伦丁娜没能获奖而难过和不平。

B 她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她想完全摆脱这种婚姻关系，离婚势在必行，对此她毫无怨恨。她和拉斯终于离婚。这次离婚是秘密进行的；就连她的朋友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也许这是一种解脱……

褒曼要求离婚，原因是她要求把界限划得很清楚。她知道拉斯想要个孩子，而她不愿意让那个孩子再来指责她不让他的父亲离去。拉斯的大儿子死于一起意外事故。他们结婚时，褒曼年岁已大，不能再给他生孩子了。他甚至提出过抱一个婴儿，而她已经有了 4 个孩子，尝够了这种滋味。她现在已经够忙的了。她的婚姻虽已完结，但是她的事业并没有完结。

C 她就像吉普赛人，经历着动荡的人生之旅，大篷车滚滚向前，狗在吠个不停……

“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一个小巧、亲切，只有客厅大小的剧场搬到肯尼迪中心这样大的场地，会有什么样效果？”马蒂·史蒂文斯说，“我意思是说，肯尼迪中心的剧场太大了，后排的观众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到舞台。然而，英格丽主演的《忠贞之妻》场场爆满，创了历史票房记录。甚至比《美国的夫人》上座情况都好。我们又前往波士顿城演出，英格丽抽空领回了她荣获的第三个奥斯卡金像奖。接着，英格丽做了一件我认为是特别慷慨的事。我们在美国各地都售出了全部戏票，但并未受到新闻界的青睐。报纸评论有一些，但并不热情。巡回演出开始时，我们并没有预定去纽约演出。但为什么英格丽要去呢？她以前去过那里。她十分富有。去那里演出，可能不会受到新闻界的关注，甚至还可能被轻蔑和嘲讽。但她还是同意到纽约“舒伯特剧院”演出一个月。为什么呢？原因只是剧组里有许多演员从来没在纽约演过戏，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到纽约演出。美国演员在纽约演出，同英国演员在伦敦西区演出一样，都被认为是一种殊荣。‘人们会在百老汇看到他们的演出，他们还可能找到别的工作的机会。’英格丽说。于是我们去了纽约，并在“舒伯特剧院”愉快地演出了一个月。”

评论家们都不太热情，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克莱夫·巴恩斯在《纽约时报》上说：“褒曼小姐，容光照人，神态高傲华贵，看上去不到 36 岁。但是随着她年岁的增长，她演的角色减弱了剧的力量。”

《剧艺报》在采访褒曼时，要求她谈谈对那些评论的看法，她说：“我像吉普赛人那样。大篷车在滚滚前进，狗在旁边吠个不停。对于这些事我不过于计较。我在电影和戏剧里扮演的角色和我的私生活都受到过批评。批评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如果我让它影响了我，那我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到百老汇演出《忠贞之妻》，自己确实产生过疑虑。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评论家说长道短。他们把《忠贞之妻》说成是古老的、刻板艺术，但它的内容并未过时。这是 49 年前写的，但却适用于今天。

至于剧中人物的年龄，康斯坦斯·米德而顿不一定非要 35 岁或 36 岁。当今女人的浪漫生活到 40 岁并未结束。康斯坦斯完全可以是 50 岁或者甚至是 60 岁。这一点我还没有一个标准，她也可能是 70 岁。”

1975 年秋，褒曼去罗马拍片，片名是《时间问题》，是根据畅销小说《记忆中的影片》一书改编的，情节是真人真事。它讲述一位名叫康特萨的老妇人，年轻时相貌绝美，是位名妓，曾诱惑过无数风流的艺术家，而现在则孤身一人独居于罗马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成天在回忆她那风流浪漫的往事……

梅斯买下了这本书的制片权，但始终没能拍成影片。文森特·明尼里终于财星高照，获得了拍片权利。他的女儿莉莎，查理士·博耶和褒曼分别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褒曼很喜欢莉莎，也高兴再次和查理士·博耶合作。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参加拍片工作也感到高兴：小英格丽管化妆，伊莎贝拉扮演一个照应修女的配角。这部影片的摄制过程只有 14 个星期，但一直未能上演。

凯瑟林·卡罗尔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同意多数评论家的意见：“这部影片非常不恰当，都老掉牙了，还费了那么大劲拍成了电影，不发行还会更好一些。”这部影片在美国确实没有一点反响，也从来没有在英国和法国放映过。在褒曼的艺术生涯中这也是一次不小的失败。

D 罗伯托终于带着痛苦、烦恼、矛盾离开了这个众说纷纭的世界……

1976 年 5 月上旬，褒曼在罗马要呆整整一星期。罗伯托的生日是 5 月 8 日。到 7 日那天，罗伯托难过地说：“听说你明天要走？”

“对，我要走。”

“你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要满 70 岁了。”

“我知道，我不得不走，而且走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或许我们今晚就聚一下：小英格丽、伊莎贝拉、你和我。罗宾在巴黎随拉斯在剧院工作。所以他不能参加，就我们 4 个人，今晚庆祝一下好吗？”

他有些懊丧，他的情绪十分低沉，似乎大家都忘掉了他。在 5 月 8 日那天，报纸一反常态地发表大量颂扬他的文章。他们全都记得罗伯托·罗西里尼 70 岁了！他对此感到欣慰。

他生日那天早上 9 点钟，褒曼拿起了她定做的花环。花商们弄不明白，她订的花环是在配戴在他的头上，而不是放在墓地上。褒曼和女儿们来到了罗伯托的寓所。他穿着睡衣开了门，说道：“啊，又是你来了，我以为你已经走了。”他们一起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祝寿歌，女儿把花环戴在他的头上，他坐在沙发中间，一边一个女儿护着他。这只祝寿的花环，甚至枯干了他也始终没有扔掉，他很珍惜它。

“好吧，再见吧，我现在要走了，”褒曼对他撒了个谎，其实她已经在他最喜爱的饭店里设了晚宴。她订了一个单间。专门叫饭店安排了一个“U”形餐桌，上面堆满了玩具美金和里拉——他们把这些漂亮的玩具纸币与美金、里拉粘成了一幅大桌布。

褒曼离开以后，孩子们随即说：“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去你喜欢去的饭店用晚餐吧。”

罗伯托随女儿进入这家饭店的单间，直到走近桌前，才觉察褒曼和他姐姐，侄女们，孙儿孙女们，第一个妻子，全家人都在等他。他看着褒曼激动地说：“啊，是你安排的！”

接着是致贺词，这是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起草的。这是一个十分幽默的贺词，他们精心挑选了许多他平日怒发冲冠时爱说的话：“把嘴里的面包屑都拿出来给了孩子们，”等等，大凡他用过的夸张词汇都写进了贺词。女儿们颇为担心，怕伤害他们的爸爸的感情，褒曼说：“不会的，我比你们更了解他。他会高兴的。”

伊莎贝拉读完贺词，罗伯托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笑得泪水夺眶而出。他又让女儿念了一遍，并把贺词带回家嵌入镜框，挂在卧室的墙壁上。

褒曼还使用了导演技巧，把儿子罗宾从巴黎召回来，让他穿着堂倌的白色大褂，拿着菜单走近席前。罗伯托接过菜单，一点也没觉察是自己的儿子罗宾。过了一会儿，父亲还是没有认出儿子，罗宾忍不住了，“爸爸！是我！罗宾。”他这一来，这场喜剧才宣告结束。

罗伯托激动地抓住儿子的臂膀，把他搂在怀里，越过罗宾的臂膀，罗伯托两眼温和地盯着褒曼。这温和的目光使她感到亲切，同时也意识到她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是一个难得的欢乐之夜。褒曼回忆往事，觉得在意大利度过的日子是难忘的、珍贵的。意大利人慷慨大度、热情坦率，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自生日聚会后，她第二次见到罗伯托是非常偶然的。9个月后，1977年春，褒曼去舒瓦塞尔别墅。在这所别墅里除了两个仆人以外，什么人也没有。一桩桩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失误，争执，欢愉，一一涌上心头。

她无法再忍受这一切了。于是她前往巴黎，下榻在“雷菲尔”饭店，可真是“冤家”路窄，在那儿她又碰到了罗伯托。

罗伯托知道她当时心情不好，带她外出吃饭。饭后，为她送来了杯热水和感冒药。罗伯托已察觉她因离婚而感到的烦恼，知道她在痛苦地回忆过去。

第二天，罗伯托又带褒曼去用午餐，他说：“英格丽，不要回首往事了。如果你老是沉溺于过去，你会患精神病的。让过去的事一去不复返吧！向前走，莫回首……”他吻了她一下就驱车去机场了。她万万没想到，从此再见无缘了。

分别两个月后，罗伯托在5月间还给褒曼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她正在“奇切斯特剧院”演出《月光似水》一剧。基思·迈克尔挚意要褒曼主演，由约翰·克莱门茨导演。

罗伯托以评奖团主席身份应邀出席戛纳电影节。“你想要我观摩所有的影片吗？”他说。褒曼笑了起来，“自然应该看，你是主席嘛。1973年，坐评奖团主席的是我，我认为电影节最愉快的事就是观摩所有参赛影片。”

那次罗伯托对褒曼说，他感到很疲倦，如果能回到罗马的别墅去就好了。他们边谈边笑地聊了一阵，他挂上了电话。

奇切斯特是苏塞克斯的一个美丽而古老的英国小镇。褒曼和鲁思租

用了一所乡间别墅。汽车约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别墅，她还租了一辆车自己开。晚上7点钟开始演出，但她开车到得很早，因为她在演出前要休息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要保持绝对安静，不打电话，也不同别人闲聊，以养精蓄锐，准备进入角色，她在剧中扮演海伦·兰卡斯特，一个45岁的女人。

她们找了一个女仆每周到别墅来打扫卫生。这个别墅很小，她们3个人同时呆在里面显得不方便。每当女仆上门打扫卫生那天，褒曼和鲁思就去一家乡村小馆用午餐。

1977年3月3日，她们回到乡村别墅后，女仆已经离去。桌上放着一张留言，说菲奥雷拉从罗马打来电话找褒曼：“请速给罗马去电话，孩子们都好。”褒曼心里很感激她，因为看到这样的留言时，往往心脏都会停止跳动。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们，难道哪个孩子有什么不测之事吗？

她当即给菲奥雷拉回了电话，对方告诉她，罗伯托因心脏病发作辞世了，说她还给住在街道对面的罗伯托的第一个妻子也去过电话，等她打完电话回来为时已晚，罗伯托几乎就要断气了。褒曼分别给孩子们打了电话，给皮娅、拉斯和她认为必要通知的人都去了电话。褒曼感到心乱如麻。多年来，罗伯托曾经是她生活中的一大组成部分，现在仍然是这样。他70岁生日宛如昨日。鲁思说：“英格丽，5点钟了，该去剧院了，还是上车吧。”

“上车？我不能去了。我不能去演那个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海伦·兰卡斯特了，不能再去听那些笑声，去演那些谈情说爱的戏了……”

“我们该上车走了。”鲁思说。

这样，褒曼还是同车去了剧院。大家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谁也没说什么，同事们走近她身旁，按按她的手以示同情关切。大家都想安慰她：“有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帮助你的。别着急，亲爱的，我们会来协助的。”

这时，褒曼脑海里出现了她的同行、女演员席各妮、海苏的形象，那天晚上当她获悉儿子死去的噩耗时，她仍镇定自如地继续登场演出。现在褒曼终于懂得席各妮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了。其实，她自己也是明白的，她是女主人公海伦·兰卡斯特，而不是英格丽·褒曼。她是那个生性快活的腰缠万贯的阔女人，那个女人把残酷的现实生活置之度外，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心灵的艺术之光战胜了一切。褒曼坚持演完了全剧。然后回到别墅打电话。整整一夜电话未曾间断：不是别人打来电话，就是她给别人打去电话。她记得，凌晨4时，儿子罗宾打来电话，他说：“我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但我一直在设法安慰大家，请他们别难过。我克制自己一整天了，现在我想要和妈妈一起大哭一场。”在电话里他放声大哭起来，褒曼也伤心落泪了。

俟葬礼结束，3个孩子必须来同褒曼住在一起。她为罗伯托伤心痛哭。一生中，他精心制作的那么多影片几遭无端攻击毁谤，而今天又居然被看成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她记起罗伯托在她伤心落泪时对她说过话，那次褒曼告诉他，她在电视里看到罗伯托在印度拍的影片上有一个情节，讲一个年迈的乞丐，用一根链条拴着只猴子。猴子跳来跳去，嘴

里哼哼叽叽，使孩子们开心大笑。接着猴子拿出一只铁罐来向围观的人讨钱。老人生病后，步履艰难地朝森林里走去，终于奄奄一息地倒在草地上。一只秃鹫在老人的头顶上盘旋，可怜的猴子焦急万分，用手去推搡老人，想告诉他头上有只秃鹫。它趴在老人身上以保护老人不受伤害。猴子伤心地吱吱叫个不停，两眼盯着恐怖的秃鹫。因为猴子被链子拴住了，无法脱身逃离。影片非常感人。她伤心地哭了起来。

褒曼把这件事告诉了罗伯托，他微笑着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哭吗？那就是你和我。你是那猴子。你总是在保护我不受任何“秃鹫”的伤害。这就是你痛哭的原因。”

世界上有死亡，也有新生。罗伯托去世那天，拉斯从纽约来电话说，妻子克里斯蒂娜·贝尔弗拉奇为他生了个胖儿子。这是多年以来他盼望的。褒曼为他高兴。她和拉斯很久以前开始的关系，也一直是她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6月中旬，褒曼结束了在奇切斯特的演出。为去伦敦演出而在布赖顿进行排练和《月光似水》在干草市场的演出一直到秋末才开始。这以前，她签了合同去斯德哥尔摩和挪威，她准备在那里拍摄《秋天奏鸣曲》一片。

夏天褒曼去了纽约，在那里，她又到以前给她看病的医生那儿做了检查，因为按规定必须6个月检查一次。医生说对她的乳腺肿胀症状需要继续注意观察，让她不要惊慌。回英国后，她还应请她的保健医生作进一步检查。

医生检查后发现褒曼的另一个乳房也出现了肿瘤，让她马上住院，一分钟也不能延误。

“不行啊！我一连6个月每星期工作6天，演出8场，我精疲力竭了。我要去法国作短暂休养，然后再住院。”褒曼向医生恳求。

终于赢来了休息：她在法国的游泳池里游泳，仰卧在草地上晒太阳，同格里夫和阿伦·伯吉斯一起谈天嬉笑。阿伦是她的挚友——一个严肃的人。褒曼把剪报、剧照、日记、信件和电文都交给了她，这样她就可以去完成她的未竟之作。此后，褒曼回到伦敦作肿块切除手术，再进行化疗。

她感到遗憾的是，她不能去美国演出《月光似水》了。她把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演出主办人路易斯·迈克尔。

病中，往事件件潜入褒曼清醒的脑海，震撼着她的每一根神经，她力图在脑海里再掘一眼记忆之泉……

褒曼喜欢对称美，她认为自己的生命历程即将结束，她希望最后一幕的谢幕的场面即使不能激动人心，至少也是十分体面的。因此，当众多的评论家为她的《秋天奏鸣曲》所获得的成功而欢呼时，她特别高兴。各国的评论家一致认为褒曼和利芙主演的这部影片达到了艺术的顶峰。连一贯对她怀有恶意的瑞典评论家也发出一片赞扬之声……

在美国，斯坦利·考夫曼在《新共和报》上写道：“看完英格丽·褒曼的演出，令人如醉如痴。几十年来我们都很羡慕她，爱护她，可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她是个超级明星……她在拥有各种艺术风格的名家高手培养下成长起来。”从《花花公子》的“精湛表演”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非凡的演技”，从《新闻周刊》的“从好莱坞把她挖掘出

来之后，我们甚至不记得看到过如此动人的表演魅力”和《新闻报》的“尽善尽美”，到《时报》的“超级影星”，舆论一致认为，褒曼和利芙的《午夜相逢》那场戏要作为不朽之作永垂影史。

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电影界中罕见的力量显示”，《观察家报》说：“她的成就是有些人不及的。”《星期日电讯报》说：“表演的魅力使人屏住了呼吸。”

褒曼和利芙终于荣获纽约电影评论家奖和意大利名望最高的影片奖：多纳莱洛奖。

1979年春天，褒曼应邀去好莱坞演播电视节目——《给希区柯克的颂歌》，他们安排褒曼报幕。一切都很顺利。

1979年11月，作为美国戏剧界俱乐部的贵宾，褒曼应邀回到好莱坞参加电视节目，为贫困残疾儿童和建设英格丽·褒曼大厦筹集基金。演出是在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9号舞台上进行的，多年前他们曾在这里拍制过《卡萨布兰卡》。制片厂依然完好地保存着里克在美国咖啡馆的布景。

制片厂里有一个大型管弦乐队。宾客盈门，其中有海伦·海斯、席各妮·海苏、维克托·鲍吉，齐·科顿、褒曼、哈里·格兰特一起在化妆室里紧张地准备演出。哈里·格兰特看上去肤色黝黑，漂亮而健康。褒曼穿着一件白色长裙，使她感到高兴的是，裙子相当肥大，这样人们就看不到她那颤抖得无法合拢的双膝。

在《卡萨布兰卡》中扮演她丈夫的保罗·赫里德打开了那著名布景的门说：“英格丽，请进来。欢迎你回到里克的布景来，咱们喝杯香槟吧！”37年前曾经给他们斟过香槟酒的那位服务员又给他们端来了香槟酒。保罗举起酒杯说：“为勃基干杯。”褒曼一饮而尽，接着说：“为麦克，柯蒂斯和所有的朋友们干杯。”

特迪·威尔逊正坐在钢琴旁边，他接替了不久前死去的多利·威尔逊的位置，担任钢琴伴奏。他笑着请褒曼哼唱一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哼了起来，听到身后有人跟着唱了起来，原来是弗兰克·西纳特拉。他唱完时，褒曼吻了他。后来褒曼才知道虽然她和弗兰克从来没一块工作过，而且一点也不熟识，可是他突然打电话给迈克·弗兰克维奇（他和保罗·凯斯共同组织整个节目）说：“我要参加为英格丽召开的庆祝会，因为我一直想为她歌唱《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弗兰克第二天晚上要去大西洋城首场演出，可是他还是飞了3000英里，来参加他们的节目，唱了一首歌之后，又立即飞了回去。他们真挚友好的行动深深打动了褒曼的心。

她一直在想，她一定要不停地演下去，因为她的整个生命是属于戏剧和电影观众的，是属于上帝创造的这个幻觉世界的。虽然每次首场演出的夜晚她都感到惴惴不安，但演出把她和人们像一家人一样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分享这美好世界所赋予的一切。在她生命行将结束时，她并不感到灰心丧气，她已做好准备去接受上帝给她的任何安排。

